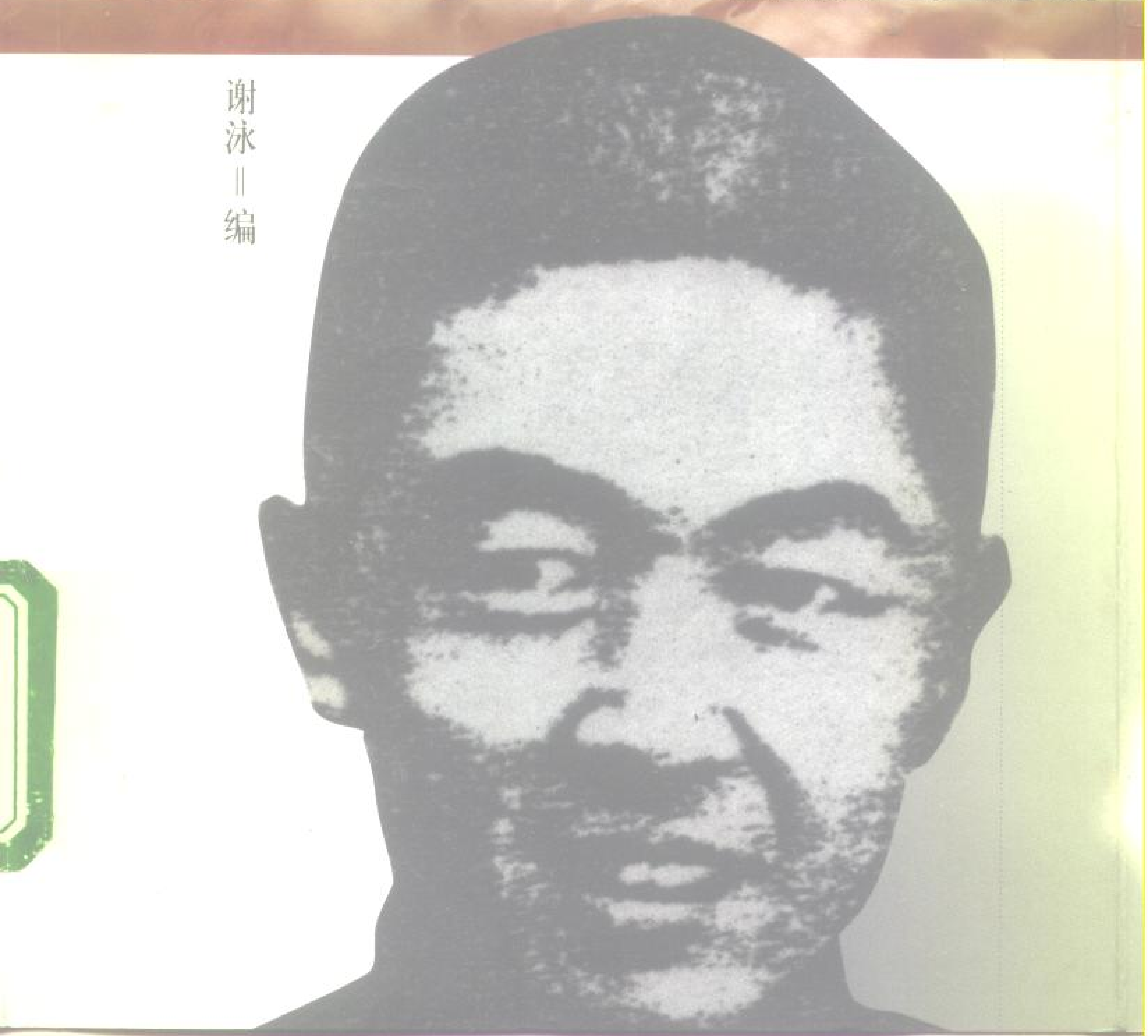
野百合花丛书

一切事物，人、思想，其形态，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生如一块饼，在这面看，饼上有芝麻、有花纹，而站在那一面，除掉一个平凡，此外便看不见什么。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泳 编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谢泳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

(野百合花丛书)

ISBN 7-5006-3347-5

Ⅰ.储… Ⅱ.谢… Ⅲ.①储安平-生平事迹②储安平-文集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71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 印张 3 插页 182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14.80 元

目　录

散文·政论

DK83/30-17

序跋·书信

储安平评传

谢　泳

关于储安平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材料不是很多，特别是有关他早年生活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的至多是一些间接的传说，而没有什么文字材料，我曾和他的4个子女有过通信联系，但关于他父亲早年的生活，他们也所知甚少，我也曾专门访问过他的女儿储望瑞女士，她也知道得不多。储安平的档案今天的研究者还看不到，根据他1949年后工作的变化，我们可以从4个地方去寻访储安平的档案，即民盟、九三学社、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社，因为他曾在这4个单位供职，有可能留下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有关储安平的历史资料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乎没有他自己写的自传性文字，1949年以后，储安平并没有停止写作，但对于自己的生平很少提起。想给储安平先生写传记的人很多，但正是由于没有资料，所以至今我们也见不到一篇较为完整的储安平传记，有一些记者写的有关储安平的文字，比如《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在让读者了解储安平和对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1957年以后最早从正面叙述储安平历史经历的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是以纪实文学作品出现的，难免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对于真正研究储安平还是不够。

早年储安平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储家是宜兴的望族。对于他的家世，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还是储安平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题目是《母亲》（《真美善》杂志7卷1号，第101页）。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生下来了6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6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这是储安平一篇自叙性的散文，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这是一篇有关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于用了很强的抒情笔调，人们不大留意他所叙述的真实家世，而多数为他忧郁的笔调所吸引，但从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储安平早年的生活情况，再结合他后来的一些生活，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篇真实的文字而不是虚构的。他说："我父亲，爱赌也爱嫖。……还只有6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他家人们所疼爱。在那样异样疼爱的祖母之抚育下，我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14岁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14年，非常疼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亲之外的另外一种爱。"从这篇文字中我们知道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先生，储南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50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

抗战爆发，储南强先生1959年去世。储安平从小是在一个特殊家庭中长大的，对于他的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她的女儿曾告诉我说："父亲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对他的伯父非常敬重。《母亲》是1930年夏天写的，当时储安平21岁。他说："祖母和父亲，在我14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21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10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般的我。"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一点个性，由于幼失怙恃，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叶圣陶日记中有一则储安平请客的记载，可见出储安平的风格："储安平请客单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将新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做事有效率，可佩。《观察》销数到6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种周刊矣。"（《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7页）许多接触过储安平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生活有关。

光华大学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光华大学已是很陌生了，但在过去它是很有名气的，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它的几个学院被拆散到了其它大学，要是不很严格地看，我们可以说今天上海华东师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而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学校，它的校长是张寿镛先生，文学院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他名教授阵容是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胡适之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15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

储安平是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的，这个入学的时间现在没

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他在光华读的什么专业。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说："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该书第132页）陈子善认为："1928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4日10版）而赵家璧先生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是我在光华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111页）赵家璧先生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来说，那么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才对。储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3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早年的文学活动

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查阅《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

——〈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我们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的文学活动只可以说是早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转引自陈子善《“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光华时期，即他在光华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是《新月》时期。光华时期以小说为主，而《新月》时期则以散文为主。总体上观察，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以散文的成就为高，而小说的写作只是一个人文学青春时代的产物。虽然储安平出版过小说集，而没有出版过散文集，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为世人认可的还是他的散文。关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储安平在他的小说集《说谎者》的自序中曾说过：“我最初是学习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纪太轻，人的感情太浮，这使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许我写得出

什么郁葱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惭形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说谎者》第1页）储安平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那时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说要难，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散文的地位好像要高于小说。他最初写小说在1931年春天，他写了一篇名为《春》的小说，1932年的春天他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对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1934年的4年时间中，他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储安平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我们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丝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诅咒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的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

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的这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新月》时期储安平的散文不是很多，但在几乎所有评论《新月》散文创作或者编选《新月》散文作品时，储安平的散文都是不可少的。在散文的写作上，储安平可以说是《新月》的后起之秀。1984年，梁实秋和叶公超在台湾主编《新月散文选》就选了储安平的3篇散文，徐志摩和梁实秋这两位公认的《新月》散文大家也不过每人选了4篇，可见对储安平散文的推重。储安平的散文很讲究辞藻，抒情的味道较重，深受徐志摩散文的影响，他自己在徐志摩逝世后写的悼文《悼志摩先生》中就说过："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份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新月》第4卷，第1期）对于储安平的散文，一位研究者曾作出过这样的分析：

> 储安平的散文那么诗意葱茏，也应他深挚地领悟到了生命就像"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的这篇题目《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的散文，以缪塞那种"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式的语气抒述着从人生底流处和悟解到的愁绪和苦况：因为"太聪明"，"感受力"太强，便深深地体验到"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的"痛楚"；但他写散文绝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表现他在这种人生况味中所感悟到的忧郁之美："人生就是那样的Sentimental……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

我心头流过。”正是这种感伤和忧郁的甜蜜使得他虽备尝人生愁苦却又感恋着人生。《在豁蒙楼暮色》一文中，储安平更以一种灿烂的诗思表述了这种绅士的悟美感恋心性：他从南京的鸡鸣寺看到了“幻想中”的海光暮色，湖面被远山背后的反光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黑暗，似亦心甘。”似乎那一缕美丽的夕光便能补偿黑暗天地所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似乎人生的各种意蕴都能被那清新的惨白之美包容无疑。(朱寿桐《以感美感恋心态走出名士传统——新月派散文的绅士文化特性考察》，《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50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的，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在　湘　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就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10章。"在这之前，他还在俞颂华做总编辑的科学书店出版了一本他根据他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

《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在　重　庆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有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3

页）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 3 期，邓牛顿文章）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正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的储君，一位是《大刚报》的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罄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 3000 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该书第 62 页）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1935 年第 38 期）。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 年代晚期，中国有 3 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 1934 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8 开）的周刊，16 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 6 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

冒失。因为创刊号于1934年11月11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10月8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观察》第1卷第1期，第23页）

《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份《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风雨故人来》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第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客观》第12期第12页）。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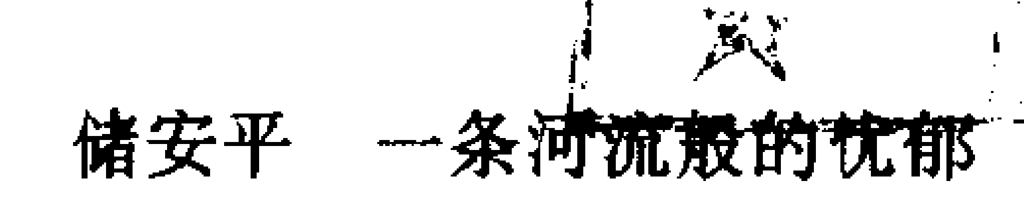
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 1 期第 1 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不久他要创办《观察》的消息就已传开。据当时出版的《上海文化》记载：“伍启元编《观察》周刊定于 9 月 1 日出版。”（《上海文化》第 8 期第 25 页，上海文化服务社出版）虽然误将储安平说成伍启元，但可以看出《观察》已引起上海文化界的注意。不久同一刊物又有消息说：“储安平为主持《观察》周刊，辞去一切职务，并对于撰稿人及到沪者一律负招待之责”。储安平对办好《观察》充满信心，《观察》的栏目设立，基本上延续了《客观》的风格，只是没有了像“《客观》一周”这样简短的时评专栏。《客观》的这个专栏，前 12 期都由储安平执笔撰写（第 6 期为吴世昌撰稿）。

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充分表明了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

对于当时国内的现状，储安平的评价是“一团糟”，这实际上是他后来对国民党“一场烂污”的总结性批评的另一种说法。对于国内出现“一团糟”的现状，储安平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他毫不保留地说：“我认为无可推诿，现在的执政党是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客观》第1期第2页）抗战胜利后不久，储安平对于国民党的批评比《观察》时期的言论要温和。这时他对国民党改变自己的形象还抱有一定幻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总是以分析和劝告的语气谈及国民党的过失。他甚至认为，除共产党外，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关切国民党的，这不是

基于任何理想和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政治是一个现实。国家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就落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有这种优越的条件而没有好好利用，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事情。（《客观》第1期第2页）他分析国民党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二是缺少一种高度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实际是一回事。国民党统治的腐化是不可否认的，也正因为在种种腐烂的覆盖下，使许多潜在的新生力量不易成长。（《客观》第2期第2页）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批评和分析，储安平在《客观》时期最为成熟的思想表现在他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评价，这是储安平比他同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成熟的一面。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它的长处，但也有的它的缺点。共产党的主要缺点，在储安平看来就是过于崇奉外邦，一味视外邦为宗旨，则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此处指的是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客观》第2期第1页）储安平对共产党作出这样的总体分析：他认为共产党有吸引人的地方，第一是它的社会主义。他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同时他也不相信假如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能完全实行它的主义。储安平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后，它的施政较之今日他们所揭橥者，恐将打一个大折扣，然而打了一个大折扣以后的共产党的政策，又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客观》第2期第1页）储安平认为共产党有刻苦精神，这是它的可取之处，而这正是国民党的短处。就储安平个人的理想而言，他承认共产党在当时中国所获得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可能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客观》第4期第1页）他对共产党的前途是这样判断



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之迟或早，是和以后中国的执政党的政绩如何互为因果的。"对于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储安平有较强的国家至上倾向，他认为共产党的崇尚苏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也很引人注意。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它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客观》第 12 期第 1 页）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他过分早熟的自由与民主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

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的言论行为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观察》时期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与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观察》第1卷第1期，第24页）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

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作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由于《观察》是

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万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新观察》35周年纪念册）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编辑记者100人》第41页，上海学林出版）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得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得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

主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 78 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首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 5 卷中，每到出满 24 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 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现照录如下：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

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1卷24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立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地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

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2卷第1期写一篇文章（2月15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1月21日，农历大除夕

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我们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在有关的胡适传记资料和他的书信日记中都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感情。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求他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见到胡适给储安平的回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1947 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适之先生：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 2.33 余亿。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1000 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 20 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 168、225、239 页）后来《观察》在第 3 卷第 7 期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我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 1947 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

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适之先生：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3 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 8 月 18 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从以上 3 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一位后学对前辈的近乎崇拜的感情，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有近似于迷恋的感情，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一言一行都给予高度重视。1947 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对胡适的言论《观察》也多留意。《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观察》第 1 卷第 3 期，第 4 页）在整个《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惟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给费孝通的信，而且是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是由费孝通提供的。这封信是针对《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给费孝通的，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 205 页，三联书店 1985 年）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错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我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观察》创刊时，就在《观察》通讯的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

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观察》第1卷第1期，第3页）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非常客观的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那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在极大的苦闷中既没有对国民党存有幻想，也没有对共产党抱有过高的希望，就他们当时的理想而言，多数人希望通过走民主和宪政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局面，具体而言，盼望胡适能够组织新党，或者创办刊物，以自由的言论影响国家。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想的追求似乎有些天真，虽然最终没能成为现实，但这种理想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中，成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人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是因为4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对于胡适的行踪和言论颇多留意，这都是研究胡适的重要资料，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

《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观察》第3卷第21期，第17页）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这种言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虽然他的这种言论客观上对于国民党政府处理这一事件有帮助作用，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要让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是很坚定的，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观察》第2卷第14期，第19页）听到有学生被打伤和被捕时，胡适总是赶到医院去探望并设法营救学生，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和理解是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储安平在给胡适写信之前，也给傅斯年写了信，陈述了他自己想在中国为培养自由主义而尽力的设想，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他也给过储安平不少具体的建议。储安平在一封给傅

斯年的信中说："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国来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设。"（台湾《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

在 复 旦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 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王火在《回忆储安平教授》一文稿中说："储教授给我们上'报刊评论写作课'时，除了讲授报刊评论之重要性和应当如何写评论之外，主要是通过让我们实践来取得认识和进步，也就是经常要我们练

习写评论，由他命题作文。他不时将一些报刊上的社论、评论，包括《观察》上的论文，作为范例讲一讲他的体会，或综合评述一下习作中存在的优缺点；有时也将我们同学中他认为优秀的评论文章让大家当堂传阅。他对大家写的评论，并不在纸上进行批改，却有时采取同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的方式对评论的优缺点进行讲评。……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话原是杜甫这位大诗人写诗的体会。储教授借用来指导我们；写评论时如要出色动人，必须要有惊人的佳句，不能平淡无奇，不能用人家用滥了的意思和文句来写评论。记得他同我个别交谈我的评论文的优缺点也仅有一次，但因为是个别交谈，印象就较深。我记得谈话时，他仍强调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观点。此外他谈过论文应有长期存在的生命力，这要依靠学识，但评论既是评，还应有较强的时间性和针对性。他说他办《观察》和《客观》都是周刊，就是为了能及时评点国是，及时反映时局。"（《黄河》1995 年第 3 期）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张啸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储安平受到的两次批评

储安平在 40 年代末期因为创办了《观察》周刊，一时成为新闻人物，由于《观察》周刊的立场是自由主义，所以也受到了代表其他思想观点力量的批评。在那时的批评中有两次很引人注目。一次是署名土司的一篇《观察"观察"储安平》，发表

在《人物杂志三年选刊》上，一次是署名萧源的《一个〈观察〉的读者观察储安平》，发表在当时南京出版的一家名为《正论》的周刊上。这两篇文章虽然代表的立场不同，但在对储安平的批评上大体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自由主义的立场很虚伪，土司在文章中说："'自由分子'正同非自由分子一样，也有各式各种，但安平教授这种含混暧昧的'自由'，作个不好听的比喻，好像是摩登太太小姐们所不离身的法宝，用来涂口红的镜子，两面皆可用，对'高级政界'反映出一副嘴脸，对'我们自由分子'反映出一副势态，而对于'数以万计的读者'则仍然是好的市招。"（《人物杂志三年选刊》第17页）萧源则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说话，他认为储安平和他的《观察》纯粹是给政府添乱，他质问道："今日储安平所得意者，以为在课堂内能够骗得几个学生对他喝彩，便认定'民心已归'，可以纵横宇宙一下了，其实古来从事祸国殃民工作者，有几个达到了他的目的？自己以为不凡，骂张责李，究竟自己做出了几件有利民众的事？常常骂政府不能容纳异己，但在现政府之下，还可以见几个与政府主义不同的党派公开活动，通行无阻，并没有驱之于所管辖地区之外，而储安平弄了一个《观察》周刊，口虽在叫'容纳不同意见'，'尊重个人独立发言'，但《大公报》在自己的地盘内讲话，就遭到储安平的无情臭骂，如果《大公报》那主笔先生不幸而参加《观察》周刊做事，储安平还不立刻撤他的职吗？假如储安平为今日中国执政者，还会允许旁人有自由发言的余地？还会允许有不同自己主义的党派存在？尽管话说得如何漂亮，文章写得如何的流利，嘴如何的会讲，事实还是事实，真理还是真理，丝毫不可以蒙混"。文章甚至认为"储安平作孽的事实太多，举不胜举。"（《正论》周刊第1期第13页）《正

论》在发表了萧源文章之后，还在第2期上发表了署名王荫和缪玉明的两封读者来信，以支持萧源的观点。当时的《中华时报》上也有过一篇《储安平的进步》，可惜笔者没有见到。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

1929年初，当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进行人权与约法论争时，储安平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虽然那次他没有卷入这场论战，但《新月》及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文学青年，但由于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强烈向往，15年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动阶段:《观察》时期。1946年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这时的储安平从年龄上看，正是38岁，精力充沛，已经成为一个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时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观察》第5卷第13期，第1、2页）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

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可以理解为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是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可以理解为对人生、对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是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是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可以理解为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做出的选择）。由于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40年代执著于自由主义理想的青年一代，早期都或多或少地与胡适有过各种各样的来往。他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对于政治又抱有热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热情不表现在具体直接的政治活动中，而是在道义和言论上。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的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差异只在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应采取的方法。《观察》在创刊的时候，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储安平本人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的一个特征是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也许当时的储安平尚未获得什么社会声望，还没有资格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但从储安平当时的许多言论看，他在不介入具体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有资格有条件介入也不介入，这是他比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张君劢、梁漱溟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

表。所以他在《观察》的发刊词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议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在整个《观察》时期，它的言论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是保持了独立发言精神的。储安平在《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储安平在创办《观察》之前已写出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专著，从这两本介绍比较性的专著中，我们可看出储安平对英法的政治制度是做过深入研究的，他认为那种政治制度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作为个人，储安平不仅在政治上信奉英国那一套，而且在为人处事，工作作风上都明显地带有英国人办事的作风和效率。体现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更是严格以理性为判断事物的出发点，以公平为尺度，凡事都要分清是非而不计利害的。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国民党20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国民党的失败的。他力陈20年来国民党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观察》第1卷第3期，第3、4页）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

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一事朝野多有物议，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70 天是一场小烂污，20 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 年来拆足了烂污。”“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制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

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轻，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分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就是在这样对美国

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与调停提出了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20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

《观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所以《观察》第5卷只出了18期。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据《观察》杂志社的林元回忆，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卷第9期刊载了储安平写的专论《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这篇文章由于批评了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的对华政策，并激烈地批评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为此中统特务还光顾了储安平的寓所。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民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讯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民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

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

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验。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献策献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是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减，万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丘吉尔执政

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丘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抵，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丘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拉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家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地想想，你们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

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作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为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些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施行吗？我们一直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 3 卷 13 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 8 月矣，政府果会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富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假如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谛一些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益方法，以苏民困，民困

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

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22条及出版法第23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 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

兵来应征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1992 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铃，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浦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蒋。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铃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讯。张今铃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铃给《观察》写军事通讯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上海滩》1992 年第 7 期，第 44 页）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第 2 卷第 10 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人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人！”“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人的自由！”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国共两面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

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我们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要知道 1948 年 12 月查封《观察》到 1949 年 11 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 年 12 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祥的后果。1949 年 9 月 21 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后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后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

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 25 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惟惟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徐铸成回忆录》第 203 页，三联书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像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 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1956 年 6 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一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 年 3 月 26 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 4 月 1 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

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碎布集》第4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5万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2万份，如果按

每本刊物有 10 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 100 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 3000 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 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 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 1949 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 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 1957 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 40 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 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 1949 年以前的精神状态。储安平 1949 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 年夏天，他的

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 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复刊后的《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 14 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

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好像自己过去犯了什么罪一样。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

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观察》第6卷第1期，第4页）多么谦卑的自我批评。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作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对复刊后的《观察》，我们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

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他还成了人大代表。这个储安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储安平了。1956年6月28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竟然是《南疆旅途见闻》（《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98页），而同时参加会议的罗隆基的发言却是《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那时罗隆基是森林工业部长，他却在发言中说：“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

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5期，第34页）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1956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储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销，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1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

《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

有情绪，但又说不出口。当他握笔写‘党天下’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他的‘党天下’的言论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第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957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学社一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5月19日，我去看过罗隆基一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期，第17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我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得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储安平和梁漱溟

梁漱溟是长储安平一辈的人，在储安平开始打天下的时候，梁漱溟已是知名的学者了。储安平比梁漱溟小 17 岁，但储安平这个人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的，他一生的事业与他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储安平开始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在他的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观察》当时有 78 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 1957 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

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我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泽东要有容人的雅量，还有陈寅恪、周炳琳等一大批从旧时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根本适应不了新的生活。适应了的知识分子不少，但历史正是由于那少数不适应的知识分子才使人觉得沉重。

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虽然50年代初储安平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为了能让《观察》尽快复刊，他曾被迫放弃了过去《观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梁漱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储安平的友谊是一直保持下来的，梁漱溟对储安平也很关心。他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曾提起过和储安平的交往。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忆往谈旧录》第167页）50年代初，梁漱溟和储安平还常有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书信今天

不容易见到了。1951年5月7日，梁漱溟日记中记有："收储赠《观察》合订本全部，答谢一信。"1953年9月1日记有："收学习会图书室送来《观察》两册。"(《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453页、501页）从梁漱溟和《观察》的关系中，可以说明他是很看重储安平的，1957年4月7日日记中说："张歌今来谈同去广州事……张云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第630页）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1957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第637页）梁漱溟日记中脱漏二字，但这二字从上下文看并不难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5月31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6月1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6月1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我们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5月31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储安平之死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

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已经不幸福了，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人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

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末，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牛”的个人性格，而且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

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 年 6 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作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 16 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1998 年 9 月 23 日晚

于太原南华门东四条

散文·政论

母　亲

我生下来了6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6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但母亲所给予我的印象更渺茫。在小时候，约摸已经能够理解一些极简单的事件，像在那样的年纪的我，常常，天空满布了繁星，火萤在树梢头飞，青蛙在池沼里叫，家人们睡在那样平和的气息里的夏夜，一边纳着凉的时候，一边便好似讲故事般的会告诉我关于我母亲在生前的种种。也有时，仿佛好容易在什么箱树角角里才找到一张已经泛着黄了的照片似的，给我看，指着一个女人，说，那是我的母亲。在那样的时候，我天真的心板上，就如一块白的布，被人映上了一个我母亲的轮廓和面貌。但不久，模糊了，模糊了，也像已经奔到老远老远了的火车所留下的烟，我依然又消逝了我心头所有关于我母亲的恍惚的印象了。我的记忆如淘浑了的水，我始终抓不住一个我母亲的具体的印象；我的母亲只是像一个被白云遮住了的晨月，朦胧地，永是隐约在水浪里的天边。

我也常常做梦，然而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我的母亲。也许我的母亲时常在我的梦里出现吧，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仍然不认识。在梦里，我时常梦见我父亲，我也时常梦见我慈爱的祖

母。每次，在我梦见了我父亲或祖母之后，我便怅然。我为什么不求他们领我去认识认识我的母亲。每个人，他有一个母亲，他有一个关于母亲的印象，但是我，我有一个母亲，我却没有一个关于母亲的记忆！

所有我能够知道一些关于我母亲在生前的种种，那也仍然只是属于一种传说。每当家人们说起一些我母亲的什么时，她们总会流露出一种惋惜似的叹息。这叹息，与其说是惋惜我的母亲早死，还毋宁说是由于怜恤我的幼孤。中国人最爱赞颂的是已经死了的人；我母亲，母亲的生前究竟怎样，我也茫然。不过，每当家人们提起了我的母亲，当在那样的时候，在我飘忽的想象中，便出现了一付阴郁的脸貌，一个流露着一个弱者的气息似的女人。我父亲，爱赌也爱嫖。在那时，我母亲，也许就已经将她自己所有的幸福，系在了她儿子的身上去了吧。当我生出来的一刹那，光明的花朵在她酒涡里一朵朵地流泛出，像落入了幸福之渊里般，她必定会感到无底的愉快的吧。儿女的生命是父母的血，一面病的我母亲，即使病乳似乎也还非常的爱惜着。据说我母亲是一个顶爱小孩的人，但爱也罢，顶爱也罢，当为她自己的血所凝成了的儿子下地后，只有6天，6天的延留，她就完结了她这辛苦的一生，就在她还只有6天生命的无知的小生物、自己的血块之前，死去了！

还只有6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他家人们所疼爱。在那样异样疼爱的祖母抚育下，我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14岁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14年，非常疼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爱之外的另外一种爱。我从没有听到一声亲自从我母亲嘴里吐出来的

催眠之歌，我也从没有体受到一次虽则是打其实心上仍然是爱的责骂！母亲，母亲像落了山的太阳，今天是不会再升上来的了；母爱，母爱像太阳发出来的光和热，为要期待像那样的光和热的晒照，那便非等到来世不可了！

从小就失去了母爱的我，母爱，母爱真的是怎样，我自然抓不到一个具体的说述。但，每每，从伯叔母给予兄弟们的爱，嫂嫂给予侄儿们的爱上，我也能怅然地感受到母爱究竟是怎样一种可贵的味道。尿和屎，世上有几个不嫌恶的；然而世上又有几个连自己儿女的尿和屎都嫌恶的母亲？许多女人，在小姐的时候，真爱干净，但一做了母亲，即使儿女嘴里吐出来的最污腻的东西，自己也仍然会毫无其事般吞咽下去。没有儿女时的女人，她们全生命的爱，完全灌泻在她丈夫的身上，但，一到做了母亲，女人所有的爱，便像决了口的河水，转过来流注到她自己的儿女身上去了。儿女，儿女是从自己身体里蜕化出来的另一个自己，那是寄藏自己的灵魂的另一个躯壳。儿女的痛或甜，便是自己的痛或甜；儿女的暖或冷，便是自己的暖或冷。世上没有生就不爱自己儿女的女人，世上也没有不将儿女的幸福比自己的幸福更为重视的母亲。为了儿女的快乐，健全和幸运，她愿意挨苦，她愿意忍痛，她也愿意牺牲一切自己的幸福。儿女渐渐地长大了，也像看养自己种下去了的一粒心爱的花子，现在逐渐地生长起来了般，在一种说不出的意境之中，为母亲的，她脸上和心头会不自知觉地流泛出微笑和安慰。儿女总是自己的肉，即使长成得更老练些，也像叶和枝，永没有隔绝的事。母亲对儿女说的话，有几句不是从心坎里迸裂出来的？假若儿女的生命是朵花，为了那朵花的生命，做母亲的，她愿意，她愿意将自己的血，永无止息地向那朵花流泻去。

母爱，母爱是人性间至上的一种爱，然而像那样至上至深的一种爱，在我这一生，是始终如梦一般的永是虚幻的事了！家人们说，我命硬，命里顶冲了我母亲；而且照八字上讲，越是我母亲死得早，仿佛于我命上还越有好处。像这话，自然渺茫。但若算这话是真的话，那是，我母亲，为了我的幸福，断送了她的生命；为了我的生命，牺牲了她的幸福！天下的小孩，日里尽管和别人玩，但一到了夜，也像立刻就要寻窠的小鸡，便非揪着了自己的母亲不可般不肯放了。小孩子，即使被母亲打了，即使母亲再声的说："不要你！"但，还永是用尽了力气揪住了母亲的腿。天下打自己儿女的母亲的手，都像米粉捻的一样软；即使骂，也为了好。但，我现在，即使要求得到像那样一次的骂，那样一次的打，也永是不可能了！祖母和父亲，在我 14 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 21 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 10 年的漂泊生活中所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飘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般的我！过去，过去的生活像条已经幻逝了的虹；未来，未来如在暴风雨之前夜的天边一颗星。这两天，新秋初上，夏夜将去，每每，在群星满布的天盖下，死一般的气息中，纳着凉的时候，儿时生活，便像电影似的映上了我的心。每次，我的思潮一溅上了旧事之追忆，我便会分外地怀念到我的母亲；而每当怀念到我的母亲时，我便更会感到一种恐惧，一种来日方长的恐惧！

1930 年 8 月 13 日作

（原载《真美善》第 7 卷第 1 号，1930 年 11 月 16 日出版）

关于“睡庙求医”的故事

作人先生在《语丝》4卷3期上，刊登了一篇《花束序》，中有涉及“睡庙”的事，同乡人潘达仁君，因即写了《关于“睡庙求医”》一稿，刊在4卷8期的《语丝》上。潘君说：野五圣——即五通神。在我们家乡，宜兴，只称为五圣！有称为野猢狲者，误也。——之被周将军捉到，是在人家的花轿面前的。周将军捉到后，便将它们装在瓮里，将瓮投入塘池，任水流去。而且潘君说：所捉到的只有两个。……以上种种，和我所听闻的传说都不同。我所听闻的，现在便写在下面：

据说：周将军幼时，非常顽皮。当私塾里放了夜学以后，他老同着许多小朋友在城外的旷野地方游玩。在旷野的地方，是很有许多五圣的庙的。五圣的庙，并不高，大约只有我们的胸膛一般高吧。周将军常喜欢爬在五圣的庙的顶上小便，有的五圣的庙的旁边，还有着香炉之类，于是，周将军遇着要大便的时候，五圣庙的香炉，便作了周将军的临时盛粪器了。在五圣，并不是不怒，但周将军是一个正人，正能克邪，邪自不敌，所以虽怒，怒而不敢有所表示。但日长月久后，周将军将香炉当为粪器，成了习惯了！在五圣方面，也似乎不能再忍，它们终于托梦给周将军的老师。老师知道后，当然是要大怒的。因为在那时，自己有了这种弟子，简直是羞耻，所以在第二天上，周

将军便受了严重的责打，而使周将军衔恨五圣的程度，也愈深了。他在暗地里，曾在一张红纸条上写了“逐出铜山三千里”7个字，但因为没有机会而没有烧掉。

在那天的夜里，周将军的老师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梦见五圣都跪在地上求他。告诉他周将军要将它们逐出铜山三千里的话。它们都很悲哀恳切地求周将军的老师解救，而周将军的老师终于答应了它们。

在第二天的早上,周将军的老师在周将军桌上的书堆里,果然发现了一张红签条，上面写着这样 7 个字，但他立刻又想到假若将这条撕去而周将军是仍可以再写一张的不妥。他想还是将三千两个字改为三十两个字妥得多。果然，周将军忽略了过去，当他的老师在假装午睡的当儿，匆匆焚化了。而在那一天的晚上，周将军的老师又梦着五圣们来谢他；自此以后，宜兴城周的 30 里之内，便永久没有他们的影踪了。

周将军在他的家乡，宜兴，建的功业非常之大。他在宜兴南门外的铜山，曾射死了一只当时山麓住民所引为大患的白额虎；在宜兴城里，又斩死了一条蛟——现在宜兴城里有顶蛟桥，桥长而高，因又称长桥，桥上有店铺凡数十家；而蛟桥夜月，也成了阳羡十景之一。——他死后，邑人念其恩，因在城内东庙巷里，建筑了一座周将军庙。庙身甚大，但年来失修，所以日见衰败了，但香火还盛。香火之来，泰半来自外埠。因为外埠人被五圣所缠的，便常到周将军庙里来烧香。假若烧香而犹无效，那便非被缠者亲自睡到周将军庙里来不可了。据说经五圣缠了不论有几月半载之久的，只要在周将军庙里，睡上几天，病势便可日见渐减的。要是日子睡得稍多一些，被缠者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也将不再被缠了。

因为宜兴没有五圣，所以宜兴人也很少被五圣缠过，但对于这个故事，大都倒是晓得的。

1928年之春

（原载《语丝》第4卷第18期，1928年4月30日出版）

小　病

世上有几个人爱病的？即使小病也不爱。生就是一个羸弱的体质的我，疾病，疾病就像一条混水鱼，常常会来淘混我平静的生活的泉水。每年，疾病不知要使我感受到多少苦痛和损失；我怕它，我也咒诅它。不过，在长久不病的极清闲的生活中，偶尔小病一次，我却爱。小病像橄榄，它涩，它有一种清香，一种幽高的清香。那种悠然的，就像太阳还没出来的山顶上所有的那种悠然的气息，也只有，只有在这种小病中，使你体味到，使你在极微妙的意境中体味到。

一切事物，人，思想，其形态，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生如一块饼，在这面看，饼上有芝麻，有花纹，而站在那一面，除掉一个平凡，此外便看不见什么。画图画的人，当他自己一笔一笔地在画着时，他会体味到一种别人所体味不到的情趣；但，看人家画图画的人，当他看着人家一笔一笔在画着时，他也同样地会理解到一种意味，为在画着图画的那个人所不能理解到的另一种意味。在小时候，孩子们总爱听父母讲故事，故事使小孩听了神往，然而，在讲着故事给自己儿女听的父母在当时所迸有的愉快，便决非在听着故事的孩子的无知的心中所能理解出。常常，看见人家在赤热的太阳底下还打着球，或者

因为一些小事，便不能容忍地咆哮了起来。心中常想："那有何必?"但，当你自己在同样的太阳底下打球，同样的事件来时发气的时候，你非但忘记了以前看人家有那样的行动你曾经叹息着的事，并且和曾经那样叹息着时候的你，完全变成两个人了。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到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动和静，也要像两味颜色，调和得恰好，那不是件容易的事。只静不能动，结果便将形成畏缩，退后，没落；反之则咆哮，鲁狂，愤事。静时不忘了动，在乎避免生命的火花之熄灭；而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己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浅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而——

而小病，小病便是这样一个孔孔，从那里，你可以看见人及己的过去，现在，未来。

如同我这样爱小病的人，我想也许很不少。但大部分，在他们的狭小的欲望中，假若他们要过那种小病的悠闲的生活，必得要住深山的寺庙里，澄清的湖边，或者幽邃的泉林里。有的人，当他名为小病时，也就真的是住的这种天堂似的地方；那自然只好算享福。"清闲便是福"；自然，自然像千万幅柔软的绫绣，当时裹住了你的身和心。那完全如画一般的地方，在那里，有迷蒙的远山之影，有听了会洗去你心头一切杂念而飘然

欲睡的泉水之声，有幻变万千的朝霞，有婉转清妙的鸟之曲，有一切你所心爱的而在都会里所没有的自然之色调。要是你爱吟诗，那尽可以随性所之地吟味几句；要是爱沉思，则长静的四周，即使极飘微的尘声，都不会有来扰乱了你的思绪；爱痴痴地立在什么地方看一看天边之云霞的，假若你自己不想回去的话，半天，一天，谁也不会来败你的兴；动得太疲倦了，于是闭了眼睛的在床上息一回，养一养神；或者偶尔和一些老和尚、老农夫，和自然更亲近的那些人们谈一些如油米柴盐等极其本色的话。……尘世的烦恼，有如云或雾，在你脚下，浮来，浮去，只是缠不上你的心，那真是何等诗也似的生活，在那里，你会渐渐地如一个仙人一般地飘然起来。

小病的生活要是这种式样的生活，才令人爱；然而要享受到这种生活，便须有钱。不过，有没有物质上的力量去享受到这种生活是一件事，这种式样的小病生活是否真的顶可贵，又是一件事。在我，如其说这种小病生活使我爱，还毋宁说另一种式样的小病，使我更爱。另一种式样的小病，就是说，那式样，全如平凡的生活一样。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但，站在舞台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的人，究竟也应站得和舞台近。住在深山的庙宇里或者什么类似样的地方，那种隐士般的生活，和现实的世界，如同换了一个地球，如同隔了一个世纪。在那样生活里的人，他顶多，只能就他本身的以往，起一番追忆或忏悔。除此之外，生活不能给予他以更多的意义；然而另一种式样的小病则不同。我小病，我的周遭，还依然是一个喧嚣的、放狂的、杂乱的世界。然而就在那无止的喧嚣、无止的放狂、无止的杂乱里，我却得到了不少比

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每次的小病，它总给予了我以不少启示。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一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观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哲理的。同是一个人，同是一种行为，自己平时也是这样做，但平时的自己便不觉得那讨厌，那鄙薄，而当自己病了睡在床上的时候，看着人家那种扰动的行为，便会不自觉地迸出一种反感了。每次，我在小病后，我便会有一次更紧张的发奋，一次更有意义的自励。在小病中，除却疲倦，没有气力，没有神之外，我什么都不感到痛楚。思绪上，也许常常会流入干燥、枯闷，但有时，也便会更精神、更有条理。周遭的一切，在那更有条理的观照下闪过，那又深进一层的理解，便启示了你一向迷茫了的心和灵。你能够感受到你平时所不易感受到的人生，你能够看到你平时所不易看到的各事件、各人物的真实面目；只有在那时，你会，你才会得到一面明爽的镜子，去观照一切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来看所认为完全是耗费的多余的行为和思想。

不过惟其这样，也许有人会预感到，这会使人更走到消沉的一方面去。但在我，却与这个意见恰恰相反。一切人的营营于思虑、谋划，在他们的无止息的去去来来之间，以那种超然的气息，心平气和的另一种眼光观照来，必定会感到有许多事为可笑，然而这种反感的反映，我以为必然的是和他所引为反感的事实成为相反的对照。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此，同时也更相信在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小病，小病所给个人的自然仅仅是这一些向上启示，而如其大家都能体味到像那样的好处，我相信必定会有一个更可观的事实呈现出来。世上的人大都怕病，病，病我也怕，但像那样的小病，我却爱。我爱小病，那

是因为我能够心虚意诚地去接受它所给予我的那高贵的启发的缘故。

（原载《真美善》第6卷第6期，1930年10月16日出版）

残　　花

昨夜，在床上，我哭了。

我哭了，那是说，我流了泪。我流泪，一滴，两滴，三滴，滴滴滴在枕头上。悲哀的青烟在我心头绞，我想放声嚎哭，但，即使凄咽也不敢。心，心在那无极的感伤之海里就像一条小小的船，失去了舵，也失去了橹。热的血，热的泪，像澎湃的波浪只管向着四周冲。我只能，只能在一片夜的荒凉里，感到孤独，孤独，无底的孤独。想想自己那两年不动的心，现在，又要重复地陷落到像往昔曾经进去过的那无底的痛苦之渊的事，一种凄绝的情调，便会萦绕到全身。5天，10天，一个月，两个月，以前，天天，她见了我，总是一个酒也似地笑。为什么一见了我，她便会这样含情似地笑，我不懂，我茫然。然而，5天，10天，一个月，两个月，太长久了，于是在缥缈中，我仿佛又有些明白。青春就如一层虹也似的轻绡。人，他能够，凭了他的才干，去得到他所营求的荣华或富贵，然而春，春去了，正如朵朵花，将不复再会在谢后开。年来，我的心，就像死水湖里一浮萍，不跃动，也不想去使自己跃动。由你是凄凉的月，寥寂的夜，我感伤，我烦躁，我怅惘；但，我愿意我能知道，我是在感伤，在烦躁，在怅惘，好更深刻地掀起我悲哀的情绪。我只能以往事的回忆来填满我现实的空虚，以过去的创伤来麻醉

目前的荒凉。每每，在四周如死，即使连自己的呼吸都感到可怕的深夜，我自己，也未尝不想：如其有一个人，她真能忠心地给我一些热的爱，那爱，可以医补我以往心头的一切痛创的话，那我，也仍然会，会招回我像当年那样热的情。每一个人，他愿意，为了爱他的那个人，抛弃了他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幸福。即使，即使每天，在一些日常生活上的小小事：我要不要去赴一个宴会，烫一烫头发，弄一些什么新鲜的东西吃吃，或伴她到什么公园里去散一回步等等，我也愿，像一只小山羊般的驯伏，一只小猕猴的乖巧，听她的说话，看她的气色。我情愿，愿意为一个人的奴隶，我忠心于她，永久的忠心于她，只要那个人，她，真心地在爱着我，是真心地在接受着我无底的爱。

然而她，是不是一个像那样的人，我不知道。笑，笑是一朵花，花背后有着刺。她平时，给我的印象还不坏。说不坏，那是说她多少还具有着一些爱的诱惑力。她的影子，她的笑，也像一个胎，渐渐地，在我心头长起来。每每，在月夜，在清晨，心，就像一条游魂似的丝，会飞缠到了她身旁。“这就是初恋？”我常想。说不是，然而我能说不是？世上有许多事是太玄妙了，而恋爱，恋爱也就是太玄妙了的一种。爱的憧憬正如一粒“花之子”，它栽下了你的心，将长成，将长成，将永远地朝向上长成。

但，这憧憬，是否为她所期望，我渺茫，我朦胧。在开初，我也会，体味到我从来未有过像那样幸福的幸福。不知道，每个人，当他享受到了像那样的幸福之后，在睡后，脸上又怎样。然而我，我知道，那桃色的花朵，必定时常会在我唇边漾幻出。我常常做着极其轻快的梦。梦，在梦里，她给了我以无上的细

腻与熨贴。那熨帖，就像种食料，有了她，我将永不会知道有什么生命之饥饿。

昨天，整天，完全在一种倦疲和苦闷中过去了；跟了她，跟来又跑去。为什么我也会跟她们一起去，我说不出。“为的是追求她?”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我生就爱凑在人海里那样玩的对。但后来，我想到，“会不会我之去，在她要以为是为的她?”我又悔，我懊悔，然而我已答应了人家的约。去，是满高兴。然而太高兴了，悲哀就像小偷般，最会正当着你高兴的时候偷偷地躲进了你的心。整天，跑去又跑来，然而我又得到了些什么?——疲倦和烦闷！为什么我不能保持我自己的尊严。要受她的辱弄，由她高兴?她给人家的是笑，是欢快，是像酒一般的醉，而我，我在她眼珠里，仿佛是多余，是不必要的。我常想，如其一个女人对你厌倦了，那你还是额角头放亮些少去和她多话好。因为，否则，那也只有更加引起你对手对于你的讨厌和憎恶。在昨天，我没有勇气去和她多说一个字眼儿，即使多看她一眼仿佛也不敢。她的脸，她的眼睛，以前也曾使我陶醉过的，当时就像个魔鬼，使我见了怪颤栗。想不起，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触犯了她的怒，开动了她对我厌倦之机轮。幸而她高兴，于是给我半个“睬”，否则就是一鼻子冷灰。在当时，我真像一只笼里的鸟，一条缸里的鱼，失去了光明与自由，只是在受罪，在活挨。“她会不会爱我，”谁知道?！虽然她也曾使我尝到过甜的“恋之酒”。

昨天整天我没有吃东西。每个人，他们吃饭吃面都香。但我那小小的肚皮里，仿佛即使连一粒白米也容不下。为什么我吃不下，恐怕只有她知道。甜的，咸的，那一切，天是单单为了幸福的人们而造的；被幸福摈弃了的人们全没份。我不吃，我

自然饿。我饿，然而我又吃不下一些些东西。世上惟有一样东西，能使我当时吃得下，那是什么，那是她的爱。

昨晚回家夜已深，月，月从窗外的芭蕉叶里透进了我的房。熄了灯，我睡在床上。窗外的风，吹动了墙上的叶的影。月是凄清。倦游后的空虚，兜上了我的心，我悲哀，我凄然。我想哭，然而我哭不出。往事像云霞，一片片，在我眼前浮去又浮回。我愿我以后，莫再尝恋酒。但当前，我总还是像失去了灵魂的人，我追求，追求着将我灵魂吸去了的那个人。

今早醒来我头有些晕。我想睡，但我是睡不着。一天，一天便完全在说不出的懒惰中过去了。每到饭时便分外会想起她。想起她，肚就发涨吃不下。几天前，在 J. Park 里，她为我摘了朵花，插在我衣襟上。花，当时是鲜艳，是灿烂，正如她的情，正如我的心。然而何曾有几时，现在是，是灰惨，是憔悴，是枯残了。残花给予我的是什么，是凄凉，是怅惘，是伤感。我悼花，我悼我自己！

1930 年 5 月于何家角

（原载《真美善》第 6 卷第 6 号，1930 年 10 月 16 日出版）

墙

现在我心上真难过。我将用什么字眼来写出我现在的心境呢？我真想哭。假若我有一个母亲的话，我必定会立刻倒在她怀里去哭一场的。也许即使哭还不能洗去我现在的哀痛。没有一样东西能真地引起我一个笑。心为另一层膜扎紧着，所有的欢笑，都是这层膜外的东西。我没有法子从这层膜蜕化出来。我眼眶里时常湿润着，我时常会感受到一阵辛酸的刺痛。我真想到附近的荒郊去将自己的身子放在草地上，让风吹；让风里的沙土刮；让只有天，草，树枝，落叶，黄土它们看见我。我不再去理会自己的活和死，冷和热。我愿意就这样睡在那儿，一直睡在那儿，一直到假若我的哀痛还有消灭的那一天，那么我就在那一天回来。我真想这样。只有这样才可以安排怀着这样一个心境的我。但是，我有哪样的勇气？我现在正挨着病，有几天不吃东西了。我真不愿再去想这些事，真的不要再去想这些事吧！但是我能？我不能！

我真找不出适当的字句来写出我现在的心境。无论如何，要是我能够哭一回，我想必定会在哭后得到一次睡眠的。只有在那睡眠里，我才能真正的抓住了我自己。

我懊悔。我真懊悔。我真的就那样地葬送了一切了吗？我愿意相信有这么一回事，我真的愿意去相信有这么一回事？我

不愿意，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但是我抓不到使我不要去相信它的保证。

我认识她还不久。但她每一样事都给我满足。我真的对于她无止地满足着。更老实地说，即使我所理想着的一个人，也不比她见得更好。我能引什么一件东西或一件事来比拟这呢?字典里没有一个字可以用来写出我对于她所感到的满足。她什么都使我做着美丽的梦。我愿意化为她眼角上的一根眼毛，永远的依附着她。

我们认识还不久，但是我们彼此都能给彼此以一种适意。她是一线光，我愿意认住了那线光，走过去。

我真感谢她，在这短短的季候里，她已经给了我从未从一个女人心上所能领受到的温柔。我奇怪天会生出这样美丽伶俐的小姐。常常，我称赞了她一些，她总要说："真的?"像一个小孩，逗视着我。我点了点头，于是她给我将嘴唇掀了掀；其实，她相信，她爱听我那样的话。所有我对她的称赞，每一句，每一个字眼，都是从我心头飞迸出来的。我为什么要欺骗她呢?我为什么要当她的面说一句假话呢?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她为人家欺骗一次。在她面前，所有的话都是我设的誓，赌的咒。我不愿意太赞颂她，我无庸当她的面说下许多花言巧语。她所有的好处，像经过了极名贵的雕刻家般都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了；我不再会让那些模糊的。

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价值，她待我好。她真是我顶愿意顶愿意的一个人。我情愿告诉她我所从未告诉过人的话；她给我的总是温柔。假若我永有一个像她那样能安慰我的人，这还不够使我更发奋，更上进吗?我们常常在一起走，在苍茫的薄暮里一起走。我挟着她的肩，她给了我她自己的手。即使走了长

远长远，还没说过一句话，彼此也一些都不感到寂寞，都不感到枯燥。我们数着我们在煤屑路上走过所发出来的和谐的蟋蟀的声响。夜做了我们顶和睦的朋友。我们紧紧地相偎着，彼此都体会到一种充实。

有一天，问她晚上有没有事，她说："有。但不要紧。"

她知道我想去看她，于是在分手时，说："要是想看我，那么打过了 8 点钟来吧"。

我很高兴地走开了。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一些些拘束；彼此都很率直了。近来我时常去看她。我知道这不很好。我不愿意使自己的心太热。我愿意在路上走得更平稳些。但是我没有那样的耐性。我一天到晚像在沙漠里般需要一种水分。我觉得只有从她的身上，我才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食料。前天，我曾去看她；昨天，我又曾去看她过；今天我还要去看她吗？我不愿意使自己跑得太快了；但我没有那样的涵养，我心焦地常常看表。

因为知道我来，她早就在门口等着我。外面冷，于是一起上客室里去坐。客室里坏了灯，然而这使我们更惬意。她偎着我的身子站着，将膝弯跪在我坐着的沙发边上。我凝视着她，从她的微笑里，得到无数的温柔。她将手给了我，于是我们这样极任意地谈着些什么。

后来我在身旁的坐垫上拂了拂，她聪明，像一只小白猫般坐下来了。当时，她像一团雪，完全溶在我怀里。我紧紧地将她拥抱着。我骄傲，我愿意给每一个人看见，我愿意告诉每一个人："我也有这么一天，我也有了这么一天。"

我的确从来没有像那样的一天过。以前，我始终只是像一个馋嘴的孩子般站在台角边，但是现在，我当时想，我真的体

会了！那不是梦，那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梦。

我们彼此握着彼此的手，像一个顽皮的小孩般，我将自己的脸，在她光滑细腻的脸上不住地擦磨着，灯光从走廊里射了进来，我感到那样的恬静，那样的光线，那样的人，那样的情境。

远远，不知道谁在奏着 Piano。我真有些感动起来了。我不知在奏着 Piano 的那个人，她有没有料想到，有那么两个人，在流着那样的幸福之泪中，领赏着她的心曲的事。四周没有一些声音，一切都像在等候着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一样。

我心上开始感到一种紧张。我竭力想将自己的眼皮闭起来；但是不行。我再也想不起我当时的心，已经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像一个母亲，一个顶可爱的小孩睡在自己的怀里。她时常将眼皮合起来，像睡在最柔软的一张床上般沉醉着。

我们不再说一句话，我们不再需要说一句话。

她时常又将眼皮睁开来。我每次看到她的眼皮又软软地，一丝气力都没有似地合起来的时候，我便会联想到一些小说里所说的事上去了。我当时真像世上最胆小的一个人，无限的恐惧着。我像野兽般的望望走廊里有没有影子闪过，窗口有没有眼睛灼视。一切都像在等着我们，为我们祝福着。我看着她的眼睛，鼻子，嘴唇。脸仍然偎在她的脸上，手还是放在她的手里，但是我怕，我怕，我怕就此也许要葬送了一切。我再也分析不出当时我自己的心理，我像一只小船在狂泛的波浪上颠簸。

我觉得就是那样也够满足了。我没有野心，没有更大的妄想。但是，耳边吹过了这样的声音："不能利用机会的人，永是失败的！"

我又依然无疑惧起来了。我当时再也不感到一丝安定，我

完全在忐忑中打转着。我得承认我是太懦怯了，我缺少这一方面的经验。我成为了一个冒险家。命运仿佛在说："看你有没有胆跳下这个海。"

她始终没有一些些制止我心头的火的暗示。由我拥抱得紧。由我的脸不住地在她脸上磨擦。走廊里的钟，打了10响，她惊讶地问："10点了？"

"是的，10点了！"我说。她仿佛还带一些不相信。

"10点了！"我感到有一股力量在压迫我。我真愿意像一个小孩般在她面前"哇"的一声哭出来，让她来解脱我心头的困恼。但是我不能，我怕她笑，我怕她诅咒我的懦怯。

时间永是那么板着脸孔走它的路。像一个走了长路的我，当时委实有些气喘了起来。我看看那样似睡的她，蓦的，怀着最后的一股决心似的，像一匹野兽，愤怒了起来。

我将我所有的光明，希望，完全掷注在一个冒险里了。

我的嘴唇开始和另外一样东西接触了，和为我的嘴唇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样东西接触了。

然而，我不愿意太放肆，我随即为两个柔软的手指拨开了。两个手指并没有一丝气力，但我不愿意以气力去征服人家。我愿意尊重那两个手指的主人的心。我让自己的嘴唇移到她的颊上留下一个痕迹吧。

像经过了一阵风暴，一切变了，从晴朗变到阴霾，夏天变到冬天……我的心，猛地从山顶上摔下了地。我感到一生从未感到过的那种恐惧。

她始终不曾有过一丝强烈的反抗。她只哭，不说一句话。她几次将头伏到沙发的靠背上去，但仍然像闯下了祸的我，颤栗地将她扶在怀里了。她当时真像有些忧郁，脸上布满着阴云。有

什么一张脸能比她那时的脸给我的印象更深些呢?!我忏悔了,我不该使她难过,我不该在她快活的心上泼下一盆难堪的水。隐现在一片阴云里的她的脸,是那样美;这分外使我不安,使我懊愤。我太自私了。我找不出更好的字眼来安慰她。我陪着她流泪。

我真感谢她,要是她当时竟然的走开了,那我还有什么说呢?一切立刻决裂了,像一块石头般爆裂了。她没有立即走开,她说她难过,现在,她要去睡了,但是,因为听见我说:"那么是明明叫我走了"这样的话,她仍然很温和地坐了下来。当时我像一个囚犯一般地愿意受她最严酷最严酷的刑罚。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我所犯下的罪恶。但是她不,她没有一句话,她永落在沉默的忧郁里。

我想不出话来驱散我们两人间当时的黝氛……我想到也许我们的结合,就此完了,我便觉得悲惨。我痛,我怕。我问她:"你下次不再睬我了?!"

她摇了摇头。

"你将永远地看不起我了,你将永远地觉得我卑鄙了?!"

她还是摇了摇头。

这使我感激她,无限地感激她。她虽然这样答应我,但是这能制止我心头的战栗吗?我不能从她的默示里得到一种保证。也许她不愿再和我往还了,她当时只是在敷衍我。我是已经被人藐视了,已经失去她的看重了。我怨我自己,我怨我今天为什么要来看她。

时间很晚了,但我们之间的阴云还没有消散。我不能不为她体谅到当一个少女初次体味到这种事所有的忐忑。她答应原谅我,答应赦恕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彼此已开始保持到

一种拘束，我们彼此的心门都关上了，暂时，谁也不让谁躲进来了。

想到她必定会恨我的，必定会轻视我的；我说："××，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的难过吧，很不高兴吗？你不愿意说一句话？"

但是，当时的她，她还有什么情绪说出一句话呢？她说她给我信。

这样又坐了长久，我们简直再也找不到以前所曾有过的一种 Atmosphere。她脸上的忧郁，像永没有消散的希望。我惨然着。

我问："你要睡了吧。"

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去了？"

终于在她第二次的点头之后，我站起来了。

她依然坐在沙发上。我开了门，将身子靠在门沿上，凝视着她，像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些东西一样。

她不响，但也终于这样说："我不送你了！"

"我不送你了！"我再也不会忘记那句话的。我对她施了一个礼。所有的求赦的一颗心，完全在我的眼珠里放射了出来。我悄然地退出了客室。

我退出了客室，我退出了梦之国，我醒了，我清醒了，我开始看见了自己。

但是，我能立即就回自己的寓所吗？我愿意在她窗前巡游一整夜。我愿为她祈祷，祈祷上帝不要在她心头撒下一粒不愉快的子。我祈祷她赦了我的罪。我祈祷我的罪过不再为一个人记得：我要连我自己也忘了去。

我在她窗口近边的树林里徘徊了长久。像从云天里吹散下

来的歌，一声声，凄绝的 Piano 声，不住地刺过来。假若我能够跑到奏着 Piano 那个人的家里去的话，我一定会跪着恳求她，为了救救一个人，不要使她感到太惨绝，“求求你停止了吧！”

像一个囚犯等着她的判决书一样，我在颠簸的波浪中，期候着她答应给我的信。我一天到晚不愿意离开我的房间。有时，像有一种力量在拉我到门口去一样，使我依立在沿马路的窗口，看看东头有没有一个送信来的人。但是，每次，每次总是一个空。每当我实在站得不耐烦，想仍旧回到房间去的时候，也总要在最末的一刹那，向着那一头望望；也许万一就在那样一霎间会有一个人送信来的。要是回到了房间，在没有跨进房门之前，也总爱先在玻璃上张一张，看看桌子上有没有人送来的信。有一次，我听见有一个怪熟悉的足步声从楼梯上上来。

“那是下人。”我心上止不住地一阵跳。下人正站在门外拣着钥匙开门。怀着像一座火山似的心的我，屏息了呼吸，显得特别庄重。我不愿意给谁瞧到我的心，我不愿意给谁看出我有一丝丝不安的神气。我头也不回一回，要是我的，不反正迟早总是要送到我面前来的？但是天和我淘气，下人走到另一个人的面前去了，那是告诉我：“不要狂想你的，现在你是没有人给你来信了！”

我真要咆哮了，神经完全错乱了起来。我真想撕碎我桌子上的书，折断手头的笔，掷碎茶几上的茶杯之类。我想毁灭一切，让一切和自己毁灭了吧！

我不再能忍止了，我不能让自己永久地悬吊在半空里，我不能让自己永远地失去了一些些寄顿这小小的生命的东西。我将被头蒙了自己的头，在呜咽了。

我不再能忍止我心头的火了，我愿意看见地球的爆裂。我愿意让一切体解了吧，我坐起来，我写信给她。

我一口气写了 4 个钟头。我不知我曾经写下了些什么。但我得承认那是我心头的血所开出的一朵花，我送给了她。

我想当天晚上她必定会有信给我的。怀着无论如何是不会没有回信来的心情，我很安定地躺在床上期候着。我时常看看放在枕边的表，8 点，8 点半，9 点……我也时常地这样想："也许现在她正叫人送来了。"

在很倦困的朦胧中，像忽而有一件了不得的事般的，使我像着了魔般从梦中坐了起来。我看了看桌子上，书架上，被头上，枕边，……但是我找不出一个刺目的东西。我很颓然地又躺了下来。我看了看表，表告诉我快 11 点了。房间里的人都在做梦，整座的屋，落到了死的深渊里；只有天边的一轮新月，却从窗角头瞅视着我。

长久我还睡不着。我觉得一万分的惨。是犯了什么罪，我才受下这刑罚！谁能给我这回答？

在这种气息里，我等候着她的信，等了好几天。直到昨晚，像一片落叶似的，才吹进了我的心。我像饿虎似的几乎想一口吞下去，但同时，也像失去了那样的勇气的人，怕拆那封信。

但是我终究读完了它，我知道在读完了她那样一封信之后，自己的心，又迸生出了些什么呢？一个空虚！像地球崩裂了似的空虚！它吹灭了我所有的光明。她说她实在没有话说。你能要求一个没有话要说的人，要她非说出一些什么不可吗？你能要求一个不愿意说一句话的人，要她非说出一些什么不可吗？她又说，她觉得和男人在一起真讨厌。为了自己的清闲，她不愿再多多地接见谁了。她没有说出那个"谁"是谁。她不需要说

明。“谁”，必定有着那么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一切在我面前的东西模糊了起来，我消失了我自己。

我不再记得当时我的周遭是怎样。我只仿佛听见云天里有着一种很庄穆的声音在响，那是“我的丧钟”！

我没有气力说一句话，我只回想起了以前的一些美丽的片断。

……

她曾经称赞过我，她说我有很高的见解，很好的品行，很温和的性情，很优美的姿态。……并且说，这些话都是从她的心飞迸出来的，她愿意和我结识，她觉得荣幸。

……

她也曾经告诉过我，她已经没有了生她的母亲，她也没有一个真正了不得的好朋友。她常常感着自己的孤单，自己的凄零……

……

我们曾经一起坐在太阳底下晒过太阳，我们曾经两个人坐在一起划过船，将船移在深深的柳条里，谈着天；我们曾经在一个夜的荒凉里彼此拥抱着，沉默着；我们也曾经在一起拍过照，拍了照，我说：“我要每种添印两张。”

她说：“为什么？”

我说：“要是一张遗失了呢？”

但她笑，她逗着我的鼻子说：“这种照片也会让它遗失的？”

是的，她也曾，也曾，也曾那样逗着我鼻子，像一个顶天真的小孩，一面笑，一面这样和我说过的。

……

有谁会遗忘呢，有谁再会让这些遗忘呢？

像经过了顶名贵的雕刻家的手段般，那些将永远地镂刻在我底心版上了：她的笑，她的声音，她的睇视，她的风韵，她的沉默，她的忧郁，她的哭……

我们以前，彼此之间没有一座墙，没有一层篱笆，没有树木，没有草，仿佛即使空气也没有似的。我们的心，都有一扇门：像两条鱼，各人任意地在对手的心湖里游。我们不再有拘束，不再有一些些勉强。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从晴朗变到阴霾，夏天变到冬天。我们之间已竖起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墙。我是完全被摈在这座墙外了。我摸索不到那墙的顶点，也摸索不到墙的墙脚。我找不到一扇门，我也找不到一个小孔。我永久地将被摈在这座墙外了，我听不见一些些墙内的声音，我看不见一些些墙内的事情，我再也不能幻想出那墙内的那样温和的气候了。我像一个死尸，也许将永远，永远就这样被摈在这荒凉的墙外了。

我愿意永远地站在这堵墙外面。我等候着能将我所有的泪和血去冲倒它的那样一天。但是我能有那样一天吗？迟早也能有那样一天吗？

谁知道呢？谢谢好上帝，你给我回答了吧！

1930年11月28日病中作于上海

（原载《新月》第3卷第7期）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这几天的天气真糟，糟到极点了。像一只快要断气的懒猫，你不知道你自己该说它是死了，还是活着的好。在几万片死鱼肚上的灰白的鳞片似的云层里，偶尔漏出几线淡黄的阳光，可只一转身，又仍然摆出了一副十足可怕的脸色。当真说下雨，又没多少雨点落下来。只是弄得满处都湿，像一个褴褛的孩子，叫你见了怄气。

然而比这天气更坏，更没劲的是我近来的心境。我从来没有像近来般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那样不可疗治的病态里过。我不明白究竟是为了哪一点，也没有理由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回答这问题。即使因为早年就没有父母，从来不向谁诉一声苦的我，前次也接到了家里来信，说对我不放心得很。虽然过后又懊悔何必去多嘴，但毕竟暗漆的生活太使我透不过气来了，我写信给伯父，说近来身体和心境都坏到极点，似乎坏到无可收拾了，我不再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还要让自己再生存下去。家里来信劝我还是回家休养休养吧，但我觉得回去了未必心境就能好，而且也许会变得更坏了。这身体，不是一年半载会变成健康的，挨一天算一天吧，我说，要是暑假里能上山里去住两个月，也许可以好一些。

我这个人以前是很积极的。对于自己的将来，做着若干伟

大的梦。我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那样随便地在这个世上消灭。但近来，这两三个月，我的思索里逐渐沾上了一层灰色。我好笑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觉得有一种黝暗的念头在自己的心上渐渐芽长起来的危险，一方面又充分地任它芽长去。人是有些小聪明，我告诉茜这样说，不能完全说低能。但是种种不可避免的



自然这只是一些正在打滚的思绪，我现在还并没完全走上了极端的厌世的顶角。生活虽然使我落在没有一丝弹性的烂泥里，但朋友们却还能时常从我的酒涡里找到笑的痕迹。许多人因为一种压迫到无可解救，于是去死；但为了逃避精神上的折磨，愿意放掉在这个世上一切物质的享乐的也很有。这一种念头要是在一个人的心头一栽养到成熟，除非真有天大的力量跳进他的心，一切挽救，皆为罔效。虽说真的要去决然毅行的时候需要一种大力，但你能说，这大力，在某一时期并某一事件下，你不能充分地使你自己得到吗？

人是不该太聪明的。太聪明的人，固然有他别人理会不到的乐趣，但同时也就有他别人理会不到的痛楚。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是太强了,我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不能过分地抽烟、过分地喝酒，也经不起极强烈地震动。然而一天到晚是毫不爱惜地在浪费着自己的脑力。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的不懂得去珍重自己。每天很早的就醒了，好像我的眼部构造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一样，无论隔夜睡得多迟，只消天一亮，我便不再能让自己在梦里多逗留一分钟。人家是醒了之后，许多事情才跳上他心头的，但我却是像先有许多事纠缠在脑子里，才想醒来的一样。我常常会凭空做下许多文章。我相信这一些用脑汁在空中连构下来的句子，都比我写在这一些纸上的更要华丽，生动得好几倍。只要偶尔一件极小极小的事跳上了我的心，我便不能再多睡一回了。躺在床上则乱想着许多事，像一座磨，许多碎屑跳了进来又滑了出去。这些自然都是最伤身体的，但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收拾它。

我常常为许多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看见好山水，

也会流下泪来。一切为旁人所引为非常满足的事，在我感受来是依然失望的。一个人不能不寻出一件适合于他的事来安顿他的心灵，但近来便没有一件事令我高兴。我怕去翻一页书，写下一个字。生活里像有着无数万个缺陷，成天地徘徊在孤独里。跑上了楼又想下去，在草地上看见春天也只悲伤。我不明白自己该怎样去安排这个身子和这颗心。我又不爱上跳舞场，不爱去戏院，有许多可以来麻醉我的消遣，我全不爱，这些自然都是生来使自己应该更多受罪，谁叫你不能将你的趣味更迁就一些呢？一天到晚在祈求着一种刺激，但又没有一件事能令我忘去自己的苦恼，近来我常常想去看一些卓别林或罗克的影片，我想别再太傻了，有机会，还是花一些钱去买几小时的欢笑吧。但为怕在片子没有开映前一个人坐在戏院子里的寂寞的袭来，也仍然使我懒得动。近来连报纸都不很去看；我一天一天地颓唐下去了。

为了这样，茜几次写信来劝我。我自然因为彼此有一些小小友谊，我不该完全隐讳说我不需要她给我的安慰。她上上海来看我了。前几天，像一阵清风地来的她，也终于又像一阵清风地去了：没有收到她的好处，却受到了更苦恼的折磨。那自然也因为天下雨，她又是那样的忙，我不该有一丝怨恨。世上的人情原都是假的，要是你自己没有力量去推倒你自己的命运。你得劝你闭上自己的嘴。我也曾经好好地安排下一些日子等她来。但雨丝只给你织出一个惆怅的梦；她走了，她走了，她在我梦里走了。

我不能当着 Gorky 的面问他怎样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女人是顶坏又是顶好的东西。有许多青年的人，为着女人在闹死。什么都懒了，不能写下一句诗；这似乎成为一种世纪病般到处在

播散传染着。我近来的心境坏是为了女人，但我也不能完全隐讳说不是为了近来的生活里缺少了这一份食料的缘故。

朋友们也从来没听见我嘴里吐出那些苦恼的字眼过。是在一个阴沉的黄昏，和几个朋友在路边散步。黑夜不能给我更深的惧怕了，星星没张开它们的眼睛。我颓然地靠在一株梧桐树上，远处的柳絮，殷勤地飘落到我头发上来，天像真要将我弄成完全不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了一样。他们听了我的话，显出了一种不自制的沉默。从一个素来不染一些些厌世观念的人的嘴里忽而听见许多可怕的句子，似乎只有沉默才能表示出他们的惊讶。他们说准是为了一些 Love 的勾当，这自然我不该承认。我写信给家里也说，一个人的心境，坏是无数个因子渐渐地凑成的。在这儿，我该说到一些成家入世的话。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怀有一个最高的奢望和极低的迁就。将生活放在极机械极有规律的格局里，是许多人的愿意，维持一个平凡的一生。另一部分便不做这种安排。我自己得算入后一种。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自己究竟想飞到多高。天地是那样的大，大到可怕。许多正在呼啸着的人们，你不知道他们在你心头又得到多少崇仰和藐卑；然而他们的活动能让人家知道已不容易的了。机器的腾达将我们对于生活的胃口提得够高。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怎样凭两只空手去造成你梦里的伟大的功业和华丽的天堂！你也不能去问一问你自己的命运，问它你有没有这个命运可以使自己努力去将那像一只没栅栏的马的“现实”牵进了你理想的圈栏！

这些都该算是很渺茫的事。在对付这当前的困恼都感到局促之中，还要抽出工夫去想那些不可知的事，我该承认完全是自己寻上身的罪孽。一个朋友说，像落在水里般只向下钻是不

行的。人单整天地在盲想，够危险。因为这里可以使你得不到一个解救。我该快些去找一些书本子来看，靠书本里的东西来抗御那些外来的袭击。这是一句顶恳直的话。如其环境不能变换我生活的情调，我只能用理智来解救自己了。但是实际上我近来对于一切事都怕，让一切都停顿着。书本上的灰尘渐渐地在加厚起来，我委实没有一丝胆量去找什么哲学来读。似乎自己也真不想去收拾这潦倒了。身体是坏到极点。常常心痛，而且郁塞得利害。成天困倦着，我真不能告诉你每天睡眠要占去我多少的时间。明知是这样，我该更其去爱惜自己的身子了，然而不能。我为着许多事在空烦心。人生来就不是能开着眼睛装做不见的人，心上怨恨也只该让自己知道。偶尔吐一两口血，心肠硬一硬，也便不去给以悼惜了。

这儿的地方又坏，坏到无可形容。简直比牢狱还糟，比坟墓还可怕。我成天地诅咒着。没有勇气立即走开这地方，然而又真恨透。没有一块地方我想能比这块地方更使我诅咒的！全没有一些生机。全没有一些蓬勃的气象。一切事情都使你听了来气。我不懂得许多人很情愿地逗留在这儿是在等着些什么。朋友少得可怜，只有忍住气才能稍稍和他们敷衍几句。像这种环境真使我怕再留守下去，我真愿望自己能立刻离开这座文明的牢狱。

……

真不敢再想下去。一切都使我怕。季候是坏到这样，这10天来我没好好吃下一碗饭。看一看天对它白一白眼，它照样的似乎在想逼死我。全没办法。人生就是那样的 Sentimental，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像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没有停的一天的希望。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应该想一些

方法来收拾我自己。昨天茜又有信来，说不知我究竟需要些什么。谁能够救我呢，她说，真是个可怜的孩子。说可怜，也真是自己活该。对于她的温柔，我是无法拒绝的。但是我怎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又告诉她，谁能够救我呢？

傍晚时拖着枯瘦的身子在路旁散步，篱笆里已画上了很浓很幽邃的绿色。树木到处繁长着，像一个人头上长久没剃的头发样的懒散。景色完全是初夏了，那是说，又一个春天放跑了！

1931 年柳花纷飞时在上海

（原载《新月》第 3 卷第 12 期）

一段军行散记

一

1931年的下半年，中国的一般知识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全疯狂在一种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的冲动里。

一个人爱他的国家，与其说是理性的怂恿，还毋宁说是感情的泛滥。爱国这一宗思想，在时代的巨轮下迸裂出来，也就会得在时代的巨轮下消灭。但在近世，一直到20世纪的目下，这一宗思想，不断地飞跃着，达到了顶点，所有在这些时代生下来的人，似曾都收下过上帝渗给他的一滴血：他爱他的家庭，爱他的朋友，也爱他的国家。

1931年下半年的中国，是枯枝上将要落下的一枝叶，一粒石子已滚到千丈深的绝崖的角线上。一窠穴蚁眼见大流排山倒海地冲过来，拔起了厦屋，拔起了摩天的大树。像一个怨秋的寡妇，中国人在那时，是哇的一声哭出来了；一个纵然是下钝的低能儿，也要卷一卷他的衣袖，将拳头在他带着泪花的红瞳子前扬一个威风。11月下旬上海中部的一座会所里，有着几十

个年轻的人，有着铁一般贞坚山一般端重的心，权当他们就算是那么一个低能儿，他们也要吐一吐低能儿的戆，一次不可欺侮的血性。

这几十个青年，抛下了他们二三十年来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所积蓄下来的物质及精神的全部产业，合着他们目标相合的同志，要想爆裂出一声，爆裂出一声像狮子的狂吼；演一次，演一次像飓风卷起了太平洋的大浪。他们要带着他们不可忍的义愤，跨过那雄壮的山海关，上山海关外去洒下一摊血，为他们老大的民族开一朵鲜艳的花。经过千百的努力，靠了同情他们的人的助手与鼓舞，在××月×日的上午，他们检点他们的同志，有着三百不到这样一个数目。

在这三百不到的一支假军队里，有着他之一员。

二

在出发的前一天，他从北四川路的一座酒楼里走出来。他经过那密排钢骨的外白渡桥，在太阳里吐出金圆文明的沙逊屋顶，以及像一团混浆的日升楼下。他又在一些静穆而带几分萧条的马路上走过，看太阳将自己的影子，从马路的这头送到马路的那头。在那时，没有一个人再占据在他心头，也不再有一件事拨动他的记记。

他在均匀的呼吸里回到学校里。坐在椅子上，看一回挂在他自己床头的那两幅大油画。他看过一排在书架上好好站着的书，看见半段网球拍的柄横在桌子边，那上面，有着他无数次

的手泽。抽开抽屉，信手一翻，没有一样东西有他的需要。他摊开一本历史，对着 Byron 的照片凝着神，在那小小的照片上，他留下了一个吻。

他草草地卷起一条被头和一条毡单。要的衣服全加在身上。一切为他所爱读的书和他自己写下的文稿，那时全宣告失散了它们的主人。

有一个朋友要他去吃一杯咖啡；能以一杯咖啡来作他们几年来友谊的收场，在这颠沛的国度里，仍不失为一宗幸运。在暮色里，他伴着他那朋友，在一条沙沙的泥路上走过；那沙沙的泥路，它受过他无数次的软步，它伴过他有数次的寂寞。

在一支淡淡的灯光下，他们对坐下来。他下意识地看看他那朋友终年撩乱的头发，和一个小小带一些红的鼻子。一切挑不起他的兴奋，在黯然里他吐着黯然的感情。

所有的那一整天，盘据了他的心的不是英雄意识，不是生命留恋，也不是死犯的恐惧；只是一个死犯在去刑场路上的无知。

他在夜色中悄悄地离开了学校。他不曾对着天空吐下一声多情的辞句，带着小小的一个衣包，在错纵的人行线里，走进了他们的团部。

团部驻在一所阴惨的会馆里。在那里，没有明亮的灯，但却有无数明亮的心。他不认识一个人，他不需要认识一个人，每个人都像是他顶亲昵的友人。

第二天下午，大队开到北站。蹭动的群众向他们包围过来。像有一种大力将要转运地球，一声呼喊震碎了天空。不断地狂

号，不断地鼓掌；一片的血流，一片的泪流。纸条儿从东头飞到西头，南头又跳到北头，民族原始的兽性在那里放量地挥发着。

队伍蜿蜒地行进了月台。成万的群众散布到广大的空地上和轨道上。欢呼与掌声暴风雨般在空中旋转着。

在那时，他有的是一支钢炭刚着上大火的力道，同时也有着那样的文静与沉着。他害怕让自己的视线和任何一个人接触，他怕他为任何一个相识的友人瞥见，他也怕他的脸影在任何一个不相识的人的印象上留下淡淡的一点。

有两个他面熟而不知名的同学，要求为他摄下一张照。他自然没有拒绝他们的要求的理由。他在一次热热的握手里，谢了谢他们的关切与殷勤，他们又悄悄地在他的视线里消失了。

列车要在夜间 11 点 40 分开行，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散去了。

为意外的鼓舞所充斥了的月台；在那时，便现出了一种更其深刻的冷落。从队伍进达了北站，一直到那夜深，不断的扰乱是许多同志家族的寻觅。父亲，母亲，姊妹，兄弟，妻子，未嫁妻，情人等全有。他们都像失去了灵魂的人们来找寻他们的生命，眼睛里射着悲哀的火和死之恐惧。就不是家族来闹着要拉回去，也准有许多亲戚朋友送行。一回鼓励一回祝福，一段别离一段恋情。在默对与暗泣，挥手与洒泪里，他看到不可分的骨肉的恩情和朋友的连系。

他，他没有父母，他没有兄弟，他没有姊妹。他也不愿意让这种消息在一些朋友的心坎上掀起纵然是极微小的一个浪花。他只暗暗地躲在角落里，看着人家的扰乱。一方面，虽然

他感到微微的寂寞，但在那微微的寂寞里，又收到一种没牵挂的骄傲。

列车原定 11 点 40 分开行，但当道的压迫，使队伍在愤恨里，在月台上坐守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不再希望得到路局的恩惠了。他们骄傲他们自己都有两只提得起的脚。队伍决计用步行向西进发，铁石般决心克服了一昼夜来的疲困。

团旗在旷野的鲜风中飞扬着，在那飞扬的波纹里，有着那近 300 个年轻英雄的灵魂。

三

在一种活跃的鼓舞里他们一路向西推进着。每个人都带着伟大的忠诚和澎湃的热血。从一早起来，到晚上休息，整整的 16 个钟头里有的是矫健和饱满。没有一个人流出一分颓唐，懒惰，或萎缩。在路上，一整排旗在一行队伍前面作着前导，司令是一支号，它支配着全队的进行与休息。大队沿着无尽头的铁轨迅速地向前移动着，经过每一个城市或乡镇，他们都受到广大的群众的欢迎和招待。

在循次下，队伍抵达了××。也活该，是他逃不掉的一次折磨，在不经心中，他遇见了他的“Dear”。

他的加入这一次行军，在时间上是很短促而匆迫的。但就不是为了时间的短促，他也找不到理由说，这种行动要先征求了她的意见再决定自己的进退。他只在出发的前一天，曾经涂

下一个条子寄给她。自问原没有再见一次的机缘了，活该中途又改了步行。

在那时，不消说，他看见一粒一粒发亮的水球在她那美丽的带着悲愁的眼角上连珠似地落下来。但她的悲哀拉不回他的决心。他默默地在她润湿的眸子里消失了他自己的阴影。

在离开××时，他偷暇给她写了封信。他说："我爱我的国家，正如我爱我的 Lover 一样。"

一个男子，毕竟有着他比恋爱更重要的责任。他不能为了爱一个女子，便抛下国家，假如他真正地爱那个女子，他一定格外爱他的国家。

四

经过了 10 天的路程，大队进达到南京。在南京，有一次小小停留。

这一个集团里的分子是很复杂的，各式各样的角色全有。有军事家，学飞机的，修理桥梁并器械的，当过营长和炮兵连连长的；有小商人；有艺术家，会画得一手大幅的好油画；有小说家；有诗人；有教书匠；有医生与看护，救护队是他们的分子；有工人；有伙夫与杂差，一行的伙食由他们担当。如其说程度，那就更齐全，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连一个字都不识的。这成分，真够你想起了中古时期十字军东征那可怕的情境。

每天天没亮，号子就吹破你的酣梦。贪睡是你自己的不长

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寒雾中，大半是用冷水来洗刷你自己的脸；要是你起身得迟，那你的脸就得搁到点名和早操后再收拾它。从睁开眼睛起，到什么时候才有东西滑进你的肚，你全没把握知道，正如一切人全没把握知道命运将怎样来安排他们一样。有工作做的，忙着他们的工作，一片紧张里的一片杂乱，一片杂乱还加上一片紧张。每个人，从不相识到亲昵，开口没虚套，也不用安排许多曲折，说笑是大家的份。一声用饭号，于是，像大水灌进一个低塘的瞬息，一群饿狼开了闸门地狂奔，你就眼见几百双着了慌的眼睛，眼睛里冒出来的绿火，也够使天地变一次颜色。有桌子时，大家围着桌子立好，8 个人，少不了一个；没桌子，泥土是你的桌子也是你的椅。大家不说一句话，只听到一片不规律的窸窣。饭量大或吃得慢的，那时全得加快，再一声令，像泰山一样的重，就由不得你多延宕一分钟。站好，归队，解散，再去洗你的碗筷，你自己的碗筷真得当心管束好，否则挨饿准是你的荣耀。

晚上，没大屋时大家分着住，有大屋就住在一起。像伤兵院里的安排，一个个地铺，在横直的线条里，一次休息号后，大家收拾起他们一天的疲劳。

在那一团里，他们有的是严肃与服从，不是放浪与自由；要的是整齐不是美。

五

5 天 5 夜的挨，到头完毕了他们津浦线上的长程。

这 5 天 5 夜的长程里，他们一共吃过两次饭和十几个馒头。水在那里比在沙漠里还稀罕。每个人，像四五岁的乡间孩子，只要有食料，就得没命地往自己喉管里塞，干净与卫生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用的字眼。津浦线沿路不缺少有着各种各样的食料买。烧鸡是头挑的吃品，其余像大饼，珍珠米燃的粥，或元宵。每个人的手，那时都变成一个厨师的手，脸是一个挨了 10 天 8 天病的吃红丸子人的脸，灰尘和着你皮肤里迸出来的脂肪，像一个南非洲人用油涂着他们的脚般的粘牢在你的脸上。眼屎成了你顶知己的朋友，时时不忘地来访问你。你所有的世界是一方尺的世界，要不是，你就准侵略了别人的势力。

没有睡眠，没有食料，没有水分，没有空气与日光，像两车厢猪仔，从南头运上北头，那情况，比“动荡中的苏俄农村”中所描写的还可怕。但是在他们，他们却仍然紧握着他们的决心，一种宗教般信心永远在燃烧着他们的热情。

六

现在，他们那一支人马正停留在北平，他们在那儿，暂时

受一些军事上的训练。身体虚弱现象的日渐露骨，煽不起他对自己发生一点恐慌。他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生活放在一种规律中，冀期能保持他几分健康。他在那儿也不和一个朋友多写下一封信，他尽量地努力着维护他心头的平衡。

一路上，他没有回忆或留恋，有的只是无止的雄壮的憧憬。紫萝兰颜色的灯光，灯光下亮地板上的婀娜的身段与腰肢，是Fox Trot 或者 Waltz；一束皱皱的玫瑰红的窗帘布内偷跑出来的像云雀在云端里散下的歌，是 Stain Song 或者 Dream Lover；在涨红了脸将炸开了脑袋里的疯狂与浪漫里，来一杯鲜血样的葡萄酒或者淡淡的苦咖啡；手弯里带着一个小姐的美丽与聪明，一起在春之晨看朝霞或者秋之夜看新月；这一切，不再有他的份，也不再是他的羡慕。他也不再会坐到一次天鹅绒似的沙发，看到卖淫妇一双妖媚的眼睛，在用红木砌成的地上留下一个脚迹，吐出为一个女人拂一拂头发上的灰尘的一分小心。恋愁与惜别，3000 里的相思，都不再捉住它们自己的稀罕。他也不再想，让成千成万的群众，听着自己的演讲，给自己拥护，给自己鼓掌。他的心，永远落在广漠的塞外的一个帐篷里，他的眼睛就永远望着那挂着他自己的心的那个帐篷的顶。他不再让自己颈子向后画下一个小角度。一切旧尘，像落花，让流水带去；像枯叶，给西风送进黄土。他梦着摩天的关门，关门上的一额横匾；长城万里，万里城上的朔风。绝塞的严寒，凝不冻他的热血；夜半的哭泣，吓不碎他的雄胆。他要让自己去承当那几千里一片广土上的月色，在白白的月色下吹一段凄壮的胡笳；他要奔上那不长一根青草的山头，在山头上引吊一回那破碎的山河。要带着张飞般的喉咙，从这个山头一口气奔上那个山头，要在错纵的山头，蜿蜒的河流和无边的平原上，洒遍他的鲜血，用

他的鲜血来浇退敌人的气焰。

1932 年 1 月

（原载《新月》第 4 卷第 1 期）

来　京　记

自从去年7月吃了论语社几位朋友的饭以后，我和这些友人便暂时分居了。分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住山中养病去了。

其实，我又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病。比如说，我在山上，一顿能吃两碗多饭，每天略看一些书，高兴还得随便写一些文章，早晚看云霞而已。

我家对门的一个小皮匠生了12年的癞痢，还没敢昌言入山养疴，而我为什么居然会屏绝世事，独往山中去了呢？看官有所不知，原来我幼有大志，虽不想做万世皇帝，可起码也得做一个如现在所谓的要人。可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要人，积2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在生病上训练起来。假如你不懂得在必要时将如何嚷着说生病了，而此病又必须休养的话，那么要人之梦，便全没你份了。

我是一直住在京杭道上顶闻名的庚桑洞里的。我为什么要跑到那地方去养病呢？原来也有一番道理。因为匡庐我虽想去，但已有了林主席；香港即使没有胡前立法院长，我也嫌它与我的根据地江苏太远，有鞭长莫及之慨；妙高台不消说更有蒋委员长在那儿，莫干山周家虽有渊源，无奈凭空又飞去了汪行政院长。我之不能往莫干山，正如胡之不能来匡庐；我之不能去匡庐，又正如汪之不能往妙高台。原来在中国，我们都必须各

据一方，才好做手脚，才能培植自己的声势；这就是我所以不得已还是选定了自家的庚桑洞的苦心。

可是我住在庚桑洞里，有一件事使我心上大不满意。原来当地的那些新闻记者一个都不来晋谒，这也就难怪萧伯纳在香港对路透社访员说中国的新闻记者幼稚了。

我在庚桑洞住下不久之后，吴稚晖、何应钦和李书华三位先生都也来游洞。我不十分清楚是不是他们因为我到了那洞以后他们才来的，不过怎么我以前没有住到那儿的时候，他们从没想到去游庚桑洞呢？可见其中自有缘故，这在我倒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只是看官诸公，你们切莫误会。他们三位先生来游洞，我事前毫无消息，事后也并无任何表现，可见一无政治作用，外间流言，实属可笑。

自从他们三位先生来过之后，我那门前便渐渐有新闻记者的影子出现了。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先生问我，前次吴委员何部长李部长来游，是不是都由我招待，我颔首答之，可不料，那位记者先生就此以后将我的生活起居也时常在当地的报纸上登起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又没有给过他们津贴或其他好处。后来我遇见那位记者先生，问他什么道理，他只笑而不答，我至今莫名其妙。

不但报纸上给我登起居，并且朋友们在谈天中也便常常引到我。比如说，“我的朋友（应当改为好友，真好友）储安平现在在庚桑洞养病，”这样的话，有许多认识我的人近来都很爱在嘴里吐出来的。什么道理呢？还是其中一个顶老实的朋友告诉了我，他说，捧自己的朋友就等于捧自己，这叫Team Work；我恍然。

天下原无不可医的病，什么病得用什么药。比如说，金鸡

纳霜是医疟疾的，情人是医相思病的，有的病则如院长部长也可医，且竟有如百龄机般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者。我去养病原是训练做要人。可是“要人病”的好坏有时全不能让自己作主，有时又自己一个心血来潮也可作得了主的。要人病大概只能生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如两三年这么生下去还不见起色，也许从此就不“要”了。有一天晚上，我忽而明白了这一层，于是第二天早上病即霍然大愈，决计下山。

做要人是有步骤的。大概先上南京，其次是上海（青岛或香港或澳门也可），终于出洋（自然是考察）。出洋之后还有余勇可买，于是再在上海挂一下律师照牌。我那时正有不少友人约我上南京去，我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他们即日来京。

从庚桑洞到南京只须坐京杭汽车即到（庚桑洞目下尚无飞机场，此注）。当我正将上车时，常州忽来了电报，说外祖母死去，于是临时只得转乘小轮到常州，在灵前磕了头，第二天乘火车来南京。

我以前坐火车的哲学是宁坐三等不坐二等，因为略苦几个小时，即可省出一倍车票。后来这个哲学忽然转变了：宁坐二等不坐三等，以为只多出一倍车票即可舒适数小时，又何乐不为。但最近，我的思想又更深入了，就是放弃永久主张，且待机行事。我觉得这态度是顶可取的，因为这态度可以饱暖一世。

我两夜未能好睡，所以在车上很乏，打起盹来了。突然之间我忽然觉得有人在偷我的皮夹子，于是我陡然而起，轰轰烈烈地将那个小窃捉住了。那个小窃很可怜地向我讨赦，我也觉得他可怜，不欲深究，以防意外。继而一想，他向我讨赦是他的本分，我赦了他亦没有什么稀罕，为示我宽宏大量起见，我即从皮夹子里摸了四角小洋给他，他出乎意外，大谢而去，于

是我觉得光辉满脸，甚有面子。

过后我越想越高兴，我已经有如此怀度，将来很够做一个外交大员了。

我的车票本来是买到下关的。车过龙潭时，我忽而一想，假如在南京的朋友们知道我来了（因为常州火车站的记者先生早就打了电报给南京了），他们真的在下关车站上接候，并且在月台上挂了一块大白布，上面写什么“欢迎储安平同志入京共赴国难”等的字眼，倒叫我一时为难。于是我决定为避嚣起见，在和平门悄悄下车。

出了月台照理是检查。我于是目空一切地从皮包里掏了一张名片给他。那个检查兵看了看名片，片子上只刻着光头的储安平三字，并无其他官衔。他看看我，忽而行一敬礼，我俨然跳上了马车。

后来，那些朋友们知道我来了，于是纷纷都来看我。当晚许多同乡给我设宴洗尘，并请演说，我早知有此一着，故演说稿在车上即拟就了。凡讲 48 分钟，其大意如下：

> 生于今日之中国，其责任较生于任何时代之中国为严重。今日之中国者，可怜之中国也。使此可怜之中国变为不可怜之中国，皆吾辈之责也。然则如何方能使此可怜之中国变为不可怜之中国乎？曰，只有一法，即全国必须一心（鼓掌），民众均服从政府（鼓掌）。盖未有内不安而能攘外者也（大鼓掌）。诸君其勉乎哉。

第二日午饭，许多老同学请客，我想他们如也要请我演说

即糟了，因为他们都是老奸巨滑，很难对付的。眉毛一皱，计上心来。原来做要人必须肚子装满九套话。如九套话应用过了，还有一套，就是："为政不在多言"。我那天就应用第10套一次，居然也敷衍过去了。

这篇来京记写完了。我以后为表示国难期间，精诚团结起见，决不高蹈。可是有一点要声明，"如林大主笔叫我写南京通信，恕咱不能答应。原来咱这傻瓜，写文章用真名字发表，如写南京通信，万一出了乱子，怕不成第二个刘煜生和王慰三?(但我自愿写的自然例外，做中国人说话，必须多留余地。)

1933年2月　南京

(原载《论语》第3卷第14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豁蒙楼暮色

今天身子稍为健了些，清早在院子里散步，看见柳条都发青了。只两天没有走下床，外面的世界便变得那么快吗？新绿这色调我是十分爱的，但我又觉得这颜色太刻薄。一个中学生顶愉快的是礼拜六的晚上，一个孩子顶活泼的是过节过年的那一天；可是对于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永远是希望生存在百草尚未上绿那样的早春之季的吧，这样想着的我，却非人情地绷起一种暮春之感，仍然踱回到自己的房里。

我到南京已有一个多月，仅仅看见三天有太阳。今天天气还是那样的像一个吝啬的房东太太的脸，像一个高官府上的门房先生的眼珠子；总之，使你见了要苦笑不止。

饭后在床上假寐，听窗外淅沥之歌。睡了 3 个钟头，犹未成眠。沉入于一切杂感之我，于是披了衣服起来，撑着雨伞走出寓所。常常在许多地方，会因为看见自己的形单影只而引起若干孤独之感的吧，但索性抱着一种悠闲的心情，一个人在外面踱踱，倒又觉得无上高雅。怀着这样一种超然的心情，随便上崇山峻岭、江河大流、荒落坟郊，或士女错综的都市公园里，都能得到一种冲淡之趣。我向台城走去，沿路风雨交集，还疏疏落落夹些雪珠。这衰弱的身子不够这样的摧残吧，但也只有风雨的狂暴可以杀威我的伤时之感。城墙向东头的山腰里铺过

来，从我的脚下再伸出去，一直到北头，十分严肃。玄武湖偎着城墙，若稍带一些书卷之气看来，俨然是横条一幅。村庄如睡，树木安静，湖水没有言语。纵然有雨点在逗，但在全景上，也仅仅因此加重一点灰色，如一个年轻的新寡，在严肃的城墙下，守着静穆，不敢叹息。

天十分惨淡，云是灰暗的，一层一层泛起，在远山之顶上厮摩着。紫金山一带都隐约地躲在迷雾里，仅仅看出一些轮廓。我十分喜悦这种情境。我喜悦山影在迷雾里，我喜悦月亮在迷雾里，我怕黑暗我爱薄暮。——我爱在薄暮里，像是消失了自己，像是还看见自己。

我在台城上这样闲散自在地走着。我俨然如天地万物之主，又俨然觉得天地万物间无我。既无我，也无我之叹息了吧。

这样忘形地笑着，我跨进了鸡鸣寺。

我在豁蒙楼上靠窗口坐下。这样的大雨又是这样的傍晚，我之来，真是非人情的了。我悄悄地听那壁上钟摆的滴答。庙堂里的晚钟，那样沉着地破空而来，真使人听了吃惊不止，钟声在空中持久地回荡，若有无限禅机。一个因早年失身而落魄了的女子，至此会不顾一切地去跪在神座前流着泪忏悔了起来的吧！这钟声在空中之回荡，真能使人听之默念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这样幽然神往之我，仿佛真有出世之感。生老病死之外，再加上因近代都市文明的加速而增加的幻影消灭之悲哀，真是人生无往不苦，既要加餐，又要排泻；既要早起，又要晚睡；宇宙在白昼与黑夜之循环交替中延续下去。人们大多不愿意自己叹息吧，但无声的叹息比叹息更惨。我之上台城，想略略减少

我一些无声之叹息吧，但我恍惚又需要更多之无声的叹息，好用以来延续自己残破的生命：人世一切真是非理可喻。

被远山背后的反光所耀，我从幻想中再去看湖光暮色。湖面被夕光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于黑暗，似亦心甘。一群不知是白鸽还是白鸥，总之是那样白得可爱的一群，在湖面上扑落飞扬，遥远遥远，终于又在水光天色里消灭了，仅仅留下一些残影在观者之我的脑子里。

八九年前常常跟着人家来此喝茶之我，至今还能了然想起小孩之我是如何地活泼。10 年 20 年后之我，再来吃茶时，也仍能一样了然想起今日之我那样冒雨而来的固执吧，这样想时，仿佛在一秒钟里已经过了 10 年 20 年般，见到将来之我，还一样如今日之潦倒。去年春天，我有一时睡在床上，见了友人且说着“非病也，非愁也，愁病耳，病愁耳”一类的话的，这事，实俨如昨日。那时因心境坏到无可收拾，于是老在午睡里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之我，想起无福享受春绿风光，还记得有过如下的句子：

醒后依着枕头听窗外鸟鸣
春鸟偷偷地告诉我春天的多情
照一照镜子看见脸上泛起的春红
上帝准知道我当时的心境

可是曾几何时，今日又再见柳梢染上了新绿了！少年心情最难

测，近来，若有理由，若无理由，我说恍惚如有所失，仿佛连发奋亦属多事似的。

曾经在我自己的感情的颜色与光彩一文里说起一个人的感情有严肃与泛滥。严肃与泛滥的程度相差到可惊，这真是我之固执了。仿佛很有决心不去再浪费时间在一个演剧上，但忽然高兴在一个黄昏的工夫也竟会合着几个人连脚本都抄完且印成功了的（这样的事，在我真是常有的，曾经几次发奋，说非读熟万卷书不可的我，可是在颓唐来时，也仍然会让日子10天半个月的那样白白挨过去），这样的事，当我在第二次再发奋时，又不禁要引为可笑。没有几天前，在玮德家里和他默默对坐，两人都十分乏，反对上什么地方去跑，可是到头又都让自己将乏倦的身子抬上了豁蒙楼，在豁蒙楼上坐下，也感觉乏趣，但又无有勇气再走出来。看山也呆板，看水也呆板，一切都单调，狂饮着无一丝儿茶味之水，没有一句话可说。且看他人之高兴，及其喝茶姿势，起初倒颇感兴趣之我，忽而又觉一切人皆可怜。但也许当时更有人在以我为悯恤吧，这样想时，又意外的使自己吃惊起来。

正在那时，一个和尚捧了一盂茶走进豁蒙楼来。他在另一头靠窗坐下，和我遥遥相对。以我十分孤独，他特来伴我一坐的吧，作这样想之我，便向他招呼："今天贵寺很冷静呀。"

那个和尚若听见若未听见，隔了长久，才"唔"的吐出一次微声。

一个俗和尚呀——我心上作如是想。

但既以为贵寺今天很冷静，又何必再问；这样自索着的我，想来又觉得十分可笑。如那和尚给了我一句答话，也许我便无

从再发觉自己之可笑了吧，这样，我觉得那和尚又甚有道理。

“和尚先生这两天很凉呀。”

“唔唔。”

和尚先生还是那样地答着。和尚先生用“唔唔”来答应，是承认这两天的天气是凉吧，是承认他自己觉得这两天天气的冷吧，是承认我们这些平凡之徒应该觉得这两天天气的冷吧，或者，否定我这一句话而不欲令我难堪吧，我这一句话或是或不是吧，总之人世间一切话都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吧。

如其和尚先生答“是呀”，我又会破口而说“为什么这两天还会这样冷呢，真是非人情了呀”的吧，如其和尚先生再说，“前几天太热了呀”，我又会说“为什么天时这样的不正呀”的吧，“这样的天时很易生病的呀”的吧，“穷人真是受灾了呀”的吧，以及说“近来各处都是盗匪了呀”这一类话的吧。

如其和尚先生或开初就答，“还好呀”，我又会说“这样凉的天气你们都满不在意吗”的吧，或者我还会再说下去，说“你们冬天也仅着这一点衣服吗”的吧，“你们不想弄一盂酒杀杀寒气吗”这一类话的吧。

总之，那样无限的延长下去了呀。

同时，灾害也是那样无限的延长下去了呀。

这样思索之我，猛觉那个和尚很有些悟了呀。

于是我再将眼光扫到那一头去时，和尚先生已不在了哪。

天色渐渐更凄惨起来了，远山先后没入浓暗之中，仅仅水面上还腾起一种白色，但也极暮霭苍茫之致了。我沉下心来听禅堂里的钟声。我的幽魂像寄托在这钟声里，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地波荡出去，虽然微弱到仿佛灭亡，但仍永远存在那空间的

哪。

正觉入悟时，忽听见有人喊："先生醒醒哪。"

"这儿什么地方哪。"

"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哪。"

我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和尚先生带着笑站在我身边。我说："什么时候了呀？"

"是你该回去的时候了呀。"

他一路送我，禅堂里的香好凶郁哪。

走出了山门，大好江山，如一片锦绣，全铺展在我的脚下了，可惜四边迷雾隐约，已不易辨识。一阵风扑面刮来，不是春风，不是夏风，这风颇有肃煞之感哪，熟睡之我，至此完全给它吹醒了。俯瞰城市，万家灯火已上。雨住了，天上漆黑，回房来，见病了数日之我忽而不见了的同住之友人，也许会焦急地向四处找寻了起来的吧，但我还是那样从容地走着，一路从山坡上下来，想着豁蒙楼上梁任公的句子，这样念道：

江山重复争供眼，
风雨纵横乱入楼。

（原载《新月》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1日出版）

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这是一篇记录。我草拟这篇记录的目的，在希望这篇文字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实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材料，或者这样一篇记录对于他们是否有用。因之我对于应否草拟此稿，犹疑不决。最后还是出于主治医师的鼓励，他认为这种经验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种经验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能把这种经过记录下来。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寻常的经验，所以鼓励我把它写出来。

这篇记录包括“感觉”与“心理”两个部分。关于“感觉”部分，我想凡是用过闷药的人，他们当时所感觉的，大致不会有太大的距离。至于“心理”部分，则要看各人的教育、职业、性格、环境等等情形而定。

关于我的病症及投住医院的经过，此处一概从略。我和我的主治医师约好于3月31日上午9时施行手术。我并在前一天知道，我们将施行全部麻醉。在13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夫的主治下，割治过盲肠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间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宽大的手术室里，在那没有一点声音的寂静严肃的空气里，听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声音。这次我似乎乐于施行全部麻醉，借以减少我对于痛苦所发生的恐惧情绪。

3 月 31 日，星期一。这是江南最标准的春天，满天的好太阳。我在上午 8 时 3 刻以前，在病房里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于 8 时 50 分被抬进手术室。我的主治医师周寿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坐在椅子上等候我。当我被抬进手术室时，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术床后，各种工作即开始进行。直到此时止，我还不知道履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针的方法，还是用嗅觉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闷药的有效时间是多少。他们说 5 分钟。我说 5 分钟内可以完毕一切手续吗？主治医师说 5 分钟内可以完毕。我虽然不再追问，但是心中很疑惑。他们的意思显然是企图安慰我，表示手术在很快的时间内（5 分钟）就可以完毕。事实上，手术的时间曾经延长至 10 分钟至 12 分钟之久。假如他们当时告诉我手术需要 10 分钟始可完毕，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医师开始在我的口部四周涂油，并将脸罩罩住我的脸部，只留出鼻孔让我呼吸。我此时已知闷药将用嗅觉的方法施用。我那时惟一的希望，（在这儿，我只用“希望”两字，不用“要求”两字。因为“要求”是一种含有“意志”成分的表示，“希望”则仅是一种“感情”成分的表示。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安排在一种不能让我有任何“意志”的环境之中！）是希望闷药不要用得太早，以致手术尚未完毕，而闷药药性业已终止。但是在我自己觉得一切尚未准备完毕时，他们已经向我施用闷药了。我在一种微微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中被动地吸嗅闷药。

据我自己的估计，从我吸嗅闷药至失去知觉时止，只有三四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是一个极其短促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心理状态纵然十分复杂，因为时间太局促，所

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动，毕竟也是有限的。我现在尽我的能力来记述我当时所体味到的奇异的感觉和当时的种种心理状态。

关于闷药的气味，我还不能用“痛苦”两字来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两字，我势须责备我自己近于夸张，因为这种气味是可以忍受的；虽然这种气味至少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气味。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种情景很难描写。平时我们在白天，或者在有或强或弱的灯光的夜晚，即使闭上眼睛，但多少还有一种“光”的感觉。除非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闭上眼睛后，才觉得当前确是一片“纯黑”。在那时，我的感觉，似乎只有真正在“一团漆黑”的夜晚闭上眼睛时的感觉，仿佛近似。但是更进一步剖析，上述比拟还不能完全尽意，因为我们即使在一团漆黑的夜里，闭上眼睛后，觉得一片“纯黑”，但这种“感觉”，似乎还是以眼睛为主的感觉，换言之，即那种感觉，还是一种经过“视觉”的判断的结果。而我那时的感觉，似乎已经超出“视觉”的范围，而是觉得整个的脑袋所感觉的是一片“黑”。而且这种“黑”的感觉，因为闷药在一口接一口地吸嗅下去，所以一步逼一步，愈来愈深。我们平时在电灯光下，骤然之间电灯灭了，那时候所感觉到的“黑”，还多少有一种“光”的比例作用在内，从原来的有光程度，变到骤然的无光程度，遂觉当前一片漆黑。而我那时所感觉的“黑”，那种难于形容的黑，是愈来愈黑，一阵紧一阵的。我们通常总爱用“如堕深渊”四字来形容这种情景，但这四个字并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也很少人有过真正的堕入“深渊”的经验，普通用“如堕深渊”来形容一种心情，多少只是一种象征的用法。“如堕深渊”，就逻辑上讲，本有一点一点“下沉”的

性质，而我那时，显然并无“下沉”的感觉。“下沉”是一种自上向下的活动，而我那时并无自上向下下沉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的样子（实际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上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成败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抱持有一种虽然飘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已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我所谓

“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极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犯罪，原都由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的处死，更是人类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刹那之时，而自囚房至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像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不是留恋他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地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然而这种感伤竟很“轻微”，主要的功用应归之于我们的常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这不是“死”，而是一种知觉的暂时的停止。所以一切引起联想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我当时几乎纯然没有一点涉及私人利害问题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珑，具有一种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欢喜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的感到，万一我此

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因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之士，我认为在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以上是我在施用闷药那短短的三四分钟以内的心理活动，事实上，在那后半段时间，心理活动已渐渐趋于衰颓。最初的一阵“黑”的感觉过去后，意识一点一点柔弱起来（此处还不能用“迷糊”两字，这时意识还是很清楚，但不活跃，故用“柔弱”二字）。我遵从医生的吩咐，嘴里轻轻地数着“一、二、三、四”。心头似乎有一阵轻微的难过，左脚脚趾部分曾有发麻的感觉。在那快要失去知觉之前的极度短促的时间里，我还意识到我的两手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我这时心性微微有一点紧张），后来就有两旁两个人将我的手捏住。在我知觉尚未丧失之前，我还感觉到医师已用一种液质在施行手术的地位四周涂抹。这时我已渐渐地快要丧失知觉。当时我似乎对于一切都自愿地同时又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愿”指自愿施行手术而言，“无可奈何”指用闷药后情形而言。前者属于意志部分，后者属于感情部分。）我没有放弃的只有一点，就是嘴里仍继续的在数着“一二三四”。我那时又忧虑，不要一切都已失去感觉，而独独我的神经不能停止，则我仍将要受到手术的痛苦。这当然是一种由于没有经验而发生的过虑。至少那时，我是一切“听天由命”了。数着数着，我似乎竭力叮住这个“一二三四”，以挣扎“我”的存在。但是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

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着了一样。据医师告诉我，我最后还要经过嘴里乱哼，手脚抽动，表示心头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如此以后，全身筋肉才开始松弛，真正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一个阶段，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

*　　　*　　　*

当我已被闷昏以后，甚至说一个人死去以后，究竟他的灵性仍旧有无活动，我不易作确定的回答。关于一个人死后究竟仍旧有无灵性一节，亦即通常一般人所涉及的有无灵魂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到今日止，尚无任何确切的结论；而人死了又再活，以便叙述其死后的经验者，其事显亦不多。我这篇记录，其中有两点与张东荪先生即将在本刊发表的一篇监狱回忆录中所记他自杀的经验，可以互相印证。这儿先说一点。据东荪先生报告，他某次自杀以后，他“觉得”非常舒服，好像一个身子很轻，在云端里飘着似的。他既然自杀了，何以又“觉得”非常舒服，好像身子在云端里飘着，这似乎说明人死后多少还有一部分灵性的存在。我亦似乎感觉，我在被闷昏以后，仍有一种灵性的活动。不过这种灵性活动的内容、性质及情形，我于醒后亦不能详细记忆。我至少在刚刚醒的一刹那，确是感到我在昏睡中似乎仍有灵性的活动。而且我觉得在昏睡中的情境，极其甜蜜，而且极可留恋。至少并无任何苦痛，似乎即永远停留在那个境界里，亦是很好的。假如我于刚醒的时候，即运用我全部的脑力来捉捕我在昏睡中的种种情境，是否有所收获，关于这一点，我很难答复。我当时至少并未企图这样做，同时我当时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势须斫伤我的脑力。我只能很不确切地说，我似乎感觉，当我在昏睡中，仍旧是有一种灵性上的活动的。

*　　　　*　　　　*

我终于醒了过来。当我醒过来约摸10分钟后，我立刻在极度疲倦的情形中，睁开眼睛看我的手表，时为10时20分。因之我估计我醒来时，大约为10时至10时10分之间。易言之，我至少在昏睡状态中延续至一小时之久。(据医师报告，在施行手术期间，继续施用闷药，故至此时始醒。)我醒来时，正巧外面有哭声，我第一个反应是："隔壁的人开刀开死了，我开刀没有死。"而立刻接着而来的第二个修正意见："隔壁的人死了(因为不一定是由于开刀而死)，我刚刚是上了闷药，现在醒过来了。"这个反应是很单纯的：即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死。但是据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认我这个反应是出于一种意识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我愿意在此表示，关于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学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词(term)或有错误之处。因之我这篇记录，还只能算是一种raw material，心理学家如欲采用时，尚须详为订正。]何以言之？因为施行手术是我自愿的行为，而施用闷药无伤生命则为一种常识，故我绝未发生任何对于"死亡"而起的恐惧，因之醒后也不致有庆幸未死的意识。所以我认为我那时庆幸自己没有死，并非一种智力的活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为一种生物所有的自然反应。此处即欲述及与东荪先生自杀经验可以相互印证的另一点。东荪先生在自缢之后，被他人解救时，发现他的两手在拉着套在颈子上的绳子。既欲自缢，而何以在自缢后又要将两手去拉开颈子上的绳子？由此可以证明，一个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会上有各种自杀案件的发生，他们都无"意"于生，惟求一死。但是作为一个"生物"，人是不愿意死的，所以

蓄志自缢者，于自缢后，仍以两手去拉开颈上的绳子，这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行为，与意志无关。

还有一事可以证明我当时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即我当时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尚未恢复我的意识，因为当时我甚至对于我究竟身在何处一节，亦茫无所知，而对于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约经过四五分钟的有意思索后，我才大约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其后一二分钟，我又努力睁开眼睛一看墙壁上的颜色（墙壁上白下绿），以求证实我确是睡在病房里面。

在醒后最初的五六小时内，整个的人感觉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时发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后还不及一小时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挟了一包稿子来医院看我，履行我们习以为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刚刚上了闷药才醒过来的，但是无论如何，由于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后发稿时间，当时有一篇稿子非我看过不能付排。事实上，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当时都无力阅读即使是一封短信，何况是一篇稿子。我当时非常虚弱，面色惨白，我甚至即使闭上眼睛，亦觉光度太强，故须用手遮盖着我的眼睛。结果我只好招呼我的助理读给我听。（我实在很希望他能够读得响一点，借以节省我因听而需要花费的精神，不过我并未如此表示。）他显然未能了解我当时是虚弱到如此程度，并拆读若干来信，我也竭力支撑地听下去。我相信这一个插曲增加我脑力受伤的程度。

在当天下午4时以前，我始终在沉睡状态之中。闷药的气味，那令人不快的气味（近似火油的气味），时时逗留在我的嗅觉里，令人厌恶。一直到晚上9时以后，我才忘记这种气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时，我大体上已清醒之后，忽然怀疑到刚醒时我所听到的哭声，是否仅仅是我当时的一种幻觉。事后追问看护，始知当时有一个病房确是死了一个病人，而所发的哭声确是一种真正出自内心的悲哀的哭声。

4 月 18 日追记

（原载《观察》第 2 卷第 9 期，1947 年 4 月 26 日出版）

悼志摩先生

这年代随处爱给人忍受一份不可言说的苦难，摆着晦涩的脸，教你气促。全是秋冬景象，一切都挂上死亡的颜色，等着长青芽还远。国度如深山里的小部落，睁着眼睛看别人家的长进和热闹。孕成的大乳石，只要凶运一到，便是一声吓倒人的崩坏。黑漆里有的是伤感的袭击。

虽然时季在一种窒塞的国难的气息中，可是对于这一颗大星的陨落，志摩先生的罹祸，我相信在一般困乱的心糟里，当更渗下了一滴苦汁。他关切的朋友和他忠信的读者，将全感到他们自己的损失；为我们的诗人志哀着。10 年来中国文坛的收获，志摩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由他来砌起了一座楼屋，正还待他的经营。每个人，对于这熟悉的名字，都有着一种亲昵的感情。他的恩泽是一道最和丽的光，大家都收到他的照耀。

我初次认识他是在 5 年前的一个春天。那时，有若干人想排演一个脚本：茶花女，在华龙路新月书店三楼谈话，在座有余上沅先生、江小鹣先生、吴瑞燕女士这一些人。志摩先生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虽然这一次谈话以后也没再有问闻，可就在那时，我感到他的热心永远是大家一个最好的监督。

过后一两年，他收下了光华的聘书。一次更接近的通气是不消说得的。这人初看上去，和他应酬似乎很费力。可是你和他熟悉了，你便明白这正是他的率直，他的诚挚；他诗人的节气。他对于后进，有的是一份提拔的心热，如他在《诗刊》第2期上说：做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见。除非你不去找他，要不是，一开口就像10年前的老朋友，不跟你来一些虚套（有时虚套只是一种骄傲）。

要他写东西有一丝苟且是不来的。他在《猛虎集》上说，他有时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或一个字眼也得拼忍到成天半日。字眼一到他手就全标出了它们自己的分量。这认真是我们绝大的师法，我说不仅是在文学的努力上，便是在为一切学问或为人上也一样。

在他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2个人。散文原是诗的扩演，他会对我说，内涵是它的骨骼，辞藻是它的外表；一座最牢的房子，外面没来一些现代美的彩色与轮廓，仍不能算定成它建筑上的艺术。他的文章，各色各种爽口的好水果全有。你读过他的作品，便知道；香艳的如"先生，你见过美艳的肉没有?"哀悱的如"我的彼得"。

我最末一次和他见面是去年一月里。那时我预备去北平。有一天去看他，3个钟头前，他正从北平回来。听见我也上北平去，说：

"好极了，咱们的朋友都在向北平流。住北平只要自己有翅膀，上海，上海你得永远像一只蜗牛般的躲在屋子里。"

年轻是他的本分。在自剖里，他自己说："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

添我的生命。”他的兴趣永远是雪天的白瓣，他的灵感永远是波涛的汹涌。

为了自己文学修养上的稚浅，我想住北平后，常去他处承教承教。有一天张东荪先生告诉我说志摩先生已经到了北平，可第二天，我又为了别的缘故，回到了南边来。去年春天编《今日》，问他要稿子，他来信时还记念到这江南的好妩媚；我在西湖时，曾经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

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在相识的一淘里，很少人写散文。不过，”他说：“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对于他这分督促我永远不该忘记。

但是天不为这荒芜的中国的文坛多延留几年这卓越的诗人。就在“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里，炸倒了这破碎的文坛上的中柱。

当我有一天晚上读了第一家登载了关于他罹祸的不幸的消息的Evening Post（是家璧拿来我看的）以后，我的意境中，一时体味到一支说不出的苦涩，一次至大的哀悼。我跑到或写信给每一个关切志摩的朋友或读者，报告他们这一份不能补给的大损失。

三月江南又是一片好春天。在今夜，在这十六分外圆的月亮下，凭我向往对他的一宗刻实的信心，写下这短短的2000字纪念他。我祝福他在天的灵魂永远的轻松着；他的精神永远是不死的。

（原载《新月》第4卷第1期）

记田汉先生

我认识田寿昌先生，还在七八年之前。那时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南国社第一次在上海梨园公所公演，上演的戏有《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和《名优之死》等几个剧本。在那次公演最末了的一个晚上，我和赵家璧兄同去看了一次。我们看完戏回学校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洪深先生的“名优”，左明先生的“小丑”，万籁天先生的“侍人”，唐槐秋先生的“老画师”，以及特别是唐叔明女士所饰的“卖花女”，他们在舞台上的灵性的发挥，使我受了极深的感动。在那种万籁无声大地如死的夜色中，我伤感地在操场上徘徊了好久。不是单纯的敬佩，不是单纯的感动，我那时心灵中汹涌着的只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冲动。

那时南国社除了干小剧场运动以外，同时他们又发动了一种学校戏剧运动。全赖有这一点理由，我方能够私幸和这一位热情而丰富的戏剧家接近。可惜因为我没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天赋，所以我始终只做了南国社一个最没有实用的分子。

那时候，田先生住在金神父路底的新新街新新里。在那样一个污秽喧嚣的角角里就住着这样一个有光辉的人物。他的房子是一楼一底所谓的“弄堂房子”。你一路进这41号的门牌，“一个戏剧家的屋子！”什么都是杂乱无章：桌子不放在桌子应当放的地位，床铺没有床铺的尊严。一个模型舞台放在天井里，

舞台道具成了这屋子里惟一的上宾。你要没有容忍，你走进他们的屋子真会使你吓得连忙溜了出来。一个小屋子里充满着的是人，声音，烟雾。每个人都是那样放肆的嘻笑歌唱着，每天都是那样的忘形放浪着。然而这一阵嘻笑歌唱忘形放浪，并不是一团漫无意义的荒唐，它是一股热情奋斗的表现。那一个平凡的屋子里有一般不平凡的空气，假如这一股可贵的空气是一个车轮，那田汉先生就是这一个车轮的轴子。

田汉先生是一个最富于感情的人物。他不说话时，他的冰冷实在使你可怕。可是他的感情一来，简直是一道洪水。他高兴时，什么笑话都说，什么戏都唱，他从来不腼腆他那一口湖南的嗓子。他这 10 多年来干戏剧运动所以有今日的成绩，他的热情是他最大的功臣。他凭着他的一股热情，对于一切不消极，不失望，不灰心。他凭着他的一股热情，在干戏最吃紧的当儿，可以自朝至夕，可以夜以继日。他凭着他的一股热情，使大家受苦追随，甘之如饴。无论有多少人在他周身喧嚣乱叫，他依然能够坐下来写文章，制剧本，这也还是因为他有一股热情。他的一股热情可以使你扫除一切耳边眼前的扰乱，而一心一意地执笔抒写。

田寿昌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戏剧家，他实在还是一个诗人。他在《湖上的悲剧》一剧里说："诗人的袋子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钱！"真对，田先生的袋子里什么都有，也就是没有钱。他从前在上海干戏剧运动的时候，洪深先生是惟一适当担任帮他筹款的人物。田先生欠缴房钱，成为家常便饭。上海的房东实在不容易对付，可是古怪，田先生的房东竟然是一个好人。他看看这屋子里，什么都觉得新奇讶异，这种新奇讶异的空气居然会盖没一个市侩的可憎面目。

还有一个人是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田汉先生的母亲。她真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一个能够了解儿子，能够成全儿子完成他的专业的慈母。屋子里那种浪漫的氛围，对于这位老人竟然显得那样的和谐。我常常在田先生家里吃饭，一大碗青菜，一条大黄鱼，一大碗蚶子。老太太偶尔说几句湖南话，我看她的精神上简直没有一点勉强。田先生屋子的“食客”没有一天没有，没有一餐没有，特别是又快要公演的一阵。我有一次听说田老太太甘愿当了她的皮袄，来维持这一份庞大的伙食。

我和田先生隔别了五六年，这次竟然在南京重逢。他的面貌我觉得已经衰老了不少，但我觉得他的精神，他的热情，还像从前一样。我今天到他的寓所去了一趟，这简直是七八年前的新新里41号的一次再现。我对于这一位人物，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在此写下这一点卑微的记忆，吐出我心中这一点真实恳切的情感。

（原载1935年《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第38期）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

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心中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

守的信约：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惟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

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惟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原载《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出版）

《客观》政论

敬告马歇尔元帅

马歇尔元帅奉命使华，日内可抵重庆。以马歇尔元帅的身份与才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出使一个情形极其复杂棘手的国家，美国及全世界对于马歇尔元帅信仰之隆，以及马歇尔元帅此行使命之重，殆可想见。中美友好，已成为一种传统。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中国所得力于美国之援助及鼓励者独多；而美国关切中国来日的命运之较他国为尤甚者，亦为情理之自然。我们于马歇尔元帅莅临国都之日，愿以一个在政治党派关系上无所属的自由人民的身份，就国家前途，略贡所见，以为参考。

国民党一党执政，前后20年。20年专政的结果，使国家的生命愈来愈隐弱，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时至今日，使友邦的元首，也不得不对中国多年以来这种一党专政的局面，表示“必须修改”。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兴替，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到今日，弄到友邦元首虽不欲出面一言而竟不可得，就

我人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国家的耻辱。在历史上，必有人负这种国耻的责任。但是经过多年的一党统治的中国，从各种要求上看，必须进行改革。中国民生之苦，已超出了时代所容许的程度，但是要改善民生，先须有一个有较强行政能力而又有良好政治道德的政府；世界经过两次大战，必须进入于和平稳定的局面，但要使世界和平稳定，必须消除一切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的分裂和混乱，足以威胁世界的和平。所以，我们必须希望并使中国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强盛的国家。

统　　一

中国需要统一。但是：

第一，所谓统一，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最高立法权、行政权（包括外交权与军事权）及司法权，属于这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但这个中央政府必须是建筑于大多数的人民的公意之上的。这个政府中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立法机关的议员及行政部门的行政首长等，必须容许人民或其代表对于他们的进退任免有最后表示意见的权力。这个政府的一切施政，必须以国际及全国人民的福利为目标。统一不是将国家的各种最高权力给予任何一部分少数的特殊阶级，而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权力以达到他们这一批少数人物为谋取他们自己的特殊权势及特殊利益。

第二，"统一"的本身不是一个目的，"统一"只是一个条件，一个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的条件。国家的政治目的乃在使

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快乐，文化进步。我们要求国家统一的目的，乃在使国家能于统一以后得以履行其所应负的各种责任；“统一”本身并不是一个最后的目的。

民　主

中国必须走民主的路。我认为：

第一，从事民主的运动，不应当仅仅视之为一种政治运动，应更进一步视之为一种文化运动。我们当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一种民主制度，但是要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根基巩固，必须使人人在日常生活及日常意识中，充分有民主的修养。要人人爱好自由思想，人人有容忍异己的态度，人人能凭理智讨论及处置一切事务。假如人人有民主的头脑及有一种民主的思想方法，则在我们的国家中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根深蒂固而不致徒有其名。

第二，要实行民主应先使人民能自由言论。中国目前第一步应使知识分子能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其次再求一般人民有自由表达其意见的能力。关于后者，要使一般人民食能饱衣能暖之后，他们才知什么叫“意见”，才能进而希望他们表示意见。所以，来日的中国政府必须实事求是，选几件与民主最有关系的事情，下决心，立勇气，大规模地改革一番。这是充实中国国家生命的一个根本办法。

自　　由

任何一国的舆论，大都均系出之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其在今日中国从党治到宪治的过程中，对于知识分子之出而领导舆论，尤感切要：

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

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在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新闻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

我认为：国民党为表示其倡导民主的诚意起见，应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及国民大会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通知国民政府废止一切限制上述各种言论自由的法令，并明令允许人民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出版报纸，出版刊物。

政府改组

为求国家进步及加强进步的速率起见，政府即须加以改组，以容纳有下述4种条件的人才：

1. 有现代的头脑者，
2. 有良好的行政才干者，
3. 有良好的政治操守者，
4. 能将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者。

但是，我们应当充分注意：今日中国的人才并不完全吸收在各党各派之间。在多年的反常的统治之下，有操守、有政治才干及政治抱负的人，大都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今日中国各党各派之间，人才固然不少，但网罗人才并不能完全就各党各派之间求之。我们应尽量鼓励在党派以外的民间人才，参加政府，使他们得到机会以增加其种种有关实际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以为未来的国家之用。

中产阶级与自由分子

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

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

（原载《客观》第7期，1945年12月22日出版）

失败的统治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20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

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原因既多且极复杂，非执一言所能论议；然其成败之键，必有最基本的原因可寻。作者以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它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但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绩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说话，政治力求清明，经济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卫生、房屋、休闲各方面，无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励精图治，到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

要政绩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抵昌盛康乐之境。

不幸中国国民党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我们先看这20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进步？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言交通，20年来我们曾铺了多少铁路，造了多少轮船？甚至到现在为止，不仅还不能制造一架飞机，甚至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言教育文化，20年来我们的科学发明在哪儿？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在哪儿？音乐和绘画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准及文化水准是在向上升还是往下降？至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这一切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大都空言多于事实，计划多于实效。然而20年来我们的执政党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一言蔽之，这20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公路的开辟、电话网的布置，也无一非出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政权。20年来，只有这项消极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国民党无比的兴趣和重视，表现着国民党最大的勇敢、决心和魄力。20年来，我们做百姓的，只有这一个项目，使我们到处听得到、看得见、嗅得着，并感觉到它的紧张、严密、认真和不放松。但是也就在这一个项目下，这20年

来，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金钱，雇佣了国家多少人力，浪费了国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国家多少光阴！当前的执政党既倾其全力于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响他在积极方面的种种建设工作。所以，20年来，我们的交通和水利没有高度的建设，土地制度没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旧墨守陈规，种子和肥料毫无新的改进，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秽，民间的代步工具仍然滞留在原始阶段，一切近代的机器生活从无机会插入乡村，保健事业和社会救济有名无实，疾病与贫穷仍弥漫全国，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毫无改变，毫无进步。凡上所述，俱属琐碎，而无一非建国元气所系，但从来没有见到政府有兴趣和决心推行过任何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20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潜有物理的作用：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洁身自好，柔弱者颓靡消沉。国家尽失梁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惟力

是视的社会上，断无是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社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愿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

在一般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以为今日党的生存问题，其重点莫过于敌党之消灭。作者则以为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今日国民党的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党，自然更不是如何消灭敌党，而是自己能不能认认真真硬硬扎扎赶快做几件像样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没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没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没有饭吃的能有饭吃；四、能让他们和平地安于他们的工作，乐于他们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则更进而希望国家有尊严，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饭吃、能乐业，人心自然归附，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结实，国际上自有地位，整个国家的前途自然充满着光辉与希望，而今日批评政府者，亦必将拥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国家垮台而政党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贫穷而国家可以富强者；富国先富民，兴党先兴国。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20年的时间不算短；20

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定无前途。

9月9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14日出版）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一

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达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国一般社会平时所有的那种浅浮、放狂、享乐的生活方式，向不为世人器重，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勇敢坚毅的牺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罗斯福总统不仅使大局从逆势中扭转过来，并且赖有他所独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使这个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为一个

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以及他所号召的四大自由，成了无论在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生活的千万男女心灵上所共有的一个神圣的鹄的。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们不满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们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我们无可抑止地仍然缅怀着已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伟大，但我们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

二

在过去数月中，美国对华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摘。美国在华活动，大别可分两项，一为美军驻华，一为参加调解。先说美军驻华。美国驻华的理由，根据去年 12 月 15 日杜鲁门总统声明：

“为了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时经常的合作，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并且为了清除在中国境内日本势力残留的可能性，美国特定一种确定的义务，使日军缴械和撤退。

“因此，美国曾经，并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被

解放地域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美国海军现留华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同一声明上，又说：

“美国已经为了恢复因日本侵略东北而首被破坏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价。除非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国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则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坏，也将遭到危险。这是美国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的目的。”

我们根据上引美军驻华的理由，陈述下列意见：

1. 在理论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物资，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胁或破坏世界和平者，美国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这个理论，我们不欲否认之。在战时，中国和美国同为盟国，并肩抗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之。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承认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

2. 美军驻华的理由，既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使日军缴械和撤退，则我们认为，此项使中国境内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显然应以中国国民政府为主体，美军处于协助的地位；充其量，中美双方平肩协力共同合作，使日军缴械及撤退。

3. 但是我们愿意知道，在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国国民政府有未充分发挥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尽他应尽的义务？我们同样愿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军的缴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国即可认为“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撤退驻华美军？如其尚未完成，何以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

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行动？

4. 假定美国容许中国国民政府不先尽其全力以从事他应负担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从事于国内其他与日军缴械和撤退工作无关的军事活动，我们不得不认为：此即足以表示美国谅解、默认，甚或鼓励中国国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对同盟国并肩对日作战中所应负责任，而以其全部力量从事于自相残杀的内战。

中国现在在事实上已是一个全面内战的局面。在这一个内战中，无论美国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给予内战中两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国有未考虑过：美军驻华、物资转让、经济贷款，以及其他行为，在事实上，足以使今日中国内战中两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种倾向内战的鼓励？美国有未考虑过在这方面美国所负有的道德责任？

6. 假定美国认为：即使“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而中国尚未“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美国是否仍将“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统一与民主是两件事，假定中国业已统一，而并不民主，则美国是否继续“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直至美国认为中国既统一而亦民主时为止？

我们即使在十分心平气和的检讨下，亦不得不说：美军继续驻华确是一种不合事宜的行为。美国也许认为，在华驻军，可以有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但事实上，这个假定无法成立。这几个月来，中国的“和平”绝无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进步，内战的范围和程度反而与日俱增；这足以表示美军继续驻华绝无助于中国的缔造和平统一的工作；美军继续驻华这一行为，仅仅使在中国内政上业已非常复杂混乱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

多的意外的纠纷，同时并因此引起许多在中美国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评和指摘。在理论上，除了战胜国驻军战败国以外，我们亦绝难承认，乙国之国内和平，可以以甲国之驻军而赢致之。

三

其次论参加调解。根据上文所引同一声明，美国参加调解中国内争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盛、团结、民主的中国”。调解的原则为：

“美国认清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假使这个政府基础能扩大，包括国内别的政治分子，则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将被推进。因此，美国强调主张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协议办法。给这些分子在国民政府中一种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

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20年来中国一党训政的政治，使之从一党专政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该声明最后并说：

中国如照上述路线走向和平与团结的时候，美国准备以各种合理方法援助国民政府，重建国家，改善农工业经济，建立军队组织。足以为维持和平与秩序而尽其国防上与国际上应有的责任。

“在推进这类协助之中，对于中国在合理条件之下为了用于中国全国的健全经济及中美间的健全贸易的发展而计划的向美要求信用贷款及借款，美国准备加以有利于中国的考虑。”

去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的对华声明，确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愿望。今日中国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是民主自由，在经济上是民生改善。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除了这些基本民权的要求，中国人民并进而要求政府（无论执政的是甲党或乙党）能对人民负他在政治上应负的责任。消极方面要肃清贪污、提高效能，积极方面应有所建设，这些建设并应与他执政时间的久暂成为比例。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经济方面都能得到改革，发生不流血的革命；而要努力寻求这些改革，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内战绝对打不得。打内战要死人，要烧房子，要掠夺农民嘴里的米粒；打内战使币值愈来愈贬低，工商业愈来愈萧条，一般国民的情绪愈来愈消沉；整个国家因内战而陷入于恐惧、怨愤、悲观、麻痹、苦痛、绝望的境地。这是全无意义的大消耗大浪费，这是误国害国、灭国的大悲剧！

上面这一段最简单的陈述，我们相信就是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呼吁和要求。但是我们正视今日中国的大局，不要说毫无开国规模，甚至亦无建国气象，一切活动作为仅仅是在撑持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当前中国政府上的最有声色的滑稽杰作，就是政府说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当政的人物嘴里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动，在中国却普遍而无例外地在各种不同方式的压迫下，遭受限制、阻碍、取缔和威胁。这简直是不可理解并亦不可信的作风。在现行政治风气下，贪污已经成为常态，不贪污反成为变态。公家机关的腐败黑暗，已至难以想象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叹息并默默地忍受外，竟无一点有实质的反抗能力！经济生活愈来愈恶劣。蒋主席今夏在牯岭声称，如若中国尚有一人无衣无食，即是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尚未完成。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国民党执政 20 年的结果，本来有白米吃的，现在已无白米吃了；本来可以一天吃两餐饭的，现在只能吃一餐饭了；本来穿长衫的，现在不穿长衫或是穿不起长衫了；本来有房子住的，现在没有房子住了！我们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不知有多少人沉沦在饥馑和寒冷的死亡线上。就是在这不夜的城市里，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无食无宿的流民乞丐。在这样一片锦绣山河的土地上，竟有万万以上的人民，过着与畜生生活无殊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下，还要从事内战，活生生地把人民的血、肉、皮、掺着人民的汗、泪、血、建筑少数人的“权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叙述的这样一个落伍、黑暗、悲惨、无人道的国家，假如美国确是关切中国的前途，关切中国人民的幸福，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并所能坐视的。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谈，在

政党的纠纷上，企图调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间的冲突；在统治的精神上，企图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内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繁荣。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调解党争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调解党争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同时，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解决中国党争问题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问题的一项。甚至可以说，这一项，确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项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培植中产阶级的力量，鼓励开明进步而有现代化头脑的民主自由分子的抬头。中国的乱，在经济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穷了，绝大百分比的人民都沉沦在生活的水平线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力量，没有组织；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负、有操守、有能力的人无法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对于这样一个总括的目的，美国既然过问中国问题，就须一方面调解目前中国政治上最迫切的党争问题，一方面亦须从根本上压迫政府作事实上的种种改革。一切民主活动，只要合理而无损于社会的安全，应当容许其存在。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对于为作者所重视的一部分，可谓一无努力。在法律上，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国民政府，美国当然尊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我们绝对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国之欲支持国民政府，诚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应该是有条件的。易言之，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必须这个政府真能向民

主之路进行。而我们历观往事，面视实际，我们实难发见任何足使美国必须支持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的理由。

四

再进一步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但是我们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没有能力，20年的统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调解"，使外国人要来"调解"，甚至使中国问题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人格尊荣，实在给那些台上的人物剥光剥尽了！但是尊荣是一种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种现实。我们很含羞地说，假如因外国的插入过问，而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民主、自由，则亦不失为一项"满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国人民，已被动地做了一次"无所获的抛出"。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历史家告诉我们，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同时也促成了一个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国。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是最反动顽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税收，要由威司敏斯特决定，这一原则，广泛地说，就是人民的意志权利一无保障，统治权悉操于少数专制人物的掌中。赖有英国军队在美洲殖民地吃了败仗，于是皇党的威风大杀，人民的力量抬头。在中国，单说抗战期间，亦有同样的事实："武汉时代"在当时中国政治上，却成一个局面，另有一番风气，时实正承南京沦陷，徐州被围之后。33年中国军队自长沙至贵州作疯狂的溃败，日本进叩贵阳之户的时候，政府威风

稍敛，民气一度昌扬。历史说明：一个以军队为统治资本的政府，当他每打一次胜仗，他那捏紧不放的心理亦必随之增强。所以鼓励这种政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就无异鼓励这种政府加强他加紧控制的倾向。在另一方面，现在美国是有钱的国家，中国是贫穷的国家；美国是强大的国家，中国是衰弱的国家；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我们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跟着美国走；在经济上，没有钱就向美国要；在内政上，请美国参加和谈。我们几乎可以夸张地说，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我们不欲否认，美国之过问中国政治，到头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方面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时也须真为中国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国人民会得在心底里感激美国，否则，美国必将失去众多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多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获致的。

1935 年 11 月　上海

（原载《观察》第 1 卷第 11 期，1946 年 11 月 9 日出版）

论张君劢

国大召开，民主社会党提名参加；该党领袖张君劢以此大受物议。一部分报纸在其电讯、评论、漫画之间，对于张氏备施讽嘲，似非将此人前途毁灭，不足快意。每日读报，感触万端，谨一论之。

先论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在民社党本身，他们对于参加国大与否，可能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政协立场"，一个是"宪法立场"。就"政协立场"言，这次国大的召开，确与政协程序不合。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参加政协，系以民盟代表的资格为之。以民盟内部政团关系的复杂微妙，民社党是否必须遵守民盟的约束行事，本为一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至少在道义上，张君劢既为民盟盟员，并以民盟代表资格出席政协，似宜忠于守约，尽量避免使其领导的政党参加与政协程序不合的国大。至言"宪法立场"，严格言之，在"政协立场"上既无参加国大之理，亦即无所谓"宪法立场"。但此处却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政治家的理想与感情的问题。我们查考张氏一生，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立宪运动，几乎无不有其参加。今春政协审议宪草，张氏独多贡献；重庆白象街张氏寿会，到者无不以此为颂。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这次国大召开，拥护

政协者，均表反对，但事实上，国大势在必开，宪法势在必制；就说现在，国大业已闭幕，宪法亦已通过，不论将来和谈是否重开，政府能否“联合”，我们怀疑这次国大通过的宪法能被推翻（依法修宪为另一事）。就是民盟中最急进的罗隆基，在答复记者询问和谈前途时，也不得不说：“最伤脑筋的国大及宪草问题，将暂予搁置，放在最后再谈。”（12 月 22 日《文汇报》）可见政治这样东西，一方面是原则，一方面是事实，国大既然势在必开，宪法既然势在必制，而张氏又复一生献身立宪大业，则他自必较他人更关心于这部宪法的内容，更期望一部较为理想的宪法能够制成，所以他仍参加国大召开前夜在南京举行的几次审议宪草的会议，并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假定国民党总裁能保证这部宪法在国大通过，他声明他将同意他所领导的民社党参加国大。张氏主要的目的：和谈须待从长努力，先将宪法通过了再说。由于这一种“理想与感情”的背景的不同，他遂走了与民盟不同的道路。我们对于民社党的参加国大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张氏的用心和动机是了解的。

次论政治权术问题。我们提出三点来讨论。第一，现在大家都在争取民主，争取民主的总目的是要把国家弄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在现阶段上，争取民主，就是希望国民党开放政权，使国内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机会过问国事，为国服役。就与国民党的关系言之，在这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并非要打倒国民党、排挤国民党或消灭国民党，而是希望能联合国民党共同从事建国大业。但国民党是 20 年来的执政党，在人情上，掌握着权力的人总是不肯轻易放手的，所以一切国民党以外的人，需要联合起来，造成一个足以与国民党相抗的力量，俾在此种相抗的力量下，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其既有的一部分权力。因之，在

这一个争取“民主”的运动里，国民党以外的力量，不能自乱步骤，自相分化。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主要地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们看到国大召开前夜，国民党对于民社青年两党之全力罗致，情急可知。在此关口，民社党参加国大，不啻捧国民党的场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战略上，实欠明智。第二，张氏希望通过一部近于理想的宪法。但是我们很怀疑，今日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是不是因为有了民社党的参加而始得通过的？据我们看来，国民党之不能通过《五五宪草》，必须通过如此次国大通过的这部宪草，实出于一种“时代压力”。这种“时代压力”，一部分发于国内，一部分来自国外。国民党的领导层，环顾大局，不能不顺应潮流。国民党之不能采用《五五宪草》，决非为了张君劢一人，也非为了民社党一党，它之非通过一部较为民主的宪法，实势有所必然。当张氏既与国民党总裁交换函件，双方提出保证后，他自不能不履行其诺言（民社党参加国大），然而此举是否必要，仍可辩论。就政治权术言之，我们认为此举实属缺乏经验。第三，张氏既同意其领导的政党参加国大，而其本人又不参加，此种处置，中外不多。张氏原意：他本人不参加国大，保持一种“超然身份”，俾于来日和谈，能有所努力。但实际反应，与张氏想象者，甚多出入。各方指摘，纷至沓来，竟使张氏在和谈运动中的根本地位，发生动摇，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来越狭窄了。今日政治家一言一行，竟不能不极度审慎，以免一失足而成千古之恨。

三论各方面对张氏的批评观感问题。第一，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

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我们可以反对国大，但不必看见有人不参加国大便私心窃喜，捧他一下，有人参加了国大，便一股醋味，挖苦他一下。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张君劢当然负很大的责任，但我们也不能以全部责任归之于张氏一人。张氏可以左右他所领导的政党，但他不能绝对命令他的党员，因为民社党不是一个领袖独裁制的政党。同时就张氏个人而言，我们还须查考其过去，默察其动机，论政的人，绝不能幸灾乐祸，滥施诛伐，对于有希望有操守的政治上的人物，我们应当鼓励他，劝勉他，安慰他。这是我一个月来每天读报的感想。第二，这次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在感情上自足引起旧日第三方面其他同志的愤懑。对于最近民盟函请民社党退盟一节，我们认为其事亦甚合理。合则合，不合则分，毋须勉强。不过我们愿作一言者，即解决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只有两条路线，一是协商路线，一是革命路线。就国家情形说，只能走前一条路线；就是共产党也未主张要走后一条路线。既然要协商，便希望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合作起来。这次民社党参加国大，各方表示惋惜，但张君劢个人的学问、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国，还是属于第一流的。我们对于张君劢之是否继续为民盟盟员一节，不欲置议，但我们希望在来日的和谈运动中，大家捐弃成见，放平感情，集中人才，以收事功。民社党单独参加国大，不啻分化自己阵线，他们做错了；但第三方面若因此分裂，也就完全中计。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计一私名利，若因此次挫顿，竟然被摈于民主运动门外，我们不免要感到这个社会的太残酷了。

最后我们愿对张氏进献一言：报载先生一月以来，闭门家

中（12月27日《大公报》），一月来先生之心情，吾人不得知之，但一个有抱负有信心的政治家，对于一时的得失毁誉，当不介意。先生今日须坚守者有一事，即绝对不参加传说中的政府改组。民社党参加国大后，各方对于先生均表惋惜，但对于先生之人格，仍持信仰。人之相交，贵相知心；若先生自问一切为公，则先生之苦心终必大白于天下。权术可以不深，人心不可不察。

（原载《观察》第1卷第19期，1947年1月4日出版）

读孙科谈话

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6月20日在南京接见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同月22日在同一城市，又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内容先后见6月21、23两日上海《大公报》。我们披诵孙氏谈话，滋多疑惑，谨评论之。

一、根据6月20日对合众社记者谈话，孙氏认为：（一）目前中共在东北反攻，系受苏联之赞同与指示。（二）中共军队优良之军火均为前日本军队之配备，盖胜利后日本军队向苏联投降，苏联遂将日军配备移交中共。（三）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四）旅顺及大连现被中共用作关内外军需之给养转运口岸，故苏联不允中国军队开入该两地，实违反1945年8月之中苏条约之精神。22日孙氏对《新民报》记者的谈话，则称："余日前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在唤起英美之注意，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上订明苏联应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而苏联容许中共军队前往，不许国军登陆。大连虽为自由港，然属中国之商港，中国军队自海道前往，因苏联阻碍，乃拟改道营口登陆，而苏联忽在国军欲登陆之前夕，自营口撤退，交与中共，致国军不得已始改由葫芦岛登陆。又如外蒙问题，阿尔

泰区显为中国领土，外蒙军队如无苏联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国军之不能接收大连，反让共军先行入据，均在于苏军之占领期间内，其责任应由苏联负之。大连为我领土，我们为何不能在大连登陆，这是根据什么条约？苏联已违反中苏条约，亦等于否认大连之领土主权属于中国。苏联支持中共、韩共、外蒙，为人人皆知之事实。因此东北已成为国际问题之所在地。中国军队至今不完全接收东北，除中共负直接责任以外，苏联应负间接责任。”孙氏接着说：“中国若失东北，即对美国为威胁，对世界和平亦为威胁。美国应有所表示。”归纳上引孙氏两次谈话，可得三点：第一，孙氏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第二，孙氏认为“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第三，东北既已成为国际问题，美英两国领导下之西方强国，应加以注意，特别“美国应有所表示”。我们要提出来的问题是：孙氏既认为“中共在东北之活动，完全受苏联支持，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并称：“中国军事当局业已获得证据，有半数受苏联训练及配备之韩军参加中共作战”，然则孙氏有无向国民政府建议：由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假如没有，孙氏为什么不提出这个建议？假如孙氏已提这个建议，政府是否业已采纳履行？这是一层。其次，假定我们承认孙氏所述：“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但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的交涉对象是苏联而非美国，我们应当找苏联说话。孙氏于指摘了苏联种种罪过以后，除了忽而上下文不接气地说了一句“深信建立中苏间之友谊与合作为可能者”之外，并未对苏联作一句正面的责难，却侧过脸来专门向美国说话，可谓文不对题，找错了对象。其三，在这一个“国际问题”中，中国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假如在这一个

“国际问题”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中国，不首先负起责任来直接和苏联解决困难，却只希望美国有所表示，我们认为此种态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们应当自己先挺起来，然后希望人家来支持我。自己挺不起，只想人家来替我们撑腰，替我们收拾，这种心理和作风是要不得的。

二、孙氏在谈话中所希望获得美国（或美英两国领导下的西方强国）的“援助及鼓励”，包括军事给养、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项，其中尤以军火为最重要。孙氏说：“中国之美式训练及配备军队，现缺乏军火，故亟需自美国获得接济。‘东北之得失’端赖于此。”又说：“华盛顿与伦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当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军火。”这恐怕是孙氏谈话中最实在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见是：孙氏有无考虑，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之中国政府，究为何等情形的中国政府。照我们的意见，美国所愿意援助及鼓励的中国政府，必须为一个健全的及民主的政府；健全系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系指政治作风而言。现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这种条件？本刊本期所载N. Peffer这篇论文，官方想必早已读到。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形，相当了解。近一年来，南京政府天天在喊宪政，可是宪政宪政，实际上哪儿有半点宪政的影子？在这次学潮中，世界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现存政权的真面目，必可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麦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统治得乖乖的，而马歇尔在中国，七上八下在大热天跑庐山，花了这么许多冤枉钱，到头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间对于美国的友谊，一落千丈，美国所为何来？费孝通先生说得好：“马歇尔应当已经明白，他本来要扶植的对象实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马歇尔）失望的是在这个政治权力下，连美式装备都全失其效力。”（阅本

刊第2卷第16期文摘栏费文）近来国内国外都有美式配备落入共军手中的传说，一方面希望美国供给军火，一方面原来慷他人之慨，将整批的美式配备送给中共，这个问题美国不能不考虑。现在据一般的看法，认为即使美苏不幸终止战争，美国也不是非有中国不可。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这样腐烂，这样堕落，一味巴望别人援助，实在近于"一相情愿"。孙氏关于这一部分的谈话，仅仅公开了一个秘密：即今日南京政府军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政府大员在谈话中如此露骨地表示切望美国军火的接济，尚以孙氏此次谈话为首。

三、在孙氏22日一次谈话中，记者曾询孙氏，如其美国反响冷淡则又如何？孙氏答称："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是在中国之外国势力，惟有苏联，则政府将重新考虑态度。"我们认为孙氏此言，甚不得体。孙氏所谓"将重新考虑态度"是指什么呢？这可分内政外交两部分来推敲。若从内政上说，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系指目前的内战而言。目下的事实是"战"，则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在逻辑上当系指"和"。但中国的内战，公平地说，并非美国所要求者，故我们不能认为"战"即为对"美国支持"的一种义务，"和"即为对"美国不支持"的一种报复。况且孙氏已斩钉截铁地说："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所以所谓"重新考虑态度"当不是指内战而言。就外交上说，按照孙氏语气，在逻辑上似乎是：假如美国放弃中国，则中国只好倒到苏联怀抱里去了！我们觉得此种谈话，甚成问题。在常识上，孙氏一面表示"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国放弃中国，中

国即将倒到苏联“势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实可怀疑。再进一步说，中国自有其主权，自有其独立的国格，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的对华关系，根本上谈不到什么“放弃”“不放弃”。按照孙氏谈话，不啻公开认为中国已是别国“势力”之内的东西，所以假如甲国放弃中国，中国只好投到乙国的“势力”中去。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孙氏这种论调。在国际社会中，外交运用，当然极尽奥妙，但如公开宣言，便近似无赖。我们很坦白地说，我们认为孙氏此种谈话，已经迹近一种 blackmail“敲诈”。孙氏为今日国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国府副主席的身份发表此种谈话，孙氏个人声誉的损失，其事小，国家国格的堕落，其事大；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郑重提出，表示异议的。

四、只有一项事实我们尚难判断：即孙氏此次谈话究竟是授意的，还是自发的？假如是授意的，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假如是自发的，那只是代表孙氏个人的。但即使是后者，孙氏既身为国民政府副主席，我们亦不得认为他在这样严重的政局中发表这样露骨的重要谈话，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见解，而一无政治意义。照我们的看法，这次孙氏的谈话，只有一个意义，即孙氏谈话的目的显然在观测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的反响。因为从技术上说，假如南京政府真正不能支持，它尽可以以最机密的外交通牒照会白宫，正如英国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正式照会美国它不能继续担任它在海外的任务，要求美国先来接受它在希腊的任务一样。南京政府派往华盛顿从事外交接洽的人员很多。假如仅仅是对杜鲁门和马歇尔等呼吁，实无须孙氏公开发表那样毫无掩饰的谈话。美国朝野对于孙氏谈话，将作何种反应，须由日内的电讯报道说明之。不过一个国家由其副元首

发表语气如此坚决，无甚转圜余地的谈话，事不多见。然而我们亦正可从孙氏的谈话中，明了今日南京政府业已面临如何严重的政治关头。

6 月 23 日

（原载《观察》第 2 卷第 18 期，1947 年 6 月 28 日出版）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

10月24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送立法院审议。本刊函约韩德培先生撰文评论，以供当局参考。韩先生这篇文字，是从政治的和法律的两个角度上着笔的，所论极为详尽，我们极望立法院审议这个《草案》时，对于韩文所论，能予采纳。我现在再就条文的本身，就韩文未触及的地方，补充意见如下：

一、《草案》第2条："出版品分下列3种：(一) 新闻纸，指用一定名称，其刊期每日或隔6日以下之期间，继续发行者而言。(二) 杂志，指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7日以上3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者而言。(三) 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属之。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

上文发生下列疑义：

1. 用一定名称之出版品，其刊期在7日以上3月以下之期间，继续出版，但并不装订成本，在此种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2. 用一定名称，并装订成本，其刊期在3个月以上，(如每100日出版一期，或每4个月出版一期) 继续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为"杂志"论?

3. 有一种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种“丛刊”），其编制与杂志相仿，其刊期大体上每隔10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并未明白规定，在此种情形下，该出版品究为“杂志”，抑为“书籍”？

4.《草案》第2条最后一句：“新闻纸或杂志之号外或增刊副刊等，视为新闻纸或杂志”，所谓“视为新闻纸或杂志”，其义含糊不清：视为“新闻纸”或“杂志”乎？抑视为发行该项号外、增刊、副刊之该新闻纸或杂志之一部分乎？如系前者，则该“号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须按照《草案》第9条规定，于事前申请登记，非奉核准，不得发行。如系后者，则报社（新闻纸）即可出版各种副刊（即“杂志”），杂志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闻纸），或其他副刊（即杂志），而不须另行申请登记。

上举4点，足见原文用字，颇多含糊。立法院于审议时，应求其明确清楚。

二、《草案》第9条前半段：“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者，应由发行人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10日内转呈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后，始得发行。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

上文发生下列几个问题：

1.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时又须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这儿发生的一个问题：即省政府或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为最后之决定？抑

或须俟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以后，才算获得合法的发行权？如系前者，则内政部登记证之获得与否，便无意义；即使没有内政部的登记证，亦无碍于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果系如此，则又与《草案》第10条，第15条所规定者不符。如系后者，即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须于获得内政部发给的登记证后，才算完成依法申请登记的最后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但《草案》只说"省政府或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并转请内政部发给登记证"。而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却无明文规定，实有不妥。因为既然认为要俟取得内政部的登记证，才算取得合法的发行权，则该新闻纸或杂志，虽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发行；而如内政部的登记证迟迟不发，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始终在一种尚未获得合法根据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势必影响该新闻纸或杂志的业务计划。按照过去情形及《草案》规定，内政部的登记证应当是依法申请登记证程序中的最后一步，因此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对于内政部发给登记证的时间，亦应有明文之规定。我们认为内政部于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后，应于30日内发给该项登记证。

2.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人，应于发行前填具登记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主管官署，于10日内转呈省市政府，而后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是则自申请至核定，前后仅有20天的时间，不能谓不迅速。新闻局董局长10月30日在南京发表的谈话中，并特别提及此点，谓以前的规定为"15日"及"28日"，现在一律均为"10日"，使核定期间缩短一倍以上。但是问题不在核定时间的缩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时间以内核定，又怎么办？按照过去经验，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最感苦痛

的，是依法申请以后，常常石沉大海，迄无下文；甚至有经过6个月以上而仍不见批复者。因之，为解除这种情形，并减少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的困难起见，我们认为：修正的出版法应当规定：假如在向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申请登记，于30日后仍不为核定者，该申请人即可径行发行该申请登记呈文中所指之新闻纸或杂志。

3. 按照上引条文，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核准与否，其权在省市政府。但细查《草案》，关于此项核准与否的标准，只有一条，即："经审查与规定相符者，应于10日内予以核定"。这个规定的反面应当就是：只要不是与规定不符者，即应核准。但是问题不在此；问题在假如申请登记，与规定并无不合，而省市政府批驳不准登记，则其补救办法应为如何？在原则上，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其核准与否的权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沪平津一带，地方政府在各种顾虑下，人民要求发行报纸或杂志，比较上或尚容易，而内地及后方边远省区，如将此种权力，完全交于地方政府，则人民发行报纸或杂志的权利，恐将遭受更大的限制。因为内地的民主空气比较稀薄，中央也不能处处顾到，在此种情形下，恐将发生亲我者予之，不亲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论上说，宪法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这种权利，是为违宪，人民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诉讼。实际上，今日中国人民是否能行使此种方式，殊为疑问。因此，我们认为，是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应当更积极地明文规定：只要与规定相符，即应核准；同时规定：地方官署无故批驳，不准发行新闻纸或杂志，申请人可以向更上级的机关诉愿，以为补救？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的考虑。

三、《草案》第 9 条后半段："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如下：（一）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二）发行趣旨；（三）社务组织；（四）资本数目，器材设备及经济状况；（五）刊期发行新闻纸者并载明其版数；（六）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七）发行人及编辑人之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及住所。"

《草案》第 10 条："第 9 条所定应申请登记之事项有变更者，其发行人应于变更后 7 日内，按照登记时之程序，申请变更登记。……"

《草案》第 28 条："……不为第 10 条之申请变更登记，而为发行新闻纸或杂志者，得于其为合法之申请变更登记前，停止该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

按照上引条文，凡第 9 条所载各项，如有变更，便应申请变更登记，否则即将遭受停刊之处分。我们参以实际情形，此种规定，困难滋多：

1. 资本数目，器材设备，经济状况。先说资本。在币值这样不稳定的状态下，任何事业，它欲继续支持，势须时时增资。其事至明，不必举例。再说器材，譬如一家报馆，本来没有汽车，今年买了一辆汽车，这算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于经济状况，含义更不清楚，上一个月稍有盈余，这一个月勉可维持，下一个月或者亏折甚多，这算不算经济状况有了变动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则一家报馆或杂志社，恐怕一年到头，每个月都要申请变更登记。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所谓"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释。"所在地"之变更，可能有下列 3 种情形：

a. 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

b. 在同一城市，自甲街甲巷迁至乙街乙巷。

c. 在同一街道，自甲号门牌迁至乙号门牌。

条文中所言“所在地”之“变更”，不知究系指上列三种情形中的哪一种。若系第一种，则犹可说。但因为发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则照本《草案》第 7 条第 29 条等之规定，其“地方主管官署”业已变更，自应变更登记。但若包括第二种第三种，则对于新闻纸或杂志的发行人，便极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所谓发行所所在地之变更，包括第二种第三种情形在内。）譬如在上海这种大都市里，搬个家是极寻常的事情，而且照一般租赁契约，都规定期限，期限满后，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种情形下，关于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即须申请变更登记，未免使新闻纸或杂志之经营，太不稳定。至于印刷所之变更，也属同样情形。特别对于杂志，它可以这一个月交甲印刷所承印，下一个月交乙印刷所承印，再下一个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换一家印刷所，便须申请变更登记，亦未免骚扰太甚。

因之，我们认为：“登记申请书应载明之事项”中，当应求其简单。即以第 9 条第 6 款而论，需要在登记申请书中载明印刷所之名称，但事实上，办一个杂志，核准与否，尚无把握，还哪儿谈得到交哪一个印刷所承印呢？至于变更登记，应当仅限于发行人之变更为限，因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若有变更，则一方面对于旧的是“注销登记”，对于新的是“申请登记”，不应作为“变更登记”论。其余社务组织、资本数目、发行所地址等若有变更，应令发行人呈报备案，不宜作“变更登记”论。关于此点，我们希望立法院审议时，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 15 条：“新闻纸或杂志应记载发行人之姓名、登记证号数、发行年月日、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

我们以为关于“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并无记载之必要。我们认为新闻纸或杂志，其责任已由发行人负之，印刷所不应再分负任何责任。既不分负任何责任，亦即无将“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记载之必要。这次上海市节约运动委员会通过杂志用纸节约的办法，不正正当当地通知各杂志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纸节约的通知），而却规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过页数之杂志，企图通过印刷所来控制杂志，我们甚以当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为可惜。印刷所和杂志社的关系是业务关系，除此以外，即无其他。我们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业，而不要企图通过商业性质的印刷所来控制言论性质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 17 条：“新闻纸或杂志登载之事项，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日刊之新闻纸应于接到请求 3 日内更正或登载辩驳书，在其他新闻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请求后第 2 次发行前为之。……更正或辩驳书之登载，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

上文最后一句，发生困难。举例言之，假如一个报纸的头条新闻，有记载错误，被记载错误的本人或直接关系人请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是否应在头条新闻的地位，将该更正或辩驳书登出来呢？按照《草案》，是应当这样办的，因为《草案》规定：“其地位应与原文所载者相同”。但考诸古今中外，从未有一个报纸，其头条地位是登载更正或辩驳书的。

同时又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虽然在事实上不致于发生），即假如有一项记载，被记载的人认为记载错误，提出辩驳书一篇，竟长达 10 万字，则这个新闻纸或杂志应否予以刊载呢？如不刊，则违反法律。如刊，则照目前报纸或杂志的篇幅，恐非为之出

一特刊或专书不可。（假如是杂志，则它又违反了“纸张节约”的规定。）关于辩驳书字数的问题，亦应有补充的规定。

六、关于《草案》第4章（第21条至第27条）出版品登载事项的限制，韩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详论，我们完全同意。其中关于第26条：“战时或遇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规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记载”，此条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们主张在这条条文之后，加上下列文字：“中央政府此项禁止或限制之命令，应于命令发布后一个月内，咨请立法院追认；立法院应于接到咨文后10日内决定对于此项命令之追认与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项命令时，该命令应即作为无效。”

关于《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评，本人仅补充陈述几点意见，主要的部分均包含在韩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们反对另设《出版法》来约束出版事业；出版品的一切责任问题，尽可照民刑法的规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则出版法的制订，应力求其合理。我们竭诚希望立法院审议此案时，能考虑并采纳我们的意见。

11月29日

（原载《观察》第3卷第15期，1947年12月6日出版）

评翁文灏内阁

从5月20日总统就职的一天算起，经过10天以上的时间，到5月31日，所谓“行宪首届行政院”的组织工作，才告完成。我们谨就此事发表评论如下：

一、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这个过程本身，饶有政治教育作用。如众所知，这次行政院院长一席，总统本来属意张群，其次则属意何应钦。张何都谦辞不就，才邀翁文灏出长行政院。在过去，我们看到外国一些国家（最好的例子是法国），总统邀张三组阁，张三辞谢，邀李四组阁，李四辞谢，或者一个奉命组阁的大臣，邀此人入阁，此人辞谢，邀那人入阁，那人辞谢，心中十分纳罕。因为在中国，照过去大家所看到的，只见你抢我夺，惟恐做不到大官，哪有请他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这次请张群做，张群不做，请何应钦做，何应钦也辞谢不就；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说是新鲜的事情。张群何应钦为什么坚辞不就，原因很多，此处不暇详论；我们在此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说的，即张何两人，都觉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不容易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就不敢随便受命，这点极为重要。所以这次张何的坚辞不出，至少使一切热中仕途的人物，或者我们应当更广泛一点说，使一切人民，认识一点，即做官要负责任。调子高一点说，做官要对国家负责任；调子低一点说，做

官也得至少对自己的声名前途负点责任。没有把握做好，干脆还是不做。对于国家政治言，这是一种新风气，这是一种新教育。同时，10余年来，中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当然是蒋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后一关都得要获得蒋先生的同意；蒋先生要派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在通常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辞职不就的。但是这次希望张群蝉联，张群却坚辞不就，请何应钦出长，何应钦也表示万难胜任，弄得这个行政院院长，一天两天三天的过去，始终提不出人来。对蒋先生言，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经验。

二、我们在这次行政院的组织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政治，毕竟还落后得很多。总统虽然是5月20日就职的，但是总统的选出却为4月20日之事。新总统产生后，旧的行政院即提出总辞。按照欧洲各国常情，新阁应在一两天之内组织完成。假如在时局特别动荡的时候，新阁甚至希望能在数小时之内组成，使国家的神经中枢不致因政潮的波动而中断太久，俾可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我们的新总统和过去的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一个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院长人选应于总统就职的当天或第2天，由总统咨文立法院，请求同意。这次新的行政院院长入选，直到总统就职后的第5天（5月24日）才提出来，这种情形假如发生在外国，早已构成为极度严重的政治危机了。不仅如此，院长人选的提出既已如此迟慢，而翁文灏院长的组阁工作，竟达一周之久，亦属少见。而且这次翁氏的组阁情形，与欧洲一般内阁制国家的组阁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国，我们以法国为例，总统授命某人组阁，此一拜命组阁之大员　必须在数小时或10数小时内，决定他的“内阁”组得成或组不成，以便向总统复命。假如组得成，他当然是首相，假如组不成，他

便必须辞谢，由总统另邀他人组阁。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还要看他的组阁工作顺利不顺利而定。这次翁氏出长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长，然后再进行组阁的工作；这是和外国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为张何不干，结果跳出了一个翁文灏，这在一般人说来，是出了冷门。就一般观感而言，翁氏出长行政院，要比张何出长行政院，情形好些。现在一般人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八面玲珑、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愿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大家总觉得张群圆到有余，劲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愿意做一点事情的人上台做一下。何应钦本人的性情，尚称平和，但他是一个军人，中国人现在都不愿意军人过问行政，所以何应钦出长行政院，一般人也不欢迎。翁文灏的廉洁，是没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由这样一个人来试试，就事论事，在现局面下，还不失为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过这次翁氏组阁，不仅没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旧瓶旧酒；除了副院长顾孟余和秘书长李惟果两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余几乎全是原班人马，这点实在使大家失望。我们并不是说，在翁氏所发表的这一个名单之中，完全没有清廉自守、饱学有识之士，但是这里面也不见得个个都有良好的政绩，能孚国人之望。不管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总应当利用这一个时机，调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现，并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对于当前这个局面实在厌倦灰心，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是搞了10天，结果还是这样一个名单。是不是没有新人可用呢，还是现在这一副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们对于这事，简直弄不明白。我们甚至不能了解翁氏这次出长行

政院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看这个名单，哪儿有一点“翁文灏内阁”的味道？不仅人是旧人，最妙的是大都蝉联原有的部会。这样一种组阁，可说是一个100％的没有个性（character）的组阁，或者我们也可说，这个内阁，就是一个没有张群的张群内阁。为什么翁文灏上台，而带领的仍然是一个张群内阁呢？一个新的内阁总理上台，带领的竟是一个90％以上的旧内阁，我们很少听说过。组了一个星期的阁，到头还是这样一个名单，真是怪事。

四、关于行政院院长的成败问题，我们一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也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就谁倒霉，谁来做就谁牺牲。现在分两层来说。第一，我们认为，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力，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在理论上，行政院院长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握有极大权力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有多少权力呢？现在政府要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自然就得用军事，在外国，首相对于军事的得失是负全部责任的，而在中国，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对于军事方面有权力过问吗？没有。假如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打垮共产党，为了爱惜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应当和共产党和谈，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长的，有这个魄力使这个战的局面变成为和的局面吗？不像。假如真正要实行宪政，最起码的条件就得使宪法上面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民权，获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实上，人民究竟有无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其权操于党部及特务之手，行政院院长有办法把这种权力从党部和特务的手里转移过来吗？没有办法。行政院院长是一个政务官，而且是政务官

的头儿，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常常只是一个事务官。他所能有的权力，远比他所应有的权力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远比他所应做的事情为少。假如一个行政院院长，他没有权力来决定整个的局面，他怎能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局面，或者打开这个局面？第二，我们认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值低落，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地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战火不停，政府只能消极地东拉西扯，剜肉补疮，谈不到根本的建设。建国，建国，哪里会在烽火中建起国来！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由于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没有决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么办法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既没有力量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有什么办法来稳定物价着手建设？现在的行政院院长只是一个账房先生，他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他有什么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的门户变为一门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长行政院后，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场的虚文俗套也许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情绪也许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捩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

五、事实的分析是令人悲观的。但是就国家的前途看，我

们今日有一点是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我们应当使一个行政院院长是一个行政院院长。这就是说，行政院院长应有其独立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长和总统的关系言，应当是总统支持行政院院长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院长执行总统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长和立法院的关系言，按照宪法，行政院院长应对立法院负责，但行政院院长仍然可以在“坚持自己的政策”和“辞职”之间选一条路走，自己的政策不为立法院同意时，即挂冠而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上台又下台，两个上台又下台，政策才有改变的可能，局面才有打开的希望。行政院院长固然要努力赢取总统的信任和立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院长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间舆论的拥戴。假如前前后后的行政院院长都能有这种作风，合则留，不合即去；则即使总统的意志和立院的意见，不与人民的要求符合，迟早也会迫使他们跟上民间的公意的。整个的局势和人心业已动荡到了极点，我们当然希望内阁能够稳定。但是希望内阁不要和人民脱节，较之无条件的企求内阁的稳定，尤为重要。翁氏出长行政院，一般说来，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们也不一定就认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两人所能支撑得了的了。

6月2日 中山医院

（原载《观察》第4卷第15期，1948年6月5日出版）

一场烂污

在全国空前骚动、朝野争战多日之后，政府终于放弃了他那“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限价政策！这是20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前面低头的一个记录！在这20年中，这一个政府，凭借他的武力，凭借他的组织，凭借他的宣传，统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现在，弄得民穷财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终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场恶梦！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计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损失。人民已经经历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可怖的景象。他们不仅早已丧失了人生的理想、创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丧失了他们多年劳动的积储，并更进一步被迫面临死亡。每天在报上读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无不令人气短心伤。饥馑和恐怖、愤怒和怨恨，笼罩了政府所统治着的土地。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卖，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这是20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骗、剥削，在种种一言难尽的苦痛经验中所自发的一种求生自卫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发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发生在政府统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风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

个风暴已经威胁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怜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监视下不能有什么大规模的组织，因之也不能发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抢购，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怜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抢购从政治的观点来说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极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词，“无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崭新的教训。

“纸币”本来只是一张纸，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系于发行这个纸币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报纸登载大幅的广告，质问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钞不去抢购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英镑不去抢购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圆券就要去抢购呢?这问题真是问得漂亮!可是我们反问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民在以前（在10月31日以前)，有了美钞英镑并不一定要去抢购物资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圆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地说来，要以改革币制来解放中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本来是个幻想。发行法币的是这个政府，发行金圆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币的信用既然不能维持，难道金圆券的信用就能维持了吗?有人认为这次的改革币制和最近的放弃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吗?老实说，无非因为当前的经济情景实在不太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暂时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

抢购，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弃限价。这一切，说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币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将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钞，一律兑成金圆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转几转，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间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战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轰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们在敌伪时期所经过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没有弄到连饭都没有吃，连买大便纸也要排队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没有把民间的金银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业的活动。现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诅，有一肚皮眼泪说不出来！

70 天的梦是过去了，在这 70 天中，卖大饼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务员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妇因为米油俱绝而投河了，一个女儿的母亲因为购肉而被枪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报纸上没有传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阴魂不散的。许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话，将黄金白银美钞兑给了政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的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

70 天是一场小烂污，20 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20 年来搞足！烂污！

（原载《观察》第 5 卷第 11 期，1948 年 11 月 6 日出版）

政治失常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们要说的当然是11月11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发行金圆券时，规定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4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黄金一两兑换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兑换金圆券20元，将金圆券贬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发行金圆券时，大唱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调子，并且说谁破坏了金圆券，谁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现在，我们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当10月杪11月初全国骚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将有“更好”的办法颁布，所谓“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这个金圆券发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将民间缴兑的金钞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者，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黄金一两只兑金圆券200元，美金一元只兑金圆券4元，现在吐出来时，黄金一两却要金圆券1000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圆券20元，一“取”一“用”之间，赚上了5倍，这笔没本钱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财政困难，宣传黄金储蓄，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到真要支付黄金时，却来了一个6折，凭空扣去4成；这事大家当还记得。现在旧戏新编，又要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捏在手里，要圆就圆，要

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没有办法。再说八一九政府的经改办法，规定人民所存金银外币，一律须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逾限而未兑者，即视为触犯刑法，现在又允许人民持有美钞，并将美钞的价值，提升5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从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证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给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给政府扔下不理会了。修正办法第11条又说："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存期满一年者，除照章计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存款银行兑换金圆。在金圆未铸成前，得按规定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一年之后的情形如何，谁都不敢说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圆券贬值到什么地步，尤其不能想象，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银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无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脸皮来说，就等于要花2000元金圆才能兑到一两黄金；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盘精极！

第二件我们要说的是翁文灏内阁的辞职问题。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11月3日写了一篇论翁阁辞职的文章，可是4日中英文日夜报一律报道，翁氏坚辞，并已不到政院办公，翁阁的总辞书也已全体盖章，即将送府，翁阁之辞，似成定论，深恐文章刊出时，已成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数小时又临时抽了出来。不料我的文章刚抽了出来，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办公了。这次经改失败，翁氏的责任无可推诿。真正的来说，这个大责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负之（财政部部长当然有责任，但财政部隶属于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败，行政院院长的责任远

大于部长的责任，故此处不独立论财长的责任），有欠公道，因为拆穿了说，翁也不过是一个账房先生，既不是当家人，也做不了多大主。但就宪法的原则言，这件事总是要翁负责的。所以从政治的责任言，翁的一辞二辞三辞坚辞，都对。问题是他虽坚辞而当时竟未能坚辞到底。这次经改的失败，其性质不可谓不严重，其影响不可谓不广远，无论就个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责任言，翁氏绝无继续负责的可能。严格言之，就是10月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有关经改的补充办法一事，亦属不当。内阁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执行的政策的成败，政策既败，内阁即垮。八一九的经改办法，政府亦已自承失败，在此种情形下，行政院应当立刻呈辞，任何补充或修改的办法，都应由后任来决策办理。当翁氏上台之初，胡适之先生捧场，谓翁氏有勇气。我觉得当时翁氏并不是有勇气接受那个阁揆大任，他只是没有勇气拒绝总统这个组阁大命罢了。翁氏既无勇气拒绝任命于前，亦无勇气坚决呈辞于后。不错，当前的局势是危急的，政务不宜一日无人主持，但是从宪法原则来说，这个责任是属于总统的，而非属于行政院院长的。易言之，时局既然紧急，总统便应早日另定阁揆之选，已经呈辞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长，不能因为总统的迟疑不决而勉力维持下去。至于总统先生，行政院院长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责任，其辞呈应无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长，还不使之去职，则所谓“政治责任”也者，岂不成了好听的空话？翁氏一辞再辞，总统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总统对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对僚属气度之厚，假若一味坚留，则既破坏宪政的原则，亦置纲纪于不顾，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都是不当的。

第三件我要批评，而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赋予傅作义的权力的问题。按照报上的记载，要点有二：一、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不须事前请示中央；二、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与中央所颁布的法令有抵触者，以傅氏所颁布的法令为准。凡此记载，虽未见之正式公报，但也未见政府有何否认更正，想为事实。这个问题十分严重。举例言之，宪法第 4 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不得变更之”。现在假如傅氏要变更中华民国固有之疆土，则中央是否承认傅氏之变更为合法？宪法第 171 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假如傅氏所颁布的法令，有与宪法抵触者，则是否仍以傅氏所颁布者为准？凡此都是大有问题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只说傅氏的法令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以傅氏的法令为准，并未说到与“宪法”抵触的情形，如与宪法抵触者，自然无效。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宪法第 116 条明明规定：“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 117 条说：“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宪法明白规定地方法令不能与中央法令抵触，抵触者无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张傅氏的法令如与中央的法令抵触者，应以傅氏的法令为准，这种事情完全是违宪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抵触发生疑义时，应由司法院解释之，现在假如硬性承认傅氏法令与中央法令抵触时，即以傅氏法令为主，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大局越来越紧，各种现象日见失常，但失常也有一个失常的限度，当权者虽然希望保持他们的政权，但政治的常规则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荦荦大者，实际上，近来当局各种措置，大都有失体统。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

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

（原载《观察》第5卷第13期，1948年11月20日出版）

论　剧　本

——西南剧展献言之一

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今日在桂开幕，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过去的戏剧节，只有各地零星演戏纪念。这次第一届西南戏剧展览会，参加者有桂粤湘黔滇赣闽浙八省，达二十几个单位。战时交通十分困难，能举行此种集会是不容易的。这次欧阳予倩君的努力当然很大，而广西各界首长的协助，以及8省戏剧工作者的合作，也大有助于筹备工作的进行。我们欣逢盛节，愿意贡献这几天本报社评的地位，就戏剧事业的各方面，发表一点意见。

今天先谈剧本。中国戏剧界素闹剧本荒，近几年来这情形似更严重。其实这几年来，写剧本的人只有比从前多，剧本的产量比从前增加，剧本的素质比从前提高。但是我们的时代毕竟进步了，戏剧活动如雨后春笋的茁壮发展，剧本的需要量因此大增，一般文艺鉴赏的水准提高，对于剧本素质的要求也因此益苛，所以无论从戏剧工作者说或从一般社会来看，都感觉当前的剧本不能满足要求。所谓剧本荒，本有“量”与“质”两种意思在内，但严格言之，还是一个“质”的问题。有100个不成器的剧本等于没有一个剧本，而大家感觉的还是好剧本太少了！

中国何以不容易产生好剧本，正如中国何以不容易产生伟大的小说一样，原因是很多的。我们不能在此一一讨论，现在只能提出一点来说。我们认为一般剧作家，他们为人态度和写作态度的不够严谨，不肯用功，使他们不易写出深沉的作品。他们对于题材及结构，常常略加思索，即草率下笔，甚至还有漏夜“赶写”的风气。文学是需要天才的，但有了天才，还须加上锻炼，单靠聪明是不够的。这是一层。其次，现在许多文学理论家，写起文章来，满纸的“主观”、“客观”、“观念”、“意识”，什么“观念”、“意识”，我们姑置（且）不论，但是剧作家应当认清，戏剧始终是一种艺术。易卜生的戏剧，在剧本里常包含着一个社会问题，他在他的剧本里，当然藏有他自己对于该一问题的问题和看法。但是易卜生终于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他的作品也是不朽的，因为他的戏剧除了他所欲表现的那个社会问题之外，剧本本身还具有无上的艺术价值。所以，一个剧作家假如他的脑子里尽是装满了“观念”、“意识”而忽略了艺术，他的作品一定失败，或者至少他写出来的不是一个戏剧。我们现在的文艺界，就流行着这两大毛病：一、大家自以为天才，抓到一个题材就写；二、崇信艺术即武器，以为有了“正确”的观念即无需顾到艺术上的造诣。这两大毛病使今日中国文艺界，无论小说、诗歌或戏剧，都不易产生深刻的作品。就戏剧论，我们颇不以一般剧作家不加深思即草率下笔为然。我们要求一般剧作家多读西洋的戏剧名著，多多考察人性。有些剧作家常常说：“我这一年内预备写成几个剧本。”我们觉得这种剧作家应当换一个调子说：“我这个剧本预备在几年内写成。”一般剧作家应当多吸收，多思索；没有把握，不妨沉默几年再动笔。我们最怕一个剧作家用最浮浅的公式来表达一个观念，或

者喊几声口号。抗战以来这种公式化的剧本为数不少，譬如宋之的《雾重庆》，一定要配上两男两女，戏剧里的变化都循着一个公式进行，这种技巧是何等的贫而弱，而所表现的又是何等的浅而俗。我们在戏剧上的艺术水准，不仅应当以全国的文化水准为标准要求提高，并且应当极力以国际间的文艺水准，来提高我们的文艺水准。要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虽有二三十年历史，但拿国际的眼光来看，还是很幼稚的。譬如××，是国内一个很有地位的作家了，但是他的《××》，某君在伦敦译成英文，拿到一家书店去时，那家书店批评这一位作家根本不能写小说；他的另一部长篇《××》拿到美国去时，美国的批评家认为这本小说根本不值得写。我们举出这个例子，仅仅要让我们的作家知道，以国内的标准来批评，某一个作家也许很有成就；但以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便觉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这一番话本来是适用于全部文艺界的，但今日既论戏剧，我们便希望我们的剧作家，多多凝练，不要把写作看得太容易了，不要太把自己相信了，大家应当写一点更结实的东西，写一点能够有50年生命的东西。

当然，在中国的戏剧界里，并非没有特出的人材和特殊的剧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我们提出曹禺也正可以辅证我们上面的论点。假如曹禺没有在清华图书馆里的几年努力，他是不是能有今日的成就？曹禺写作品是不是像目下一般作家略加思索以后即鲁莽动笔?曹禺是不是像许多作家一样，成了名之后即粗制滥造，东西酬应？我们有没有读过曹禺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感，有如有些作家一成名之后，便多才多艺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批评、杂感，无一不通，无一不精？曹禺的作品如《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

人》等，它的题材、结构、手法是不是各有特色而足以证明作者依然在努力上进？曹禺难道没有曹禺的思想和观念吗？难道他没有在他的剧本里传达他的思想和观念吗？但是我们读曹禺的作品时，我们大体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走正路的作家，一个可以敬佩的作家。是的，曹禺的《北京人》得奖后，有许多人大起攻击，声势汹汹，但是，今日中国到底有几个“曹禺”呢？老实说，我们对于中国的剧作界没有过分的奢望，我们只希望中国剧作界里有10个“曹禺”，这10个“曹禺”每人每两年写一个剧本，让我们在10年以内，能产生四五十个像样的剧本。

我们在此推崇曹禺。我们推崇曹禺，因为（一）曹禺从事写作，并非全凭聪明。他早年用真姓名写过剧本，因觉无甚希望，遂发奋苦读，经过多年沉默，始再用笔名尝试写作；（二）曹禺每次写剧，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才敢下笔；（三）曹禺成名之后，写作的态度仍极严谨。我们认为这些态度都是可取的。我们并认为一般文艺写作者都应学习这种态度。学习他人，不一定要学习已死的人，活人也可以学习的，不一定要因为政治的理由去学习他人，文艺工作者也应当为了艺术的理由去学习，学习值得大家学习的人。

（原载1944年2月15日《力报》）

论 剧 人

——西南剧展献言之二

昨天，我们就剧本及剧作者的写作态度，发表了几点意见。今天，我们愿就一般戏剧工作者（包括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剧团行政人员）的生活态度，说几句话。

从事戏剧事业的人，在中国社会上素来不受人器重，这是大家承认的。这一种风气渊源已久。近年来经政府的提倡，以及一部分从事戏剧事业的人的自重自爱，社会上对于戏剧及剧人的观感着（逐）渐改变。中国社会何以不器重剧人，原因很多，我们以为剧人自身知识的不够，生活的不检点，品性的堕落，是他们被人轻视的一个主要原因。譬如说旧剧，大家总易引起一种印象，觉得“伶人”的生活充满着罪恶和堕落。说到电影，一提起“明星”，大家便会联想起一切荒唐和放荡的行为。话剧界的情形稍好，因为无论剧作家、批评家、导演、演员，他们的素质和人品，均比旧剧界和电影界优秀高尚。不过就全体而论，戏剧这一种职业，特别是演员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完全祛除一般社会上所有的那种传统的观感。一般社会不重视戏剧，不器重剧人，这种观念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要改变这种错觉，尚须剧人奋斗努力。我们以为戏剧工作者要使社会尊重他们，必须在生活上严肃认真。艺术上的造诣，只能使人崇拜和

赞誉；只有生活严肃，才能使人尊敬器重。

"生活严肃"，这句话是很抽象的，这只能说是一个原则，包括的内容当然很多。我们无法将生活里各种琐碎的事情，都提出谈论，现在只能拣两点来说：

一、我们以为一般戏剧工作者对于金钱的处理，应当清清楚楚。这须分几层来说。一般艺人对于钱的问题总不易处理得有条理。不能有规律地处理金钱，即不易安排有规律的生活。譬如一笔钱到了手，这笔钱应该用一个月的，但10天就用完了，其余的20天必然在穷困中生活。假如因钱一下子乱花乱用花光了而使其余的日子不能维持正当的饮食起居，便足以损伤健康；假如因没有钱用生活困难而引起情绪烦躁，不仅损伤健康，而且影响工作；假如因自己用钱不当而常向朋友借贷，足以伤志，足以失信，足以毁坏一个人的品性，这是指一般剧人泛论。假如负有主持全团剧务责任的人，或者负有经管剧团事务的人，如庶务、会计、出纳等，如其处理钱财，不能清清白白，则全团的团务，一定弄得不堪收拾。小则团务将因财政困难而不易发展，大则剧团可能因帐目紊乱而致解体，驯（甚）至互相攻击，声败名裂。文艺工作者大都是收入微薄而生活艰难的，但也未始没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他们生活的困乱，实由于他们用钱不得其法所致。所以无论从私人生活或从团体生活着眼，处理金钱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假如一个人，在金钱方面不能清清白白，他将永远无法得到他人的信托。我们感到过去一般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个问题最不注意，所以愿意提出此点来勉励大家。

二、我们希望一般戏剧工作者，特别是男女演员，对于社交生活，能维持一个较严肃的态度。艺术本来是不能用科学的

逻辑和规律来规范的，艺术家的生活也是不能用通常的道德标准来测量的，这是人性里的自然倾向，我们无法用通常的理性来张求强为。不过我们应当看清一点，即东方的伦理观念和西方的伦理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社会上，性道德的尺度比较宽；在东方社会上，性道德的尺度比较严。我们处在东方社会中，我们所抱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观念不能和西洋人一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社会上，一个人最易招受物议，弄到声名狼藉的，便是在社交生活上的失检。戏剧工作者，特别是男女演员，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两性之间接触的机会最多，也最容易。两性爱好原是人情之常，但这种感情应当尽量纳入正轨，使它在正常的河床里活动而不要逸出常轨。大家应当尽量约束自己的感情，而弗放纵自己的感情。在工作时，一切必须的表演接触，那是“工作”；工作以后，便须严守自己感情的界限，而保持一个正常而有尊严的生活。其实，当我们检讨至此时，我们未尝不叹息社会对于剧人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的确承认，至少在话剧界一方面，一般工作人员的生活风气是非常良好的，不过，过去因为有些“明星”的生活太失检了，遂使社会对于从事演剧的人已形成一种可怕的成见。所以今日一般戏剧工作者必须对此一点特别注意，对于自己的生活严加管束。如能这样，必可使社会对于剧人观感改变过来。

（原载 1944 年 2 月 16 日《力报》）

论　观　众

——西南剧展献言之三

今天论观众。一个戏演出，成功失败，条件很多，观众的水准和修养也是演出成败的条件之一。中国的新戏剧运动，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但是新戏剧运动中始终未能培养出良好的新戏剧观众。这责任不在戏剧工作者身上，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不上进了。大多数的戏剧观众都没有受到良好的剧场训练，他们入场不守时间，随意谈笑，随意出入，完全不顾到剧场秩序，完全不知道剧场里需要静穆的空气。就这点论，社会一般的进步跟不上戏剧工作者的努力。但教育观众的主要任务仍在戏剧工作者的肩上，因为最最实际训练观众的地方仍然是剧场。现在西南八省的戏剧团体都在桂林，我们愿意提出 3 点，假如今后各地办理剧务的人，都能将这 3 点切实做到，决不苟且，决不通融，则 10 年以后，社会上一般观剧的人，也许可以不致如今日这样缺乏看戏的修养。

一、座位必须对号。这一点可分几层来说。我们现在非常爱看戏，但又非常怕看戏。怕看戏的原因是怕等候。7 点钟上演的戏，6 点钟甚至比 6 点还要早就要去坐在剧场里等。多可怕，时间浪费，精神疲倦。但是迟去了没有座位，或者座位很坏，所以大家需要先去抢座位。因为要抢座位，要先去抢座位，必得

影响剧场里的秩序，影响剧场里的空气和卫生。(对号入座这一点在桂林已经做到，但我们这篇文章并不是对桂林一个地方写的。）不仅戏票须编座号，并且应当将售票时间改定。假如单单在上演之前售票，剧场的秩序仍不易维持到理想的地步，因为大家要想得到较好的座位，仍须在上演之前很早就去买票，而且中国一般戏院里的售票处和剧场是一墙之隔，售票处过分拥挤喧哗，仍足破坏场内的安逸静穆。假如在白天普通办公时间，可以购买戏票，则观众中可以雇人去预购今天或明天的戏票，否则也只须在上演时间前一刻钟购票入场。大家可以从从容容，不必争先恐后，或者担心票子买不到，或者声嘶力竭地去抢着买票子。到了上演前的一刻钟，10 分钟，甚至 5 分钟，凭票入场，对号就坐，既省时间，又省气力，而剧场里的秩序可以维持得好，剧场里的空气也可避免过分污浊。

二、小孩绝对不准入场。许多剧团都注意到这点，但执行得总不够彻底。中国人是讲情面的，所以有时虽然说明不准携带小孩，但仍放了进去。中国人有许多是不讲道理的，大骂大吵，招待人省得惹出是非，也就放了进去。我们对于带小孩子去看戏，最为痛恶。一般做父母的为什么要这样自私！孩子并不需要看戏，为什么做父母的要强迫他们的孩子守在那没有新鲜空气不使孩子感到一丝兴趣的地方两三个钟头？孩子有时已经需要睡眠，为什么做父母的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损害他们孩子的健康？有些孩子因为身体上或精神上感觉苦痛，于是啼哭或者叫闹，破坏剧场（观众）的情绪和扰乱剧场的秩序，这种做父母的人，为什么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不顾全体的幸福？父母都是爱子女的，可是这些做父母的，为什么不能为了孩子牺牲一点？既可不损害孩子的健康，又可避免破坏公共的福利！

中国人太自私了！我们主张，特别是演话剧，绝对不准携带小孩，任何理由都不通融。这点在中国社会上最不易做到，但必须做到，必须以最大的毅力做到这点。这是一种社会教育，我们恳求办理剧务的人来负起这个教育的责任。

三、在上演时，观众不许随意出入。演话剧，第一幕开幕后，迟到的观众应当请他们守在外面，要到第一幕闭幕后，第二幕开幕前，始能入场。中国人素来不守时间，常常戏开演之后，观众还是络绎入场。这现象对于旧剧无甚影响，但对于话剧的表演颇有打击。观众入场，寻觅座位，不能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这种声音当然影响到其他观众的听觉和情绪。谁叫你不按时入场呢？所以在外面守候一小时，也是应得的处罚。不过这一层有一点须附带一说：一个理想的剧院，剧场和戏院大门应当有一段宽裕的距离，使外面的声音不致传入场内。中国剧场的建筑，因经济的关系，大都不能做到这点。所以这事执行，当然有困难，因为在初时一般社会上尚无此种习惯时，观众不服，难免引起争吵，结果影响场内。但这点也须看当地一般文化水准如何。从前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演剧时，即系如此。那时公余俱乐部所建筑的小剧场，规模很小，假如观众在外面闹起来，是很容易影响到剧场里面的安静的，但事实上很少因此发生争执。至于每幕上演时观众的任意出入，自然也希望避免，不过这点容易做到，不致有过分的困难。

（原载1944年2月17日《力报》）

中国人与英国人

一

著者近撰《英国采风录》一书，业由商务出版。该书所叙述者为该书著者所知之英国，而该书之著者则为中国之公民。以一个中国人叙述英国事，当他行文之际，他之常常不能自己地将他所属的国家和他所叙述的国家做种种比较，亦为人情之常。但这种比较也仅是片断而非全盘的，全盘而有系统的比较固有待于专书，而此非他目前学力之所能逮。

然而纵然是片断的感触，也究不能不有感触的中心。著者常思及两项问题：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就后者论，一国强弱的原因诚非一端，但英国的政治社会究为英国人的政治社会，而中国的政治社会又为中国人的政治社会，一个国家的兴衰隆替，究不能说和这一国人民的性格习气一无关系；故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仍可于前一个问题中得之，而著者之感触因之

亦得纳为一点，即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及社会的风气究竟有无异同，其间得失又为如何？

二

著者初初感觉中英两国的民性及社会民气，几乎无一相似。但若稍加思索，这个答案显然有欠谨慎。当我们说到英国人时，我们便会想到那为世人盛称的“英吉利典型”——那些英吉利典型的人民。但当我们论及中国人，论述他们的性格、生活及事业时，我们便不得不先辨别我们所论述的中国人究竟是那一类中国人。现代的中国人实已失去了他们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在今日的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至少可以大别为两类，一为农民，一为知识分子。这两类中国人在性格上实大相径庭。

英人性格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务实重行。英人不重视抽象的理论，很少幻想，不尚辞令及一切浮面的虚文。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们密切注视现实。他们发言率皆明浅朴实，而其决策和意见总是切合实际，力避好高骛远。他们及一般官吏，总是集中精力于其职分内的工作，很少参加无关的公共集会，很少发表大而无当的演说。社会上华而不实的会议本就不多，会议而动辄发表冗长的宣言者，尤不多见。政府官员就职或新成立一个机关，不一定有隆重的仪式；人民对于一个官吏或一个机关的期望是他实际的工作而非他动人的辞令或辉煌的典礼。政府各部门总是尽量的在沉默中埋头工作，而其工作亦都能按照步骤实事求是。在一般社会及人民的日常生

活中，英人也都实实在在。英人治学大都严谨而刻实，他们对于美国人爱编教科书的态度，总不敢苟同。英人经营事业大都脚踏实地，不夸大，不游移，不侥幸，并十分注意工作的效率。他们对于一件事业，孜孜不倦，有始有终，总要得到一个结果，决不半途中废。在人与人之间的往还中，也很少用巧佞的辞令。英人通信总是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所要说的话。见面接洽事务，也不先作寒暄，他们简单扼要，对于数目则力求准确。以舌及权术为资本的职业政客在英国的土壤上殊不易滋生。大多数人都讨厌抽象的理论，视无裨实益的空谈为一种浪费。他们喜欢行动，他们最大的愉快是从实行中实现希望，获得成功。英人因秉性沉默寡言，他们遂得将其精力集中于行动。英人这种务实重行的精神，使整个英国社会蓬勃有朝气，使社会各阶层各方面，都能结结实实，热力充沛，潜有无限坚韧的力量。在承平时，他们虎虎有生气；在危难时，他们能力抗狂澜而不为狂澜所撼。

著者以为中国的农民也颇务实重行，他们也是不长于抽象的理论的。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他们有时虽因贫穷无告，不能自己地引起一些侥幸之心，但这仅是绝望中的愚念，除非运用想象的结果。他们生活里的惟一要义是工作。农夫的耕耘，农妇的纺织，手艺工人的手艺，他们固无分寒暑，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他们称做工为“做活”或“做生活”，他们生活中除工作之外实无其他。中国古人本有勤俭起家之训，俭为节流，勤为开源；开源之道，惟有茹苦耐劳，勤奋做事。中国农夫的勤劳是世人公认的。无论是大风大雨或者炎日当天，他们做活时从无畏缩懒惰之态。他们在施肥、犁田、插秧、戽水时，无不出心出力，与英人之在

工作时既出全部精力（energy）复出全部能力（capacity），实堪媲美。在大旱或大水时，他们诚不免有打醮求神之事，人之在绝望中转而乞求于天，亦为可恕之情理，但他们也并不因此即袖手坐待神助之来临，倘有努力之道，他们固无不尽其最大的努力。乡村中的公共事务如造桥、筑路、筑坝、填堰，以及御盗、防匪、打醮、演戏、敬神、赛会等，也都能出钱出力，一呼百应。所以在中国乡村中，亦尚有说做即做的精神。乡村中人情来往，送猪送布，也都能实实在在，不像城市中人送几个空纸包，送者受者还要扭扭捏捏，推来推去。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务劳务实，克勤克俭。三家村上的长舌巧妇，究为偶有的点缀，而乡绅先生喜欢在镇上的茶馆喝一杯清茶，也决不使他家里的庄稼人，觉得喝茶聊天较下田做活为逍遥；何况这些乡绅上茶馆也非一无正经，他们判断曲直，介绍婚姻，接洽善举，也正为农村社会中不可或缺之事。中国一般老百姓的物质主义也殊与英人相去无几，他们的娱乐生活，总是离不开有实体的东西，在农余的阴历年节中，他们演戏、舞灯、赌博以及打锣打鼓，固无一事要用抽象的思索力。

然而这种务实重行的性格，在中国知识阶级的性格中，极其缺乏；至少就今日我们所见者论是如此。今日中国知识阶级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中国知识阶级之好表面的虚文，正如英人之好实际的行动，中国知识阶级之不重视行动，又正如英人之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今日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好发表演说，并喜欢演说与他职务无关及与他所学无关的题目，而其演说常空泛不着一物，冗长而无一字足以震人的心弦。官吏就职或新机关成立，例有隆重的仪式，这种典礼既费人精力而又无什么意义，但竟不可省。新官总不忘

记在就职时陈述他所抱持的理想及计划。理想与计划诚属必要，但尚未兑现的诺言，固毫无任何实质上的价值；不幸无实际价值的诺言，又充斥于中国的新闻纸上。带有全国性的会议闭会时总要发表宣言，起草宣言的人参考已往所发的宣言时，又何尝不觉得那些旧宣言大可拿来再发表一下？但总要于变换字句以免文章的雷同后，再发表一篇。政治上的设施举措，遇有改变时，必有一套套头头是道的理由，实则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有些地方长官对于他本省的施政，定出一套理论，并绘成挂图，张挂全省，其所用的名词以及彼此相互关系，其系统的精密周详，实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但实际施政，常与挂图所标榜者相去甚远，有时甚至竟如风马牛之毫不相关。无论什么集会，讨论章程或条文时，则虽一字一句，亦会引起热烈的辩论，经久而无结果。报纸上的新闻记载或读者投书有涉及机关时，那个机关总要备函更正，详述如何如何与事实不符，但对于投读中所提的建议与批评，则缺乏研究的兴趣。甚至强敌压境，讨论协助动员时，据报纸记载："到会者均感情激动，以致发言盈庭而无结论"。至于一般私人生活之陷入于空浮而不知自拔者，更处处皆是。中国人写信的那套虚文格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常人所称的"八行"。无论写信或面谈，总要先兜很大的圈子，真正的事情放在最后才说。前方大捷常引起诗人墨客的诗兴，使一个最最具有行动性的事实，在中国竟会成了一种最最缺乏行动的呻吟的材料。平心言之，今日中国人（以下言中国人系指知识阶级）中又何尝没有做实际工作的人，否则我们这次战争中种种伟大的艰难的工程和事业焉有今日之成就？他们确能出汗出力埋头工作。但我们从大体着眼，看今日中国社会的通病，究不能不承认大多数国人之好高而不切

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致我们有多少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或仅有外表而无实际，花费了许多金钱、时间、精力，而与实际的民生一无裨益。中国人的抽象能力确是丰富；可惜中国人的生命力在抽象的理论上耗费得太多了，以致在实行时，便不免畏葸软弱，缺乏力量。其结果，遂使我们的社会上只是充满了各种理论、口号、标语、宣言、计划、报告、教规、条文、守则、演说、座谈等等。单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也是蓬蓬勃勃的，但一究实际，只是一股空气。我们有时也确能振奋一时，但这种一时的振奋常是发乎感情而非出于理智，发于感情的只是“冲动”而非“行动”，“冲动”只能一时，“行动”才能持久。我们社会上各种制度和各种事业之常常更弦改张，也可归之于中国人抽象能力之太强和感情之易于冲动。做事的人已较放言的人为少，再加上制度的时时更改，使社会的基础益更变得游荡飘浮而不着实。中国人的生活也总不够紧张，不够认真，不够严肃。譬如在这次战争中，除了一小部分如与军事有关的工程、工矿、生产的人员及在前线实际作战的部队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然是非常松弛的；战争仅影响了他们生活的程度，而未尝激动起他们生活的热忱。一般机关里的办事效率也依然如故，甚至有较战前还松懈者。兹举一事言之：有一个时期，在后方许多城市里，地方政府常规定每日上午 8 时至下午三四时为疏散时间，不论有无警报，迫令人民疏散：强迫商人闭户，强迫居民出城，禁止乡人入城。在这时间中，全城罢市罢课罢工，整个社会陷于停顿的状态。(许多人在无聊之余，于是大打麻雀，以发泄其精力。)这种政策，美其名曰避免牺牲。假如全中国都是这样“避免牺牲”，则我们的国家社会，无需外敌进攻，也会自趋崩溃！我们看英人，当

1940 年希特勒对英伦发动空前的空中闪电战时，伦敦的人民依然行其所行，无所畏惧。即使在警报中，工人依然做工，百货公司依然交易，公共汽车、电车、出租汽车依然在街中行驶，医生依然看病，机关职员依然办公；直到敌机已临上空时，始入地下室躲避。Vera Britain《在英伦前线》一书里有一段描写伦敦的火车，大足代表英人在战争中的士气："从伦敦开出去的列车，并没有受警报的阻碍，票房依旧售票，乘客也依旧安坐在车厢里……就在高射炮声隆隆不绝，战斗机正在车站上空盘旋之际，开车的信号笛仍照常吹着，车首照常扬他的信号旗，而驶往海岸的列车也照常开出去，……这个火车站，也像英伦，也像被轰炸的民众一般，是决不受威胁的，决不听其业务停顿的。"英国在"不列颠之战"及"伦敦之战"里竟能挺得住，一大半应归功于英人，特别是伦敦人的不屈不挠。著者深信，本文的读者当将这种情形和我们自已的一比，必不胜其惭愧。同时亦必能同意：假如我们平时能实事求是，行重于言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这次的浩劫，至少必可减少我们这次所受的灾难的程度。

中国知识阶级之重言不重行，好虚文而不好实质，是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幸而中国的农民务劳务实、克勤克俭，又幸而克勤克俭的农民占全国人口 80%以上。假如没有他们的勤劳汗血，我们真不知我们的国家，更要贫穷虚弱到如何程度。但占全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在国家的治理及国家的进步上，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而统治的权力则操之于华而不实的知识阶级手掌之中。赖有这样的好农民，今日中国虽虚萎衰弱而尚未解体，正因中国士大夫不像农民那样务实重行，所以中国社会总不能弄得结结实实，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三

公共生活中的事业，依赖人人的群策群力。在简单的原始的社会中，以一二人的力量即可举办一件公共事务，而独善其身的人也可“一箪食一瓢饮”地过他独善的生活。但今则时代改变，近代社会的内容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及合作，在公共生活公共幸福中所占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有组织能力合作能力的社会，必定征服无组织能力无合作能力的社会，近代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事实昭彰，不容否认。但“组织”与“合作”却又为中英两国民性的一大异点，亦即两国一弱一强的另一原因。重行的英人有高度的合作能力及组织能力，而其主要原因则应归功于英人的能自我约束（Self Control）。公共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集体的行动，而在集体生活集体行动中，必须人人能自我约束。英人都非常真实，都能尽其本分，都有强烈的服务感，并有自省的习惯，所以他们在团体中，都能成为良好的分子，各尽其职，各尽其能，他们不需要他人的监督，他们也不甚有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私意识。同时，英人不长于抽象能力，缺乏抽象能力的英人既重行而不重理论，故人人能以团体为重，而愿牺牲他一己的意见。因为英人缺乏抽象能力，所以他们也缺乏妒忌的心理；妒忌实为公共事业的最大的敌人。英人重行动，只要对方也是行动之人（man of action），彼此即可组织起来。他们的人生观念大体相同，他们的做事传统也大体相同，再加上人人能约束自己的意志和感情，所以做事易于一

致。行动一致则效率自然增高，效率高则事业自然蓬勃而能成功发展。

不重行的中国人组织和合作的能力都非常缺乏。中国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强。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而每人的理想和办法又都是那样精细，以致在团体行动中，意见总不易一致。在公共的集会中，总是辩论热烈，有时且不免发生剧烈的争执，人人都要贯彻他自己的意见，人人都不愿牺牲或放弃他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见。意见上的争执又常常影响到私人的情绪，以致在行动时不能获得和谐的精神和一致的步骤。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争执的结果使一部分人消极退出，退出的人且会做反对和消极的行为。有者则讨论多时而一无结果，使最初的热情都烟消云散。抽象能力丰富的另一结果是妒忌心理的尖锐，人人不愿他人成功而乐见其失败，领袖欲强烈的人更不甘接受他人的指挥，因此在团体生活中不是明争就是暗斗，这些都易使公共事业受到致命的伤害而常中途夭折。

中国人不能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无论在做人做事各方面都缺乏一种同一的传统（tradition）。包尔温尝言："一律是一件坏东西"（Uniformity is a bad thing），实则英人在做人做事的基本习惯上，差不多是全国一致的。工业社会中的英人，人人都是积极的、前进的、现实的。说话诚实、做事负责、遵守时间、讲求效率、尊重他人的自由、生活富有规律等等做人做事的基本习惯，是全国普遍的。中国则完全缺乏这种情形。中国人有些做人很认真，有些做人很随便。认真做人的人，他的生活态度一定很严肃，不苟且；随随便便的人则有酒且醉，得过且过。做人的精神根本不同，做事的方式自然大相径庭。因

之有些人讲信义、守诺言、重效率、有热忱，又有些人则有诺不守、有信不复、约时不到、借钱不还，应做的事情一天一天地且推且过，一切马马虎虎。做人做事的根本精神没有最低限度的同一标准，要彼此合作共事，实极苦痛，而事业之不易顺利进行，亦势有必然。中国人的私生活也极不一致；私生活本来无须求其一致，假如人类在私生活上尚不能自由自在，则人生更将缺少乐趣。但在英国，第一，至少在工作、休息、睡眠、饮食等一般生活上有大体相同的习惯；第二，假如参加团体生活时,各人必能约束个人的私人习惯而适合团体的公共习惯。在中国，很少人在公共生活中能约束他个人的意见，约束他个人的感情，约束他个人的习惯与嗜好，想到自己以外的他人及团体。所以在中国，一切关于公共生活的组合如公共食堂、公共宿舍以及公共厕所等，最难管理，最难得到圆满的成绩。你要睡眠，他偏唱戏，你爱清洁，他偏不顾公共卫生。中国人无论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尽量放纵他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而毫不知有所约束。中国人只知一己而不知他人，只知独行其是而不知与他人协力合作，所以中国的社会散漫而不凝结，松弛而不严密，只有一时的集合而不易有经久的组织，只有小规模的经营而不易树立大规模的企业，人民的能力总是分散而不易集中，不能发挥出庞大的威力。

在中英两国，都有几句谚语，这几句实可充分表示两国的民性。英人有言：

> 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
> 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
> 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中国的谚语则为：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扛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四

中英两国民性的另一个不同，是理性在两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异殊。理性是英人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惟一的出发点，若没有英人那种重视理性的性格，则今日之英人固无今日之英国，而今日之英国社会亦必为另一种社会。

英人重视理性的结果，乃有英国的法制。英国的法制，一方面是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无一人得自处于法律以外；另一方面则官吏及人民都须依法行事，重公法而不重私情。就前者言，既自君王以至庶民，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故官吏并无特殊的地位，也无法律以外的权力。官吏的权力由法律所赋予，官吏行使权力而超出法律所赋予的范围，即为滥用权力，滥用权力为违法的行为，违法的行为即应受法律的制裁。官吏既无特殊的地位，故官吏违法时，亦受普通法律的制裁而由普通法院受理，一如平民所受之待遇；自首相以至巡警，法律法院对他们固无所宽假。就后者言，官吏及人民既

须依法行事，故官吏行事固不能越出法律，人民的行为也不能违犯法律。这种守法的精神发挥到了极点，于是无论在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处处是大公无私，循规蹈矩。官吏既不能滥施权力，故人民亦无须畏惧官吏。官吏的进退升降既悉有序，下级官吏只要无失职违法之事，他们亦即无须趋奉其上峰。人才的选拔既不复依赖私人的援引，而社会各种事务又照章办理，则大家亦即无须钻营奔走，托人干求。人人可以节省许多精力，社会可以减少许多不平。法律原是经过审慎思虑而制订的。(所谓"法律不外人情"，指此而言，非谓法律以外另有人情。) 但是不仅法律的本身是理性的产物，而要服从法律遵守法律，尤须出之理性。惟有诉诸理性，社会始能在合法的轨道中循序渐进。

英人重视理性的另一结果是一切纠纷用理性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英国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合理的政治竞争的制度，用公开的方式，使政治上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他们合理的排泄的轨道；政见不同的各方面，不诉诸武力而诉诸人民的裁判：为人民所拥戴者，上台执政，实现其政策；不为人民所拥戴者，挂冠而去，以顺民意。英国历史上纯粹感情用事之事，除 1649 年之查利一世被弑外，几不多见；而用流血及武力来解决政治上之冲突者，亦较他国为独少。民主政治本就是一种理性政治。假如人民不善用其理性，他们不会选出好议员，假如议员不善用理性，他们不会组织成健全的国会，假如人民及议员都不能善用其理性，则国家不能产生好的首相及健全的内阁。在君主时代，只要有一个人（君主）开明讲理，也会政治清明，民安国治。但在民主时代，则非人人或大多数人能善用其理性不可，否则即难望有合理的上轨道的政治。伊丽莎白女王虽然在感情上敌视其大臣塞西尔爵士（Sir William Cecil)，但关于国家大事，

则又无不听从其计。维多利亚女王一生中，虽然憎恶某些大臣，但为了国家，竟不能不请他们出而为相；她和她的首相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但当她的抗议坚不为其首相所接受时，她也不勉强他接受，因为英王在宪法上的权利只止于商议与警告，而最后的决定，其权固操之于首相。爱德华八世既不愿有负其钟爱之女子，亦即惟有自动逊位，以解决因其婚姻问题而引起的宪政危机。近代英国的保守党所以能自存于民主的新世界中，实得力于狄士累利（Disraeli）的激励，狄氏尝变易了保守党的性质，“他要上等阶级诚实地接受国内已变的状况，要他们不再因特权的失却而坐在家中发气，要他们走入通衢大道，以爱国的热忱及帝国的利益来博得民众的归从。”英人爱称1688年的革命为“光荣革命”（The Glorius Revolution）者，即因不经流血、内战、屠杀、放逐或报复，即能变换一个朝代，并使多年不能解决的宗教的及政治的纠纷，竟得基于大众的同意而得到圆满的解决。而革命后的最初几月中，“托立”“辉格”（Tory，Whig）两党，亦无不平心气和，各自让步，各弃宿怨，竭诚合作，以度过当时外有法兰西之战，内有爱尔兰之失及苏格兰之分裂的危急存亡的局面。大至宫廷国事，小至民间纠纷，英人固无一不诉诸理性，以觅取最好最合理的解决。著者在英时曾目睹两车相撞，两车的车主很安静地下车检视自己的车身，远处的警察也走了过来，抄录汽车的照会号码，肇事的双方都不出一句龃语，又各分头开车而去，静待一二日后警厅的传审。赖有英人这种理性的修养，英人社会始得和平安定，而各种事业亦得蒸蒸日上。

并世各国，论社会的公道，固无有逾于英国者，而公道（fair play）则纯为理性的产物。英人最好直道（love of

justice)，是非公私，分明清楚。有才有智有德之士，总有人颂扬他、爱戴他、鼓励他、酬劳他，而出卖公共利益的人，则必为众口所不容。所以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短气，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而且成功之人也无须中途引退，他可效忠国家，死而后已。而想作恶的人总不敢再稍存作恶之念。英人之公道固不只止于有是非，英人的公道精神的最高表现在他们之能容忍异己，尊重对方。赖有这种精神，英人才能保持他们千百年来的种种政治的及公民的自由；赖有这种精神，在政治上才能完成两党制度，在社会上才能和衷共济，融融洽洽。为英人所最喜爱的拳击 (boxing)，在以力胜之中固带有以德胜的原则，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无不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胜者败者亦恒能于比赛毕事后握手互敬。1833 年国会通过“奴隶解放法案”(Ac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废止各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时，且自动以 2000 万英镑之巨款津贴奴主，以弥补其放奴的损失。在当时为英人天字第一号敌人之拿破仑，被英人拘于厄尔巴岛(Elbe)时，竟有成千成万的英人在伦敦示威，抗议以这样一种待遇加之一个赫赫一世的大英雄，以致百日之战后，英人重将拿翁困居于圣赫伦岛 (St. Helena) 时，竟不得不保守秘密而不敢重为人民所知。蒙哥马利将军在战地公开对德国隆美尔将军及伦斯德特将军表示倾服，他盛称伦斯德特的知兵善将，甚至说：“我常常想，假如我能够置身在伦斯德特将军头脑中一两分钟，我也将引为终生幸事。”尼赫鲁有一本著作，大不利于英国，然英国的出版家仍为之出版，英政府亦未加以何种干涉。近两三百年来，英国政府在其外交殖民政策中，殊不乏有失自尊的行为，但是也只有英人有不直自己的政府而为被欺侮的人民申冤的雅度。这种公道的精神，实为人类生活中

可以大书一笔之事。这样一个社会必然充满了友爱、融和、直道及光明，而一切霸道邪道曲道都在正道的氛围中不易抬头。

回观中国，中国人非无理性，但中国人的理性，至少在今日是如此，大都仅见之于文字及辞令之中，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理性的痕迹极其微弱。有一个高级党政的负责人曾亲对著者说，人世间有三件事没有理性，其一为恋爱，其二为宗教，其三为政治。这种从事政治而可以不讲理性的论调，至少可以代表目前中国一部分人的作风。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实以强力为核心。我们即使不能说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是建筑于人民出于衷心的支持以上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中国，当政者若无足够的武力，其政权必不易稳定存在，依赖强力而不依赖理性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之间，及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社会上实到处皆是。一般说来，兵士对于老百姓的态度总是很强横的。他打了老百姓，他还要傲然说："打了你又怎么样？"我们在邮局寄信、银行取款、车站买票、海关报单，去衙门接洽公事，在水陆码头受军警的检查……我们除默默地忍受他们的蔑视、没有礼貌、欺侮、侮辱，甚至虐待外，我们竟无法可想。因为普通的无告的人民之无法对抗他们，其理由正如一个单身汉之不能同时抵御10人或12人同样简单。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冲突也悉凭彼此势力的大小，所以在中国，军人及军队到处都是有势有力。中国内战之多，实开现代国家之最高纪录，而真正的"政党政治"在最近将来的中国也似乎很少希望。无能力使用刀剑以解决冲突者，至少也必拍桌大骂；受过高等教育的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在冲突中所表现的解决冲突的态度，殆无太大的不同。

中国人不以理性而以感情驾驭一切的另一个现象即为好讲

私情。英人的社会以法为中心，中国人的社会以人为中心，大如国家的制度，常常以一人为转移，小至买一张车票，也视有无人事关系而决定买到之先后或有无。中国实是一个人情的社会，无论大事小事，若有人的关系，总会得到或多或少的方便，所以即使是一封八行或一张名片，在中国社会上无不有它的效用。在中国，既无事不讲人事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些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奔走、趋奉上用工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分内的事务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一般说来，顾私总不免要损公，所以我们的社会遂到处充满着不合理不合法和不公正；一个不合理不合法不公正的社会，自然是一个不健全的病态的社会。

人人重私的结果是社会无是非，无公道。利害已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判别是非的重大出发点；是非而跟着利害走，则所谓是非者亦早就不是真是非。在中国社会上，越是有才气的人，越容易见忌招祸；事业越成功，所受的灾难风险越大，有时竟会使生命的安全也将因事业的发展而终至不保。至于尊重异己的雅度，在中国更缺乏，一个重私情重利害而缺乏理性的人，焉能希望他能容纳与他相反的敌人！中国社会从不积极鼓励人继续向善，所以我们民间乃有“功成身退”、“得意不宜再往”一类的戒条，而事实亦恒能证明这些戒条不失为金玉之言。中国人未必都无良知，但有良心的人也殊不易不敢或不愿出头说话，因为不法之徒总不免要互相勾结以作恶，而政府及一般社会都不能给主张公道的规矩人物以有效的保障，所以规矩人只得独善其身，不能出而领导发生一种正论的作用，而道义也就日见湮没而不复申昌。苏三起解中那个解子的几句开场白：

我说我公道，
你说你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有天知道。

很可代表中国社会上的公道观。无是非无公道的社会必是一个黑暗的混沌的退步的社会，所以我们的人心总是不能振奋，而我们的国家社会遂亦总是停滞而不能前进。

五

“政治”在中英两国社会上的重要性，也是两国社会风气的另一个不同之点。在英人心目中，“政治”是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政治”是主要的，抑且为惟一的。因为“政治”在英人心目中不是惟一的，所以人民的努力是多方面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平均发展的社会自然要比畸形发展的社会来得健全。议员及政治家在英国只是一种职业——这句话有两层解释：一指议员及政治家在英国只是许多职业中的一种职业，另一指议员及政治家在英国只是一种职业而非一种权势。就前一层言，在英国，并非每一父母都希望他的孩子从政，英国的青年也并不认从政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他们活动努力的范围极其广阔，殖民、探险、武功、文学、艺术、科学、工业等等各方面，都有年轻人辽阔的前程。假如晋封爵位在英国就算代表一种事业上或学问上的成功的话，则固人人都

有获取爵位的希望，初不问其是士是农或是工商。就后一层言，从事政治的目的也无非是替国家出汗出力，而非为一己谋权谋势。除了法律所许可者外，一个官吏固不能有更多的权力，而当他卸除职务后，他亦即退而与众民无异。中国的情形异是。在中国，官吏与庶民之间总不免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官吏将随处受人迎奉，并发现自己的言语有许多重量与权威。在中国，惟有取得了政治地位才算是真有了地位，政治地位以外的社会地位，终不为众民所接受。不仅如此，在中国，一个人若无政治地位或政治关系，他且不易从事其他事业；没有政治关系而欲从事事业，常会遭遇不可想象的困难。政治在中国既有这样的威力，焉得使人不思与政治结缘？中国早有"学而优则仕"之言，读书人自己固视从政为他当然的出路，一般社会亦抱同一的看法。而且"天下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成为了四民之首，这不啻间接承认，"仕"是中国社会中最高的职业。社会上的传统观念既是如此，其结果：一方面向政界钻营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政治也就终于不免因此趋于混乱；另一方面则人才都集中于政界，在全国各种职业的分布上便失去了平衡，以致社会的各方面不能平均发展。今日中国生产技术及生产组织的不能日新又新，就是全国人才不能平均分配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不仅是一般人民重视"政治"，即执政的人，在他们的施政中，也总特别重视"政治"——我们并可以说他们惟一重视的就是"政治"。多年以来，国人对于"自由"的意见，常彼此格格不入。有一部分人认为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之多，在并世各国间几无其匹；另一部分人又以为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远较欧美各国人民所享有者为少。著者山居之余，辄思及此一问题，感觉两说均有非是。因为这种说多说少的论点，

实嫌笼统含糊，难获正确的结论。“自由”只是一个总称，其内容尚可别为种种不同的“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自由、职业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著者常思对此问题作一比较科学的答案，因将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大别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两类，而其结论则认为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政治的自由”太少，而享有的“社会的自由”太多。著者之作此结论，固非徒凭空想，我们实可举出许多实例以明此说。以言人身自由，许多违法作恶杀人越货的恶棍盗匪，常得逍遥法外，（各地常有招抚收编土匪之事，其实就法律而论，土匪犯案累累，早已一死不足抵偿其罪。）而在思想上稍为前进一点的人，其生命常不能得到合法的保障。以言言论自由，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人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以言信仰自由，则信仰种种荒诞不稽的教义，决无人加以阻止，所以民间还是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这一切反现代的费钱费力的迷信行为，可以行之如素，一如在100年前一样。但一个人的信仰若一涉及“政治的思想”，则他即将常受到注意或监视。以言职业自由，办学校、开书店、出刊物、发行报纸，均须受特殊的管制，因为这些职业都是传布思想的职业，至于一般与政治思想无关的职业，政府不甚干预，所以杀人的庸医仍得高枕无忧；贫穷无告的父母将其子女鬻卖为奴婢为娼妓，绝对自由；10岁左右的儿童挑了二三十斤的煤炭往来于官道之上，绝不受禁止；至于

人民之有职业无职业，自然更无人过问。以言集会结社的自由，则抽头聚赌、私家堂戏、结伙械斗、乡间香会、下级帮会，均不受真正严厉的限制，但政治性质的集会结社，即使明文不禁，实际上是不易自由举行的……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英国的情形正巧相反。在英国，结社和集会，无论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只要不违法，政府概不干涉。言论只要不妨害公共的利益及私人的利益，政府亦绝不限制；正如1940年7月26日，内相约翰·安特孙所颁布的备忘录中所述：“在我们这个国家内，凡属仅仅抱持一种意见的行为，决不能作为触犯刑网而受刑罚”。无论对政治理论、政治设施或政治人物陈述意见者，俱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因发表政见而犯罪者，是谓“意见罪”，在英国的法律里是没有“意见罪”的。但享有甚大的“政治的自由”的英人，却又未必享有甚大的“社会的自由”。买车票戏票，均须排队，不得抢先。在公共场所，吸烟者必须在指定的地方吸烟，不得逾越——在“地下车”及火车中，不得在No-Smoking车厢中吸烟；在公共汽车中，坐在下层的乘客不得吸烟；在公共建筑中，吸烟须入特定的吸烟室（Smoking-room）。政府对于戏院、旅馆、饭店、图书馆、博物院、桥梁等等公共建筑物的建筑，特别严格，用以保障公共的安全。在这次战争中，当敌机来袭时，人人均用黑绒或其他布料将窗子遮住，绝不许有光线外泄，致成敌机的目标，执行极为彻底。物价在政府的控制下，未生波动。有一个雪茄烟商店写信给丘吉尔首相，告以新到了一批雪茄，欢迎丘氏惠顾，丘氏告以他已储足法律所允许购储之数，假如再购，即变成囤积而触犯法律。丘氏70岁寿辰，英国粮食部通知丘氏，谓丘氏以后所用茶叶，

每周可以增购一两，因照定量分配法规定，70 岁以上之高龄人民，每周得多购茶叶一两。就是英王英后每周的牛油及糖等的定量，亦与庶民无异。言论固然自由，但不得损害私人之名誉及其权益，法律对于此点限制极严。人民虽有选择职业之自由，但行使此项自由时，不得违反国家所以承认人民此项自由之目的。故一切违反“优性发展”的原则的职业如终身奴工或短期奴工等，均在取缔之列，国家并对于最高工作时间、最低工资以及童工女工等，均有法律明文规定，人民不得私自签订有违国定标准之各种工作契约。……英人享有的社会自由，有些是由政府以法律限制的，有些则不是；但即使不由政府以法律限制，至少政府中人能以身作则，倡行于上，故能全国景从，蔚为风气。英人认为：人民若无政治的自由，则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则国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时国家亦即不能发挥其潜在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人民的社会的自由若不限制，则一部分人行使无限制的自由，势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伤失其自由，故在英国，人民所享的自由，应大者大之，应小者小之；和中国的情形一比，这个对照是相当强烈的。

六

就“政治”的本身论，中英两国也有极大的不同。从制度上论中英两国的政治，固可作许多不同的比较，但著者论中英两国政治的不同，不欲从制度上着眼，而仍愿从性格上及传统上研究两国执政者的心理及作风，而他觉得：人民在两国执政

者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大大不同。近代英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建筑于人民的同意之上的，人心的向背成为政府能否在位的惟一的决定因素。中国执政者固无一不希望得到人心的归附，但在实际上，政府的政权稳固与否，常常看它所拥有的实力大小而定，至少我们可以承认，人民的爱戴与否不能成为政府在位与否的决定力量。自表面观之，这似乎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则仍为一个性格上及传统上的问题。英国任何一个政府，如其倒行逆施，违背民意，他固将不容于人民而被迫去职，但从反面看，如若英国人民在一个失治的政府之下，不能真正起而反抗，起而作一种有力量有实效的反抗，则那个政府也许真会因人民对他无如之何而恋栈不去。但是一部英国的宪政史告诉人们，凡是遇着这样一种情形，人民固未有不起而作广大的反抗者，他们可在各方面（如拒绝纳税等）反抗政府，不一定仅在选票上始能表示其反对的意志。千百年来，英人即保有一种政治上的传统，即政府的职责乃在保障人民之自由、生命与财产，并使人民能获得更多更大之自由、财富与快乐。英人的政治传统既是如此，所以执政者上台以后，他们总是兢兢业业，尊重人民的意见，并思如何造福于人民。英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大事都是政府顺从民意的结果：1846 年谷物法（Corn Law）的取消是人民多年反对的结果；1832、1867、1884、1918、1928 年等次的选举改革法，也是出于人民多年的要求；在拿破仑战争中因国库窘急而为庇特（pitt）所创于 1798 年实行的所得税，当战争结束之后，全国城乡各处的公民，纷纷上书国会，请求废止征收，政府在群情激愤之余，不得不于 1816 年加以废止——历史家称此为“民众得以左右政策的首次”，虽然不幸从今日看来这是一次错误的行为；华尔坡尔（Walpole）虽然倾向

和平，但终不得不顺从民意而与西班牙作战（贞琴兹的耳之战），他的拔刀虽然勉强而竟不得不拔；作战失利的人也常因民众的公愤而不得不加以应得的处决，1757年英政府之枪决先一年失守米诺卡（Minorca）的海军大将约翰丙（John Byng）即为最好的例子。在英国，政府有似一个气压针，人民对于国事的反应，它都能记录无爽。判麦斯吞任外相时，他常以为他自己对于舆论所负之责多，对君主所负之责少，即对其同僚所负之责，也不及对其人民所负之责大。人民的意见都如此重视，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然更受重视。在英国，法律的目的即在保障人民之自由与权利；保护大多数人民的合法权利而限制少数人的不法的专擅的权力。英国之所以只有一种通常法者，即因法律的目的既无非保障人民，则通常法固已胜任而无须另立他法。英国之所以不若法国之有行政法及行政法院者，即因法律之目的在保障一般人民，官吏亦为人民之一部分，官吏与人民并无特殊分别，故官吏与人民受治于同一法律及同一法院。英国的法律既在保障大多数人民而限制少数分子的不法的专擅的权力，故在政治上握有权力的人，常即成为法律所限制的对象，因为他们既权力在握，惟恐其行使权力时超乎法律以外，因为他们若滥用权力，势必侵及人民的合法的自由权利。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英人因詹姆士二世之蹂躏法律而逐之去位，故当时英人的行动亦可谓一种护法的行动。在18世纪大法学家布拉克斯吞（Blackstone）时代的英国，法律对于统治者的权力，限制极严，“公民所可得的保障既多而又有力，政府绝对不能奈何他”。在英国，从历史上看，常常是人民要求政府守法而非政府要求人民守法，这一点至可注意。人民的意见、自由、权利都如此受到尊重，人民的生命之被国家保护，自无待论，故1819

年发生于曼彻斯特的屠杀案(Manchester Massacre),死者仅12人,已为英国历史上少有的惨案,当时"不仅激烈派及工人愤激异常,即安居乡宅的士绅及高坐华厅的商人亦为这残杀同胞的暴行所震惊"。将上述种种和今日中国的情形一加比较,当非绝无意义之事;但这种比较固不须依赖任何理论,只须依赖事实,而事实则固一一呈现于吾人目前或记忆之中,故此种比较,读者可自行为之。

"民意""民权",虽为著者所关切的问题,但终非著者在本节中所欲主要申论的问题。著者在本节中所欲主要申论者,乃为喀来尔(Carlyle)所称之"人民状况问题"。从这一点,实最可看出中英两国政府作风上的基本不同。喀来尔尝称"人民状况问题"为英国内阁及国会的主要问题,英国的执政者总是心中念念不忘如何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使之日近康乐富强之境。"人民状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需要实实在在的解决,非空洞好听的辞令所能改善。所以英国的执政者对于人民各种日常生活总能切切实实加以注意而作尽心尽力的改善。在英国,整个的19世纪可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改进时期。威伯福士、克拉克孙(Wiberforce,Clarkson)等人所领导的禁奴运动,18世纪即已取得全国的响应,而"禁止奴隶贸易法案"(Act for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s)亦终得于1807年通过,20余年后(1833年)复有"解放奴隶法案"之通过,使帝国境内之奴隶,一律得到解放。在1833年及1847年,先后颁布两次工厂法(Factory Bill),规定工人工作的时间:前者规定9岁以下之孩童不得雇佣,女工及不满18岁之男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后者规定18岁以下之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8小时。1875年复有工人住宅

法（The Artisans' Dwelling Act）以改善工人的卫生，其后又实行注册工人（Registered worker）之制，以减低工人失业之威胁。贫民的救济远在1601年即有贫民救济法（The Poor Law），1834年复有贫民救济新法（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救贫经费年达860万英镑之巨。公共卫生则有1848年及1875年先后颁布的公共卫生法，与疾病宣战而抵抗因贫穷而引起的灾难。自1870年初等教育法（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通过后，教育遂大大地普及于全国，"它给贫民区域中无数失养的儿童以一种训练及纪律，它也发动了此后半世纪中伟大的教育进步"。而1902年的教育法通过后，英国的国民教育益臻发达。新世纪的最初10年中，国会所制订的关于改善社会生活的法案有养老年金法、矿工8小时法、儿童身体检验法、儿童法、都市设计法、小工业法、失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小管业法等。在英国，无论是保守党、自由党、或是工党，固无一不以人民的状况为念，他们上台后，总是念兹在兹的对于人民的生活谋种种改善。重行的英人改善社会生活固不以仅见之于文字为满足，他们确能实事求是，使全国人民的生活真能改善。举例言之，当1833年工厂法颁布后，政府且派有视察员分赴工厂监督执行，而督察员亦确能克尽厥责。在这次战争中，英国政府一面从事战争，一面仍未忘情于人民生活的实际问题，国会除已先后通过了"教育法案"及"城乡设计法案"等法案外，报载尚有"国家健康服务法案"、"社会保险法案"、"工业损害保险法案"等法案在待审之中。抽象的政治原则之争在今日英国已成过去，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则越来越受执政者更大更切实的注意；无论保守党或工党，都接受这同一的趋势。著者希望读者能大大注意这一点，即英国的执政者实最懂得民富即国富

的道理，知之并力行之。除上述内政上的措置外，在外交及殖民方面，尤为明显。前述爱好和平的华尔坡尔首相在人民基于自由贸易的要求所引起的举国若狂的感情之下，不得不和西班牙从事战争一事，即足以说明英国政府总是用外交或武力来保护人民的海外经商。在近 300 年来，不论哪一党执政，这个基本政策总是不变的。人民因国家之保护而得在海外自由经商，因自由经商而成巨富；从表面看，赚钱的是人民，赔钱的是政府，但一究实际，人民不富，国焉能富？人民没有康乐，国家焉能繁荣？所以英国的执政者总是心心念念，无论内政外交，总以使人民康乐富强为最高目标。

在中国，我们即使不能说人民在执政者心目中毫无地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执政的人对于“人民状况问题”，不是不知如何着手，即是不能全神贯注。几乎没有例外，执政的人上台后，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尽先利用执政期间所特有的种种优越，放肆地扩充其权力或巩固其政权。凡是一切足以加强其“政治控制”的，皆不惜耗费巨大的金钱及动员众多的人力。但不幸“政治控制”既无边际又无尽期，以致“人民状况问题”永远无法占有它应占有的重要地位。平心言之，假如多年以来，政府能将它在“政治控制”上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用之于人民生活之改善，以它对于“政治控制”那副全神贯注的精神来作种种社会的改善，则今日人民所受的痛苦至少可以大大减低其痛苦的程度，社会也不致仍旧那样停滞不前进。自从清末变法图强以来，前后忽忽垂 50 年，而人民的状况依然如故。我们实未见到一般人民的健康情形及卫生知识有何长足的改进，保健事业毫不发达，公共卫生的设施几乎等于零；民间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国民平均寿命在下跌的趋向中；一般人民饮食的材料及

方法也还是与一世纪前无所分别；建筑房屋对于日光及空气的观念依然墨守成法；优生的理论仅见之于一二学者教授的论著之中，政府对于国民体格的品质问题似乎从不发生任何兴趣；老弱残废仍得不到国家的救恤，乞丐仍到处都有；无论城市乡镇，房屋的建筑依然不合市政的原则，街道湫狭，火巷很少，没有隙地；土地制度未见作合理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及工具一仍其旧；宴会的方式仍是费钱费时而又浪费物力，但始终缺少革命性的改革；旅馆及澡堂里的陋习，迄未禁绝；报纸在数量上略有增加，但在公民教育及道德的效果上，贡献仍少；交通除军事的及政治的以外，纯粹属于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道路，甚少改善，无论城乡，一经下雨，无不泥浆四溅，民间的交通工具还是原始的轿子、板车及小木船；民众教育困于经费及人才，仅有其表，而无真正的效果；人民的娱乐方法及内容无新的充实；种种迷信仍流行于民间；匪、盗、窃贼仍遍地如毛，人民于完纳各种赋税后，无论旅行家居，仍未能获得合法的应有的安全保障；一般人民的道德观念及自尊心越来越淡薄，其发生的影响似乎从来不为执政者所关怀。……凡上所述，俱极琐碎，但最琐碎的常常是最有关人民日常生活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对于人民实行较抽象的主义对于人民为更实在，更迫切。近二三十年来，中国人民中的一小部分有资产的知识阶级，他们的生活，至少在物质方面，确大见改变。这个改变当然是一种舒适的、丰富的，并是现代的改变。但为国脉所寄的大多数老百姓，他们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与一世纪前相比较，固一无改善的痕迹。郭嵩焘尝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

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氏曾将此意语李鸿章，然自曾国藩以后，解此语者已不多，更遑论行？重私利重虚文的执政的人们，只知扩充权力，铺张门面，而不知实实在在地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民既不裕，国焉能富？大多数人民的知识、能力，及生活不能改进，我们的社会焉能有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之望？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一般国民的生活力总是越来越贫困，而我们国家的国运也就越来越窘蹙。

七

盘旋于著者思潮中的中英国的片断的比较，至此为止。比较中的中英两国的民性及其作风，究竟孰佳孰不佳，读者可自行评判之。但吾人在此至少可以同意两点：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及社会风气确是不同；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中国为一弱国。此两点皆为事实，而著者认为后一事实与前一事实有大大的关系。然而造成民性及基于此种民性而形成的社会风气的原因究在何处？著者以为其中原因，归之于民族性者少，归之于教育训练者多。何以？盖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缺点劣点，实未尝悉见之于未受教育的农民。不仅知识分子之华而不实，农民之反能务实重行，有如前述，即为中国民族所有的许多美德，其已泰半绝响于城市都会的生活中者，反能在农村社会中世代相传保存勿替。吾人可以同意：今

日中国农村社会中的风俗要较城市都会中的风俗为敦厚朴实。乡村中的人们反较城市中的人们重信义、讲气节、崇公道。农民的心地亦较知识分子的心地为忠厚、笃实、单纯、洁净。由此可见，为今日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弱点，实非中国民族的固有的性格(natural character)；他们性格上的一般弱点，大都应归因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所接触的环境。

英人是崇奉思想自由的，这种崇奉自由的精神见之于学校为各种学问之自由研究，见之于社会为异己之容忍，见之于家庭则为父母对于子女的事业及恋爱只指导而不强迫。但是在思想上，英人虽极力崇奉自由的原则，不求思想之一致，但在为人的基本精神上，则英人固大体相同，有较为一致的传统。然而他们这种性格上的一致的传统，究得力于何处？著者以为英人性格上一致的训练，实大半应归功于他们的教育。在英国，教育的主要目的即在养成一个人的优良的性格(character)和优良的风度（taste)。英国的教育极重视品性的培养、意志的锻炼，以及对于诚实、可靠、服务、负责等等观念的养成。造成今日那种“英吉利典型”的性格的主要力量是：一、游戏，二、宗教，三、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所包含的种种传统（tradition)；三者相辅相成，途殊而归同。世人均承认英人性格之定型，大得力于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s)。在英国的公学或一般中学里，书本不是最主要的东西。在那儿，正如依赖公学一位校长所说：“运动占第一位，书本占第二位”。英人对于运动的观念不像希腊人那样以达到体格均匀的人体美即为满足，他们复进一步以为运动实为锻炼性格的最好的方法。游戏（game）的目的在争取胜利（成功)，但要达到胜利，必须能够合作；无论足球、赛舟或桥牌，活动的方式虽异，其须合作则无二致。英人生活中

有所谓 team work 者，即言全队队员（团体中的每一分子）均须融洽合作，以争取全队（团体）的胜利（成功）为最高目的；人人均应放弃其一己的得失而争取全体的得失。在这种需要全体合作的游戏中，人们开始认识何谓“坚定的友谊”，并发现这种“坚定的友谊”乃为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游戏的目的虽在争取胜利，但所争取的胜利必须是一种荣誉的胜利；甚至即使是失败，必须是一种荣誉的失败。所以我们实大可说：在英国，游戏的目的虽在争取胜利，但胜利或失败只是游戏的结果，而非游戏的精神，游戏的精神乃在保持一种崇高的荣誉，而荣誉则从正直中产生。英人所谓 fair play，to play fair，即言交易公平或举止公正（just and upright）之意，若英人以 it is not cricket 一语批评某人之某一行为，则该一行为必为一种卑鄙的、不诚实的，不受人尊敬的行为。在英国的公学里，殆无一不建有广大葱郁的运动场（playing field），运动场在英国教育上所占的地位，即使不超过教室及实验室而上之，至少亦与教室及实验室等。英人盖欲在运动场上培养国民的性格，造就领袖的人材。在英国的公学里，最能代表学校的精神的就是运动，最受人崇拜的英雄人物就是各种运动队的队长。一个运动队队长所应具备的特质就是公正、勇敢、有决断、能自持；公正、勇敢、决断、自持等能力，从运动中锻炼出来，从运动中表现出来。同时，运动队的队长亦必成为学校中的英雄人物，因为在英国，无论学校或社会，公正、勇敢、决断、自持就是成为一个领袖的主要条件。然而著者在此以数百字之篇幅叙述英国学校里的运动情形者，其意盖欲说明两点：第一，英人极重视品格的培养，第二，英人从实际的生活而不从抽象的理论培养青年的性格。（英国的教育，至少在中小学是如此，极力反

对过分的书本主义，所以即使在课程方面，他们也以实用为重。今日英国一些公学中，殆皆设有木工、印刷、装订、摄影以及各种金属制造等等实习课程，对于女生，则常施以烹饪、家政、洗衣等等的训练。至于设立在乡村中的学校，园艺殆为绝不可少的一门功课。）以空洞的理论为出发的品格训练，常有此耳入彼耳出的缺点，惟有从实生活从行动中锻炼出来的习惯，始能深入性格而成定型。同时，正因从运动及游戏中所训练出来的性格，能深刻永久而成定型，所以已成定型的性格，遂得表现于他的全部生命、生活及事业之中。当一个学生走出学校的校门而跨入社会参加公共生活时，他仍能发挥他在运动场上所保持的精神与原则。为本文前几节所述的英人种种特殊性格，殆大都和他们在运动场上所得的训练有关。

但若离开了宗教而言英国的教育，只了解了英国教育的一半。1870 年以前，教育在英国完全是一种私人的事业。1870 年以后，国家的手开始伸入教育事业的园地；但自 1870 年以迄现在，在英国，国家对于教育的管理，较之并世任何一国均为微弱。依照英人的思想，认为国家无力担负为教育事业中最主要的一个责任——培养青年道德的责任。英人将培养青年道德的责任交与教会而不交与国家。著者固为一个无宗教信仰之人，他对于基督教的教义也所知甚少，但他觉得基督教终不失为一种伟大的宗教。基督教之所以伟大，乃因这种宗教的目的在对人类的良知传出一种圣洁而恳挚的呼吁，使人们在物欲的生活中，因它（基督教）的启示而仍能时时清醒，不致完全湮没一个人的真正的灵性，即使离开教义，仅以教会的环境言，它也能唤起人们一种崇高的情绪。那歌德式（Gothic）的教堂建筑、那直入凌霄的塔尖、圣经所代表的第一流的文学、大风琴（organ）及

圣诗班（choir）所代表的高尚的音乐、教堂玻璃窗上的染色图画、橡木的雕刻、祭坛的陈设、牧师的道袍等等所代表的优美的艺术，以及礼拜时的那种庄严的仪式和肃穆的空气，使身处其中者，无一不在冥冥中得到一种神圣的启示，一种伟大的力量，而因此种神灵的启示和高尚的力量，使他得以抵抗物欲的诱惑，点醒自己的灵性，发生一种圣洁无比的感应。在英国，就是那些教堂及小礼拜堂，使英人在每一个星期内至少有一次机会检视自己的过失，洗刷自己的内心，并督促自己努力为善，要做一个伟大的（在人格上）人物。今日英人之怀有高度的自省能力及自省习惯，实悉受赐于宗教的熏陶。

抑有进者，英人对于性格的培养，家庭、学校、社会三者是一致的、连贯的、相互为用的。世人固言英人的性格完成于英国的公学及大学，实则英人性格的培养，已开始于家庭。罗素(Bertrand Russell)尝有大多数父母均无足够的能力教育他们的孩子之言（the average parents is not qualified to rear his own child），但就英国而论，我们若出以常人的标准言之，则英国一般父母对于教养子女的能力固较他国的父母为高，此盖由于身为英国公民之一的父母，即使他们并未受到任何高深的教育，但是至少他们对于卫生知识、公民道德、人生观念、做事精神、以及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种种常识、习惯及传统，其水准要较之他国为高。所以在这样一种“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所包含的种种传统”中生活教养的孩子，他在无形中即为种种传统所熏陶所育化。马达来加（Salvador de Madariaga）说，英人性格之造成固得力于英国之公学及大学，但其中若干基本的性格如坚忍不拔、始终不懈、与人合作（stability，continuity，cooperation）等，则为每一个家庭内所通有者；性格的典型实开始铸制于家庭，学校

就家庭所铸制的性格，再加锻炼，遂成定型。所以在英国，无论人们在思想上、事业上、兴趣上如何不同，但大多数人在做人做事以及一般生活上所具有的基本习惯是大体相同的。这种“英吉利典型”的性格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英国也是和谐一致的。灌输于学生的教育训练与社会上的实际生活并不脱节，为学校教育中所追求的、崇拜的、轻视的、厌恶的种种性格和行为，也正就是一般社会上所追求、崇拜、轻视及厌恶者 。正因学校与社会不脱节，所以凡具有种种优性的素质而能在学校中成为学生的领袖人物，当他跨入社会后，亦必能成为社会上一般人民的领袖。他在学校中所怀有的理想及长处，实际的社会亦容许他充分发挥，而不致使他感到失望与悲愤。经过优性的学校教育所育化出来的人物，跨入社会后，可以更充实社会的优性的程度。设若一个人在学校中未能完成其性格上的优性的熏陶，公共生活中的传统也能给以有益并有希望的弥补。这种公共生活中的传统乃是多年多人所共同缔造成功的，它成为了一般人生活行为的标准。在英国，王室固有王室的成训，贵族家庭也有贵族家庭的成训，但他们的特殊的成训较之一般社会的成训只有更高更严格而不会不及。英人之甘心于保持贵族制度，崇拜贵族，至少有一半的原因，亦因为英国的贵族确能保有一种高尚的心灵和高尚的人品，他们的言行举止确能为庶民的表率。贵族、宗教、舆论、传统，都是社会生活中指导一般人民的性格行为的有力的南针。英人经过家庭、学校、社会，三重不忽视性格的重要的生活，遂使英人永远保有种种传统的优性的性格。这些性格的内容即为生活严肃、工作认真、务实重行、不尚空谈、诚实可靠、勇敢、自持、坚韧、能严守本分、自我约束、习于自省、长于合作、不趋极端、不感

情用事、能遵守法律、判别是非、崇扬公道、容忍异己、有尊重他人的习惯、能重视公共的利益……这些基本的品格，在各阶层各事业各方面异途发挥，而同归于人人有自尊心、社会有公道、政治清明、国家安定而繁荣，而终成为今日之英国及今日之英国社会。

今日中国的情形正和英国相反：在思想上倾向管制，在性格上容忍放任。政府、社会、人民三者不仅容忍性格的放纵，且根本忽视性格的重要。罗素所发大多数父母均无资格教养其子女之论，对于中国实不失为最合适并最真实的批评。绝大多数的中国父母，未受教育，缺乏常识，他们难有能力给他们子女以适当的教养；大多数中国父母对于他们子女的教育，连健康教育都谈不上，更遑论品格教育！他们虽爱其子女而不知如何爱，他们只知投孩子之所好，给他各种不卫生的、不清洁的、不适宜不合时的小吃，满足他不合理的感情，养成他种种放纵而不知检点的性格，而不知对孩子给以正当而适度的管教和开导。绝大多数的中国父母实不知品性为何物，他们所带领出来的孩子，大都缺乏正常的品性、良好的习惯、文雅的礼貌、公正的观念，以及自治自省的能力。

然而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又远无余力足以补救这种家庭教育的缺陷，因为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自身正陷入于病态及不健全之中。多年以来，新教育的目的在中国为德、智、体三育的平均发展，但考之事实，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大都仅偏重知识一项。就大多数情形言之，最近数 10 年来的新教育，各级学校每周固都有体操课，都有或大或小的操场，每年并举行运动会。然如此即算提倡体育，固大足笑话。今日国人固大都不明生理原理，缺乏卫生常识，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知空气

与日光的价值，忽略营养的重要，缺乏摄生及保健的观念，对于遗传及优生毫无所知，……凡此种种，才是体育中真正主要的内容，而这正是提倡了数 10 年体育而犹未能认真触及的问题；这些问题，学校亦很少能切实地给青年正当并丰富的指导。至于品格，就表面言之，从前中小学都有修身，现在则有公民，中学大学并都设有训导部门。纪念周上讲的也无非是修身励志之言，但一究其实，这种教条式的训练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实际的效果，甚属疑问。中国学校里的训育大都是消极的、形式的、表面的；训育在中国几乎也成为了知识的一部分，而非道德的一部分。中国的训育，只训而不育，训育与实生活完全脱节，不能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自发地培养出一种优良的品格和风度。(有许多人认为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学校，单论品格的培养，较之普通国人办的学校为有成就。教会学校的学生比较普通学校的学生，生活有规律，讲话有礼貌，做事有效率，富于自治能力，能遵守公共秩序；教会学校能在实际生活中训练学生的行为，他们能造成一种空气，或一种环境，使学生生活在这种空气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感觉熏陶，养成习惯，造成一种定型的性格。)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校的绝大精力，都花费在知识的传授上。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完全偏重在知识一面，从小学到大学，入学考试都是以笔试（知识）为主，口试虽不能判别一个人的品性，但口试的原意，多多少少是在借此审查投考人的谈吐、条理及气息，然而在入学考试中，因口试而落第者，百不得一二。师资的选任亦悉以资格为主(资格是知识的形式)，而与人品无关，即使声名狼藉的人也一样能为人师；此与英国中小学延聘教员之以人的品格较之教书的能力尤为重要者，情形迥异。知识本不一定在书本里，也不完全在书本里，然而今日中国学校

中的知识传授，又类都成为了过分的书本主义。学校纯粹根据分数来判别一个学生的造就，同时又根据此种以分数为基础的学分与年限来决定一个学生的升级或毕业。这种形式下的知识传授，使所传授的知识有时只是些知识的渣滓。抑有进者，中国人的传授知识完全侧重于抽象的理论及不切实用的文字，前文所言今日中国士大夫阶级的那种好虚文而不务实重行，我们不能不说这种缺点实由于多年的科举制度而来。科举制度今虽废除而代以学校教育，但今日的学校教育与旧时的科举制度，形式虽变，而本质仍一：仍是用考试作文的方法以定人才的取舍。这种侧重于抽象的理论及浮华的文字的教育，使教育出来的人民好高而不务实。同时，这种只知知识传授而忽略品格陶冶的教育，使所传授的知识都失去了结实而健全的基础。就学问与品格言，品格为土地，而学问为建筑；没有品格的人去从政，他必违法乱法；没有品格的人去从军，他必强横霸道；给没有品格的人以知识，等于给蛇狼以牙爪。然而在今日的中国教育中，固极少人注意品格的重要。在中国学校里，一个最无抱负、最无才干、最无个性，从各方面看都是最平庸的人，常常被学校当局认为是最优秀最标准的学生，因为这种学生大都按时上课，预备考试，循规蹈矩，甚少过失。我们若出以公允，这种学生当然是良好的学生，但不是优秀的学生。考之过去，凡是学校中被评为模范的学生，一入社会，常常反都默默无闻，无甚造就。这个原因很简单，即学校以分数的多寡定学生的学业的造诣，以犯规的有无定学生的品性成绩，而对于学生的有否创造能力、分析头脑、调度才具、现代观念，以及说话是否有信义、做事有效率、为人有风度等等，不闻不问。在目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及教育传统中，著者疑惑：一个青年从小学到大学，他将

从什么地方得到各种合乎现代标准的为人做事的基本观念，并养成这种习惯？他将如何养成一种定型的观念：组织较散漫为优、正确较含糊为优、条理较紊乱为优，迅速较滞钝为优、以人为主不及以法为主、做事应力求合乎经济及效率（economy and efficiency）的原则，以及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生活观念，如适当的营养为一种必要而非为奢侈、休息为一种预防而非治疗……等？观念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即好或不好的标准），道德标准支配着一个人的行为，而行为则为一种性格的表现。要使一个人有正常的现代的性格，须使他先有一个正常的现代的头脑（观念），而观念则完全得之于后天的教育而非先天的遗传。然而在今日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有多少人在注意这个问题？能有多少人明白给学生以各种关于做人态度做事方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科学的训练，较之作 100 篇作文其价值高出万倍？举例言之，有一个英国教授，曾在北京大学讲中英教育观，曾举网球为例，说在英国，学生打网球，练习了几分钟后，即开始打 game，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有规律有组织有目标的游戏，较之散漫而无纪律并无目的的游戏为愉快而有意义。在中国，大多数学生打网球，不论是单人或双人，永远是练习（即不规则地随便打），而不打 game，他说这充分表现中国人缺乏一种在有组织里生活的习惯，并不习惯在一种行为中追求它应有的合理的结果（result）。在中国，有许多人认为游戏只是游戏，何必认真！但是据我们的经验，有多少学校里的体育的或非体育的教员，能注意这种情形，能在这种实际的生活中给予青年一种正常的为人的训练？再举一例：在著者去年夏秋两季几个月的逃难生活中，与他隔邻而住者，有大学教授及其孩子、大学生、中学毕业程度的机关职员、中学生、小学生。那位带着孩子的教

授及其受过高等教育的夫人，从不想到隔邻的人需要睡眠或工作，而听任其孩子无分日夜放肆他的感情大哭大叫；那个大学生则困于酷热不能成眠，天色黎明，即在床上大诵唐诗，那时他同室中人大都未醒；那个机关职员每晨一醒，必高声唱歌，直唱到洗好脸、漱好口、披好衣服出外他去，无一日不是如此；有一次有四五个中学生，又有一次有三个小学生，他们都从远处旅行来城，寄住著者邻室，无不闹到午夜以后，而天色甫明，又大唱大笑。这几种人在所受的教育程度上容有很大的距离，但他们之只顾自己而不顾到他人，则无二致。然而我们不妨自问：在我们所熟识的家庭及所知道的学校中，曾看见有多少为父母的及为教师的，在孩子及学生的生活中，能处处对他殷殷以不妨害他人为戒？告戒他须处处注意尊重他人，不应妨害他人的权利及自由？（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人从小时候起，即已养成了一种任性恣意而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著者引述这些例子，其意盖欲说明，今日中国的教育完全忽略了为教育事业中最最主要的一种责任——发展青年的道德的责任，陶冶青年的品格的责任。著者自己在一个造就师资的学校里耽误了五年，对于这种教育上的缺点，特别感觉敏锐。然而就是这种旧式的过时的教育，在中国仍旧年复一年地维持着。这种旧式的过时的教育完全形式化、机械化、书本化，这种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正如一架旧式的机器生产出来的货物一样，完全不合时代的需要。这种一切过了时的货物对于国家显然不能成为一种财富。这种不加改革的教育，可说完全是一种浪费。我们为了国家的未来的自由、幸福和荣誉，对于这种浪费的教育不得不出以呼吁和抗议。

前言英国除了家庭及学校都注意品格的培养外，还有一种公共的传统，也有极大的力量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的定型。这

种条件在中国是完全缺乏的。而且相反，英国社会上的公共传统，对于人民品格的影响是优性的，中国一般社会风气，对于人民品性则发生一种反优性的作用。中国的社会正像一股浊流，一个青年从学校跨入社会，几乎很少能够抗拒那股遍地泛滥的浊水。有许多青年在未入社会前，大都志行纯洁，并有高大的抱负，但一入社会，性格与志趣均起变化。这种变化的时间的骤缓和程度的深浅，自须视这个人原来的教育根基及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定，但无论如何，社会在无形中总多少在改变他、腐化他、侵蚀他原有的品德，使他在多年多种现实的刺激及打击下，产生一种新的适应这种黑暗社会的自然的生存能力。在最坏的情形之下，那些教育未能受好的人，一入社会，竟立刻同流合污，变本加厉。中国这种可怕的社会风气，同时威胁着优良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一个父母自身的道德水准下降时，他给子女的教育自然也随着下降。学校的团体力量虽较家庭为大，但若认为师道可以决定学风，则不免成为太理想的看法。学校并非离社会而孤立者，学校亦不能离社会而孤立，学生无论在身心哪一方面，并不能完全被包围在学校的墙围之内，教员对于学生的教诲，其力量实不敌一般社会所给予学生的影响。而且就教员本身论，教员的言行举止，有时亦常受政治上一般作风的影响。然而我们在此正可回返本题，正因中国社会充满许多罪恶的势力，故在家庭及学校的两个阶段中，对于青年的健全的优良的性格的培养，越见重要，因为惟有有了成熟了的优良的品格，当他跨入社会后，始能抗拒社会种种龌龊的狂澜，始能在求适应中始终坚持内心的方正。一个社会的进步须历时甚久而进行迂缓，我们依赖这种量小而质强的优性性格，在缓慢的时间中，或能渐渐地改变我们社会上各种公共生活中的缺点

和风气。

著者对于教育问题缺乏讨论的兴趣，然而我们既在讨论国家的前途，我们自不得不纵论到为国家生活中最基本的这一个建人的部分。著者既认为今日一般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大都应归因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故他相信经过了合理的改革的教育，仍有希望改造中国人民的性格，而使之合乎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的需要。我们诚以今日中国社会上令人鼓舞欣慰之事常少于令人悲愤失望之事为撼，但我们既为中国之公民，单单失望悲愤，固无补于实益。这种性格上的改造或须超过半个世纪以上，始能渐见成效，但只要确在进步，亦即不能嫌怨其迂缓。我们固希望有一个富强繁荣康乐的中国，但一个富强繁荣康乐的中国固不能得之于幻想，而须出之于中国人民的实事求是的努力。惟有一个务实重行，能辨别是非、主张公道、急公忘私的人民，才能造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亦才配有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只空谈而不行，任何事业都不会建树起来的；只知一己而不知合作，公共生活是不会持久的；只诉诸感情而不诉诸理性，社会是不会合理的；只知“政治”而不知其他，社会是不会平均发展的；只知扩张一人、一派、一党的势力，而不知普遍地改进人民的生活的、知识的、道德的水准，国家社会是不会进步繁荣、生气勃勃的。一个进步的现代的中国固常为著者所追求者，而他之所以于叙述他所知之英国以后，复写此文一述他心中的感触者，盖他实亦希望他的感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思，因而或能慨然兴起稍挽我们目前的颓风于万一。

1945 年春　湖南溆浦

（选自《英人法人中国人》，1948 年观察版）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

1946年元月，我们一些朋友在渝创议发刊《观察》，以人民身份，论议国事，期对国家，有所刍献。经过8个月的筹备，于同年9月1日，在沪创刊。其后历经为公众知悉或不知悉的艰辛颠困，于1948年12月24日出至第5卷第18期时，终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刊物被封，同人被捕，资财损失，社务解体。上海解放以后，在各方的鼓励指导之下，本刊决定复刊，现自11月1日起，继续出版；并为顾到各种实际情形，暂时改为半月出版一期。在本刊停刊的10个月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空前的伟大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为人民多年切恨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之下，终被击垮，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革命中，社会上的一切都跟着时代向前发展。复刊后的《观察》从解放前的《观察》中发展来，成为一个新的《观察》。我们谨于复刊之初，一述我们在这个时代洪流中的新的转变，以及今后的工作方针，借求全国读者的指正。

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

我们创议发刊《观察》，正在日寇投降之后，旧政协召开之日。蒋介石窃国当权，前后垂20年，20年专政的结果，民生日敝，国运日蹙。日寇既告战败，正是中国翻身的千载良机；毛主席赴渝商谈，尤为国运黯淡中最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筹出《观察》，是想稍尽人民责任，加强民主力量，督促国家建设。无如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忧国之士，目击这种腐败黑暗的反动统治，迫于义愤，誓难缄默。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们始终以人民的身份，一本正义，满怀热情，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对统治，痛加抨击，坚决斗争，即使特务环伺，刀枪当前，亦仍言所欲言，一往直前。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 。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

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解放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和我们过去所接触的、所了解的、所追求的，在基本是完全不同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每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但是由于中国有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恩列斯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这样一个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武力——人民解放军的日益壮大，今天，武装的革命力量打垮了武装的反革命力量，把中国的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中解放了出来，使一切在怀疑中的、苦闷中的、徬徨中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正确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而中国的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是由中国共产党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次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帮助了所有的中国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重新来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我们现在大家得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我们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并进而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在各种实际工作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学习与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开始走第一步。在我们开始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去解剖揭发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致我们在客观上不知不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我们的确是具有一腔热忱，愿意献出我们所有的生命与智慧为人民服务，但这几年来，我们并未和日益壮大的人民力量联系起来，只孤立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因之这些工作，便都不免流于自流，不能建立有组织性的群众基础。……这一切，在今天，我们应该勇敢地毫无保留地给自己以无情的批评。有些朋友认为在过去的那种环境中，我们只能够做到那样程度；朋友们用环境的困难来原谅我们或者慰励我们的这种好意，我们是感激的，但我们自己不愿用“环境”来掩饰、来辩护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缺点，因为造成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所表现的缺点的，基本的原因不是环境上的困难，

而是我们思想上的落后。

现在，我们大家找到了新的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介绍了马列主义这一普遍真理。马列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者呆板的条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实际的具体的工作里去。在中国，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的伟大的领袖，他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历史革命中，把革命理论和具体实践结合了起来。他是中国人民的灯塔，他是中国人民的舵手。他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渡到光明，从旧的社会走进新的社会。我们应当在他的伟大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们还愿在此更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中国的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4.75亿中国人在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的封建的统治，我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看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即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毛主席及中共许多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者还想在中

国觅求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今天中国的人民，都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克勤克俭、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将在这样一个新的认识下，站在文化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努力。

二、工 作 任 务

《观察》过去发行了两年半，它的最高发行数是10.5万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湾航空版)。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刊物复刊的主要意义不是在延续它过去的纪录，而是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分担一部分工作任务。复刊后的《观察》的工作任务，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先说对读者的部分。《观察》过去的读者，就数量上说，假定每份平均以10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100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的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地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在这样广阔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算的读者群众中，在解放以前，在思想上，已经有一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读者，他们早就跑在我们前面了；解放以后，这种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的读者，在数量上更加多了，但

是我们相信，在广大的地域、广大的群众中，像我们自己这样在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有一种要求进步的意愿，决心努力学习、加紧改造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很多的。今天政府的政策，除了对那些少数的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以外，对于广大的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中的人民群众，都是要照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知识上、工作上、生活上，各人的情况彼此不一，因之这种照顾的工作，也就必须要有很多的人在一个总的方向和不同的方式下，来分工负担。在我们这方面，本刊应当特别照顾的，就是那些和我们自己情况相近，即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具有要求进步的意愿的广大读者群众。在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学习；在我们自己力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进步。互相勉励，互相教育，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使大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提高。

对于那些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学生读者，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最大的最热烈的敬意。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惭愧的，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国家毕竟进步了，我们又为国家的前途和光明而庆慰。对于这批进步的读者，我们一方面敬重他们，愿意跟在他们后面学习，一方面我们还诚恳地希望他们继续鼓励和帮助我们，帮助这个刊物以及这个刊物所带领的读者，是他们的一种工作，一种责任。由于今天中国社会上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很普遍，前进青年在和旧社会的斗争中可能还会遭遇到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保证我们一定热情地支持这批前进青年，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坚定他们的信心。同时，在知识上，我们也将就力之所及，不断地继续供

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有时工作和文化不能并顾的缺憾。

其次说我们的任务中对政府的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在基本上已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全面的建设工作即将开始。我们应当多方面多地域地联系一切进步的学者、专家、工程师、对于主办生产事业有实际经验的人，以及目前正在主持实际生产事业的人，根据他们过去10年20年30年以上的研究生活，根据他们过去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即将来到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撰写专文，提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计划、方案、报告，以供社会讨论，以供政府参考，使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进行，尽可能更完美、更迅速。此外，我们应当介绍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的各种事务中所反映的意见，使政府得到更多的机会了解民间的意见以及他们在工作中及生活中所存在着的种种困难。对于各级政府有违反政策或有所偏向的行为，本刊亦应根据具体事实，提出积极性的批评，帮助政府推行建国的工作。本刊并将站在舆论的立场，协助人民监察机关，监督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忠实执行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及一切决议。

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

本刊过去编制上的特点是综合性，分栏选材，力求多样，借以照顾到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本刊今后的编制仍拟维持这一个原则，务使每期内容，不致流于单调。从本卷起，我们决定增设社论一栏，陈述本社同人对于半月中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

的意见。“专论”栏包括马列主义理论的介绍研究，思想改造的讨论，以及对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各种问题的论述。一个建议而附有具体的计划或方案者，列入“建议与方案”栏；这栏是新增的，但这栏的稿件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又新增了“报告”一栏，包括工作报告、学习报告、调查报告及参观报告等，目的是希望各方面把实际的工作经验、学习经验或调查参观所得，提供出来，彼此交流。又新增了“介绍与翻译”一栏，希望对苏联及东欧各人民共和国多做一点介绍工作。特别是对于我们伟大的先进的友邦苏联，无论在政治理论上、科学技术上、建设经验上，我们以后必须对他们多学习，多了解，所以对于苏联的介绍，更为切要。“观察通信”仍旧保存，不过内容上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的通信大都是暴露性的、批判性的，今后的通信应该是积极性的、鼓舞性的。只要我们能深入群众、联系群众，通信的题材应当是比过去更为广大的。国外通信需要时间联系，一时不可能多刊国外的通信，我们当逐渐地努力去建立我们的国外通信网。“人物及事业”一栏，侧重介绍战斗、生产、劳动、妇女各方面的代表性的英雄人物，并介绍有利于人民的各方面的有全国规模性的各种生产事业。我们打算把过去的“读者投书”一栏改为“读者讨论”栏，供给读者讨论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或其他关涉国家各种事务的片断的建设性的意见。关于这一栏，我们当在下一期或下二期再作比较详细的说明。本刊过去有一个时期曾按期刊载一页“观察漫画”，后因篇幅缩减，未能继续，现在决定恢复。本刊过去又有一栏“观察文摘”，摘刊刊载于全国各地报刊上的重要文字，使本刊的读者阅读本刊时，能同时阅读到散布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的有价值的文章。我们决定继续保持这一栏。

以上是本刊编制的一个轮廓，在实际编辑中可能还要有一点灵活的变通。这些栏目我们究能做到多少，一方面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看各地作者读者能给我们多少帮助。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向这样一个目标去进行我们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在我们编辑部的内部，各种编辑工作都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希望在这样一种工作态度下，能减少或减轻我们所可能发生的错误。这种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希望能够同样应用到我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上，对于文章的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我们的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我们顺便在这儿说明，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后处理稿件的时间，包括用舍的决定及稿费的致送，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这点请求作者原谅。最后，我们还希望更进一步把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广泛地扩大到本刊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希望读者一方面踊跃惠稿，一方面能对本刊的内容经常提供意见。意见从读者群间提出来，到达编辑部，经过编辑部的讨论研究，再传达到作者群间，最后，把反映了读者意见和接纳了读者的意见的刊物，仍旧送达到读者之前，使这个刊物能成为读者、作者、编者三方面努力合作的一个结晶。

此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将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时时接受群众的意见，时时检查自己的缺点和可能发生的错误。我们将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在最大的努力下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深知在我们的工作中是存在着许多困难的。掌握问题能不能正确？稿件来源有没有把握？业务收入够不够自给？这一切困难都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应付困难的惟一道路，是面向困难，提高耐心，在一点一点克服困难的

过程中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广大的读者们！我们从我们的心底里发出一股凝紧而热烈的感情，在这儿遥遥地向你们招手，呼唤。我们很坦白率真地向你们陈述，复刊后的《观察》，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十分软弱的。但是我们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意愿却是坚定的。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希望我们大家结合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提高。我们也希望一切先进的朋友带领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国家的工作，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进步，也就是帮助我们的国家进步。

1949 年 10 月 16 日

（原载《观察》第 6 卷第 1 期，1949 年 11 月 1 日出版
本文是《观察》的复刊辞，发表时署名《本社同人》）

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

“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 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 6 个副主席中有 3 个党外人士，4 个副总理中有 2 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 12 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本文是储安平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据《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收入）

序跋·书信

《说谎者》自序

一

这是我的第一册小说集。

我最初是学习写散文的。但是我的年纪太轻，我的感情太浮，这使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葱郁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形惭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

我最初试写小说是在1931年春天。我在偶然的冲动下写了一篇《春瘟》。第2年（1932年）的春天，我又写了第2篇的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我对于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至1934这4年中，我断续地学着写，约摸也写了十二三篇小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

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

二

我写作的产量，薄弱到极点，这大约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的健康不允许我有多量的写作，我平时写了五六百字以后，我便感到疲倦。要是一天我能够写满 2000 字，这在我简直是一次自幸的收获。我想写一篇小说，常常须先经好几个月内心的酝酿；写成了以后，又需要一阵子很长的休息。

第二，我应该说老实话，我在写作的时候，实在从来没有一次有过一点为稿费而写作的动机过。我以为一个文艺作者，如其是为了要获得一笔稿费而去写作一篇作品，这不是一种艺术的态度，只是一次买卖的行为。所以，当我没有写作的冲动的时候，我就尽让我的砚台在灰尘里放肆，我的笔枝在纸堆里懒散。

三

我自问我自己对于文学丝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咒诅文学，但是我

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适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

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认真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我一点简短的口供。这个口供是卑微的，然而诸位先生请相信我，这一点卑微的口供却是真实的、恳切的。

四

这一个集子里的8篇，是从我在1931至1934这4年中仅有的十二三篇小说里选出来了的。前后的次序完全以我自己的爱好为标准，这8篇在写作上的前后，则有如下表：

春瘟（1931年春）
世纪与义务（1932年春）
断想（1933年春）
人世（1933年秋）
无名（1933年秋）
乌鸦与马粪（1933年冬）
原记（1933年冬至1934年秋）
说谎者（1934年冬）

五

最后，我得感谢家璧，这一个集子的能够出版，全赖他殷勤的鼓励和督促。我又得感谢露西，这几年来她给予我的安慰，实在没有东西可以拿来衡量。我现在将这个集子献给她，并纪念我们婚前4年婚后2年——这6年来的不变的爱情。

安平 1936 年

《文学时代》编辑后记

一

我们原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由第一出版社出版。我们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的理由十分简单，无非想借此使自己在写作上加上一根鞭策的绳索。我们最初和第一出版社谈起这个想望，还是5月里的事情。当初两方都同意自7月起，开始出版。所以我们匆匆的在一个月之间编好了第一期，就是这一期。

但是后来，第一出版社因为他们自身另有计划，所以将本刊介绍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本也有出一个文艺刊物的意思，因此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细节上的磋商，函件往返，却延宕得极久，一直到10月初，才完全决定：创刊号11月10日出版。

本来打算在7月间出版的，一直到这11月才实现，这一个延荡的时间不算短。这一个出乎初料的耽搁，使我们对于关怀本刊的许多先生们，觉得无限不安。

二

这一期是本刊第 1 期。一个刊物在创刊的时候，照例得有一篇灿烂堂皇的发刊辞。可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一刊物的内容，就是一个刊物的一篇顶真切的宣言，我们并没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容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的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苛求。

我们这一个刊物规模很小，每期只有这么一点点字数。我们自己明白，我们的能力实在太薄，太脆弱。我们不愿意夸张，夸张的下场常常是难言的内恧。我们只愿意就仅有的这一点绵薄之力，小心谨慎地来作。我们这第一次大胆的尝试。

这一个薄薄的篇幅自然是十分寒伧的，但是我们并不觑觎这一个篇幅的单薄，我们只希望我们不要糟踏这刊物每一页的纸张。我们用顶严谨的态度和热烈的心情灌注在这一个刊物上，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点朴实的意思，能够获得海内外作者读者的赞许，使海内外作者读者的灵性能够和本刊打成一片。

三

我们已经说过，这一期还是在 5 月至 6 月的这一个月里编好的，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匆促的时间里编成一期，实在不能不感谢在这一期上写稿的十几位先生。我们去请张沅长先生写稿时，正是他顶忙的时候。他这一年应诺了美国北客罗林奈大学（Unlversity of North Caronna）之聘，担任英国文学的讲座。他那时一方面要结束国内学校的教务，一方面又要筹备出国的事情。我亲眼看见他为了写这篇文章，谢绝了一次宴会和两位朋友的拜访。他这好意我们实在感激。他在 7 月 16 日起程赴美，他答应到了美国后仍旧给我们写稿，我们希望他不要忘了他曾经遗下的诺言，当他收到这份刊物，知道它已经出版了的时候。

老舍先生平时在各刊物上都是写的创作，可是这次他却给了我们一篇论文，他这篇关于约瑟康拉得的介绍，原是他在中波文化协会第二届年会上提出的论文。因为我们去函向他索稿时，他正忙着披阅许多毕业论文；他答应以后再给本刊写创作。老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研究康拉得的专家，他这篇文章非常有价值。

令孺九姑她不仅允许常常给我们写稿，并且在精神上曾给予我们至大的鼓励。她本来打算给第一期写一篇创作，后来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临时改译了这篇《在一个远远的世界里》。她现在正在日本旅行，我们希望她在旅行回来以后 ，对于本刊能有更大的赠馈。

张天翼先生的《中秋》，也是在几天里给我们赶起来的。陈铨先生惟恐赶不上我们发稿的日期，特地用航空快信将他这篇《政变》从北平给我们。孙毓棠先生的这首长诗《奔》，是在一整夜中写成的。他们的盛意，我们真是说不出的感谢。其余几位先生的稿子，也都是特地给我们写起来的，我们在这儿一并很恳切地说一声谢谢。

本刊页数有限，连续登载的长篇，不敢多用。邵洵美先生译的英国当代大戏剧家考德的名作，也拟在四五期内续全。邵先生尚有关于原作者考德的研究文字，现正在起草中，不久当在本刊发表。

第二期的稿子现在也已完全编好，亲爱的读者，我们隔一个月再见。

11月1日

（《文学时代》创刊号）

《新评论》发刊词·强国的开端

我们对日本的战争，已经延续到30个月。在这30个月之中，我们在战场上葬身的英勇将士，在轰炸中牺牲的善良人民，以及在流离失散中死亡的老弱妇孺，无从统计。我们被敌人炮火所毁坏的建筑，被敌人掠劫所损失的财产，以及在流亡搬移之中所耗费的物力，更无从估量。这30个月来在中国人民的命运上是一次大蹂躏，一次几百年来未有的灾祸。这蹂躏与灾祸仍在延续着，而尚未临到看见尽头的时候。意志衰弱的人，不能忍受这个折磨，有的沉不住气已露出他们最丑陋的面相，在敌人的鼻息下保持他那一脉脆弱的呼吸，有的则感觉烦闷，在烦闷里显得局促与颓唐。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我们全国家所忍受的糜烂，这一次糜烂无人能说明须经若干10年方能苏复。我们同样尊重我们千百万人民亲历到的不可言说的侮辱与愤怒，这些侮辱与愤怒，1000页白纸也写不完记载不尽。这诚然是太平洋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剧烈的血难，但这血难对中国不是一次灾祸，应该算是一次福幸。我们相信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或者凡是有骨气的中国国民，终能接受我们这一个严谨而浑厚的诠释。

我们回头看看，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成了什么一个样子？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上所表现的只是争夺，自私，散漫。哈勒

尔在德国史纲里述15世纪德国各邦主的情形，谓当时德国各邦的领袖，只知内战，“他在堡楼视察线以内看得很敏锐，但如叫他去看全德国时，就要开始混沌。”他们毫无洞察世界大势的眼光。“国家等于一个四肢之间没有中枢神经联络的动物，每个肢体的痛苦不为一切别的肢体所感觉。人可以从它身上割下一块肉，它不觉得痛苦。”这正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一个摹影。民国十四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奥斯汀张伯伦在英国会复会后的第一次演说里，指责中国的分裂，谓不知究竟何方可代表中华民国。我们无暇去辩证一个外国的外相对我们刻直的批评；我们在国际舞台中诚然是一个不合时代的组织。北伐后的初几年也未能澄清这扰动混乱的局面，扰动混乱原是一切过渡时代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10年来我们的国家终于渐渐走上了有定律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走向有组织有权力的国家的一个轨道。

一个国家从散漫到统一，从衰弱到富强，对外战争常是自然的阶段。我们看历史，历史将给我们最不欺人的证明。英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乃始于9世纪阿尔佛来特（Alfred）之领导全国抵抗丹麦人之入侵；小言之Englishness之完成，亦由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及爱尔兰人的不断冲突。地方主义或省份主义在中古以前的法国占最大力量，但在百年战争里，法兰西民族主义终于完成，在女杰贞德的领导下达到了它最高的峰点。如其没有和阿剌［拉］伯人不断的战争，也许没有一个“爱国的西班牙”，而对西班牙统治的长期的反抗，又诞生了一个民族主义的荷兰。瑞典成为一个国家是和俄罗斯人、波兰人，以及日耳曼人经常争斗的结果，而美国的独立，大家都知道全仗独立之战。上一个世纪里德义的统一给我们最好的刺激。共同御外和对奥斗争使义［意］大利终于一统，而在拿破仑之战及解

放之战之中，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和瓦敦堡人等方合成了一个德国。外患常促成国家的团结，而对外抗战凝练了全国国民的体力和智慧，发挥出他们最高的卫国的情绪和心灵。凡尔赛宫的“战争厅”里那一幅幅所绘摹的法国民族由以创造及法国权力由以强大的那一代一代战争情景的油画，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实不仅对法国一国为然。

我们明白我们在抗战中所受的折磨和损失，然而我们终带着笑容和健康的心情面对着这个战争。许多国家的建设恒在战争中进行完成，许多新的勇气和新的道德，亦常随战争而俱来。普鲁士在拿破仑的侵凌下，因斐希特和阿隆德的鼓吹而有非常的教育改革；今日普鲁士公立初级学校制度的基础，以及现世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都树立于那个时候。在上次大战时，随战争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勇敢与健康。青年都切望加入前线，做父母的亦恒热忱地鼓舞其子女加入那高尚的冒险事业。Dumas 和 Aime 在“战争的神经和心理”里有一段描写，谓参战各国似乎都一般地更加健全起来……“旷地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原始的安适意识，以及常常发现一种不能以别种方法解释的愉快。从营房中无数的琐碎的职责解放出来达到前线之后，比较上似乎免除了许多道德上的责任，这给与人们以一种独立和自由的感觉。这种感觉与群众的普遍的热忱合并起来，造成一种快乐的精神的空气，这种空气很能表现人民中道德力量的增进。”我们现在看抗战后的中国。我们本是一个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国家，但自“七七”以后，在万分艰难之中，我们现在已有了 4 个冶炼厂，4 个电机厂，2 个水力电厂，8 个火力电厂，5 个金矿，2 个铜矿，2 个铁矿，2 个油矿，3 个锡矿，1 个水银矿，8 个煤矿，化工部分也有了 4 个单位。再说交通方面，我们在抗战中完成

了湘桂线的衡桂段，正在赶筑中的有昆叙线、成渝线、滇缅线。而公路方面的建设，更不须我们特别指出，每一个山坳，每一顶桥梁都有着我们千百万中华民族的血肉与汗流。我们在各方面的建设，实远出于我们当初预料之外，而一切建设现正和战争配合着在加速进行之中。同时我们全民族在精神、道德，及心理方面也显然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发生变动。最新一代的青年，不论在体格上、兴趣上、观念上以及理解的能力上，均胜于前一代的人物。中华民族正如一块阴湿的密云，战争的风暴终使这密云揭开而现出千万缕鲜艳无比的光辉。我们的国土上随处都流动着那坚韧的活力，随处都触着为我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沉毅的魂魄。新一群的中华儿女开始在他们祖国的原野上驰骋。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强壮，他们所孕育的那种建［健］康的心灵，实为中国前所鲜有。

*　　*　　*　　*

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原已光芒四射，浸至今日，复达到了它最炫耀夺目的一段。我们看，今日世界上哪一片土地上有大同主义的影子？今日统治苏联的并非主张全世界革命的托洛斯基，而是以民族主义为范围的斯大林。现世各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爱他的国家。法国政党间的争轧最烈，有过激党与保守党，有天主教徒与反宗教分子，他们的政见虽异，但一旦对外战争，他们全能协和一致。同样，法国 19 世纪的几个大史家，Guizot 是抗议教派，Mignet 是过激党徒，Thierry 原为自由主义者而后来变成为天主教徒，Michelet 则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们在学问上和见解上虽各树一派，但对于国家，他们却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个最能干最有声望的政治家葛尔诺（Carnot），1814 年在退休中，致书复辟的

法皇路易十八，认为法国人民惟一所需培养的情感，就是要使他们爱他们的国家。拿破仑时代之后50年中，全法国的知识阶级都集中于一个努力，即“每一个法国人应忠于法国”。法国每一个小孩都须受初级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教育中有一条不变的信条：“国家重于一切”；这正是加里波的“义［意］大利始，义［意］大利终，吾生一切惟义［意］大利”的精神。再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英皇查利第二，虽然昏暴，对民不忠，但他却未肯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的荣誉及传统的利益。当他和法皇路易十四勾结，企图利用路易十四的接济，来摆脱国会及人民的束缚时，他仍告诉路易十四，认为法国之海上贸易日渐发达与法国海军的日强，对英国威胁极大，而足为他们两人合作的最大障碍。其后英法联合攻荷，因海军究由何国统领的问题，又生争执。查利第二坚持统帅必须由英人担任，因为英国是传统的海上之王。昏暴虽如查利第二，他亦仍以国家为先。爱国原来早是他们最基本的教育。Mowrer在“开倒车的德国”一书里，又告诉我们，1933年以前，希特勒虽有武力，但终不忍用流血的方式来夺取政权，诚恐伤了国家的元气。一个人的思想或一个国家的政策都不能违反时代的潮流。今日的世界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30个月之前，宛平县城外的一支火箭，燃烧起了中华四万万五千万男女不变的决心。在那辽阔的祖国的原野上，我们看，哪一个角落里没有爱国的火焰？我们听，哪一个角落里没有卫国的声音？1925年9月18日，奥斯丁张伯伦在欢迎中国关税会议英方代表的宴会上，声述英国的惟一希望，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有力，统一，独立，有秩序而且繁荣的国家”。这十几年来，中国曾向着这5个目标迈进，获有极大的成就。抗战以后，全国更见统一有力，而在战后，中国自益更见

独立自由昌平繁荣。我们在上海3个月的血战，以及上海血战3月以后沥尽天下墨汁也写不完的我们将士英勇的战斗，以及全民族抵抗外侮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不仅使我们获得自强的信心，并且改变了全世界人士对我们的观感。假如Schuman能迟五六年脱稿他那册巨著《国际政治》，他一定会改正他认为中国必须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之下的错误观念（原书517页）。

从弱国到强国，所经过的战争，常不仅一次。德国的造国经过普丹、普奥、普法三战。义［意］大利的统一也经过义［意］俄之战（1854～1856年）及1859和1866年的两次义［意］奥之战。我们若稍从远看，中国要变成强国，容非仅此一战，但目前这对日抗战，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战。这一战败，真是一切从何谈起，这一战胜，我们有的是黄金般的前程。

拿破仑推翻西班牙的巴本族，虽然容易，但他对付西班牙人民，却感觉困难。1808年以前拿破仑所对付的是神权君主及其佣兵，而1808年以后所遇着的却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全西班牙人民的爱国心，终于使约瑟夫波拿帕脱逃出了马德里，而法军也只得向比里尼斯山撤退。今日中国人民正以同样的爱国心驱逐我们的敌人。我们已把我们的血肉、智慧与灵魂砌成了一条新的民族的大城。诗人拜轮［伦］说："他如不爱他的国家，他将不能爱任何东西（He who loves not his country can love nothing）。"我们先须爱我们的祖国，方能成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们这次抗战，正是近代中国全国一致抵抗外侮的大表现。我们无须动荡我们的信念。30个月前也许无人想像到我们今日有这样一付庄严雄壮的局面，然而30个月的奋勇战斗与刻苦建设，终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友人敌人，了然中国民族潜力的浑厚。

这一份浑厚的民族的潜力，非30个月来磨砺之果，乃是5000年中国文化所孕育的结晶。我们全无疑问，中国要成强国，必须经此一战；而战争的胜利，方是走向强国的一个开端。

（本文为《新评论》发刊词）

《新评论》半月刊，系抗战期间重庆新评论社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1940年1月创刊于重庆，1945年10月停刊

《英国采风录》序

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者因于离乱之中，每日仍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亦终写成了 10 章。

在这种情形下从事著述，他之不能获得任何有助于他著述的材料，除了他自身所随带的一小部分外，实为极自然之事。他希望当本书的读者知悉本书产生经过时，或可不致对他作过分的要求。他亦从未蓄意写这样一本著作，此于本书内容之既欠广博而又残缺不全一端可以见之。

本书所叙述者为本书著者所知之英国，而本书著者则为中国之臣民。以一个中国人叙述英国事，当他行文之际，他之常常不能自已地将他所属的国家和他所叙述的国家作种种比较，殆亦人情之常。他常思及两项问题：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

何在？他于全书脱稿之后，复费数旬之力，撰跋一篇，申述他对于上述两事的感触。但不幸当那篇跋文写成时，它已成为了一篇3万字的论文，本书本文仅10万字左右，兹欲附以3万字的跋文，终觉不甚合宜，故他不得不将该文连同其他几篇独立的论文，辑成一集，题为《英人·法人·中国人》，另行出版；然他衷心实甚以未能照原意将该文附刊在本书之后为憾。

著　者

1945年4月10日于国立师范学院

《英国与印度》序

(1600～1943)

本书著者兹徇出版人之请，就本书内容作一简单之说明：本书主旨在考察 1600～1943 年（3 月）之间之英印关系。本书不仅就过去英印历史关系加以扼要之叙述，并进而就各有关问题及未来局势作审慎之研究：广土众民之印度何以灭亡于一个商业公司之手？东印度公司究以何种凭借造成此史无前例之殖民征服？东印度公司之吞并印度究否系英国政府所授意？此一历史久长实力宏厚之殖民公司何以终又消灭？（以上第 1 章）印度民族运动演变之背景若何？何以印人对于 1909、1919、1935 年各次之《印度政府法》不能满意？英国对印所能让步者为何？所不能让步者为何？克利浦斯访印之行何以终于失败？（以上第 2 章）英国能允许印度独立乎？印度能在外交上得到有实效的援助乎？印人之民族意识已成熟乎？仅仅依赖民族意识即能推翻外族的统治乎？甘地政策之评价若何？在何种原则下印度始能获得独立？印人之独立愿望在短时期内有实现可能乎？（以上第 3 章）上述各端俱为本书著者努力考察者。

惟本书著者愿在此表白一言：他自始至终未尝蓄意在本书标题下撰制论文，因他深知他对于本书所涉的问题并无充分之知识；只因他所执教的学校曾邀他讲演，一时的兴会终使他草成此稿，因之，本书的体裁自不能如通常所希望的那样严谨，而

材料的出处亦多未能一一注明。

在战争时期从事著述，已多困难，何况他所寄身之地又复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镇，在那儿既无任何特别材料供其参考，也无“灵通的消息”有助于他安置结实的判断。他最初实未计及此稿可以出版；他今将此稿付梓，亦仅以应一般欲考察英印关系者之需求而已。

著者的谢意应向其友人陈之迈、俞颂华两先生表示；他们对于本书的出版，曾赐予匡助。

著　者

1943 年 4 月 1 日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

致胡适的信（三封）

一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1卷24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

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 5 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 12 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地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 2 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 3 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

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 2 卷第 1 期写一篇文章(2 月 15 日前掷下)，希望是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1947 年 1 月 21 日，农历大除夕

二

适之先生：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3 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 8 月 18 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 年 8 月 12 日

三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 2.33 亿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1000 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 20 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我想先生对办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10 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 5 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 10 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 年 9 月 22 日

（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致傅斯年的信（二封）

一

孟真先生赐鉴：

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力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及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动；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想。我们又不能在上海随便找些人叙会；这是我们主要的苦痛。我只能这样说：我自信能以相当长的时期主持这个刊物，长线放远筝，只好一步一步走。我是一个量力行事的人，我希望一切事情要“水到渠成”，慢慢地实现理想。目前，只希望这个刊物在大体上能立得住。假如能照过去的水准支持到两年以上，两年以后，我想可以发生一点影响。现在业务上

可以自给，一般论者对于我们也都有很好的反应与感情。只要我们自己不自暴自弃，谨慎从事，这个事业或者可有成就。最近五六个月，我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刊物上，如兜拉广告，买纸，调度款项，人事管理，核计账目，校阅大样，都是我的工作，虽然终日疲乏，但精神上还是十分宁静愉快，我们应当尽心尽力，替国家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政治局面下是苦闷并苦痛的，先生所言极其同感。我想我们最要紧的是立住脚跟，心无所求，假如不想做官，即无须迎逢国民党，假如不想投机，即无须迎逢共产党，心无所求，才能言所欲言，不偏不倚，不计功利，尽心为之。

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稿子。稿子总不够，同时又要维持这个水准。回顾20期来，大体上还能维持原有水准。先生所附《内蒙自治问题》一文，应当使国内各方面都能读到，所以想在《观察》发表一下，先生想可同意（《观察》有四分之一的读者都在西南西北各省），顺便附致薄酬4万聊申谢忱，务望哂纳。1卷即将告终，2卷正待开始，先生因病因忙，尚未为《观察》写过稿子，我们很迫切地希望先生能给《观察》第2卷第1期写一篇文章以为支持，并乞于2月10日以前掷下，务乞俯允为祷！

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1947年1月13日灯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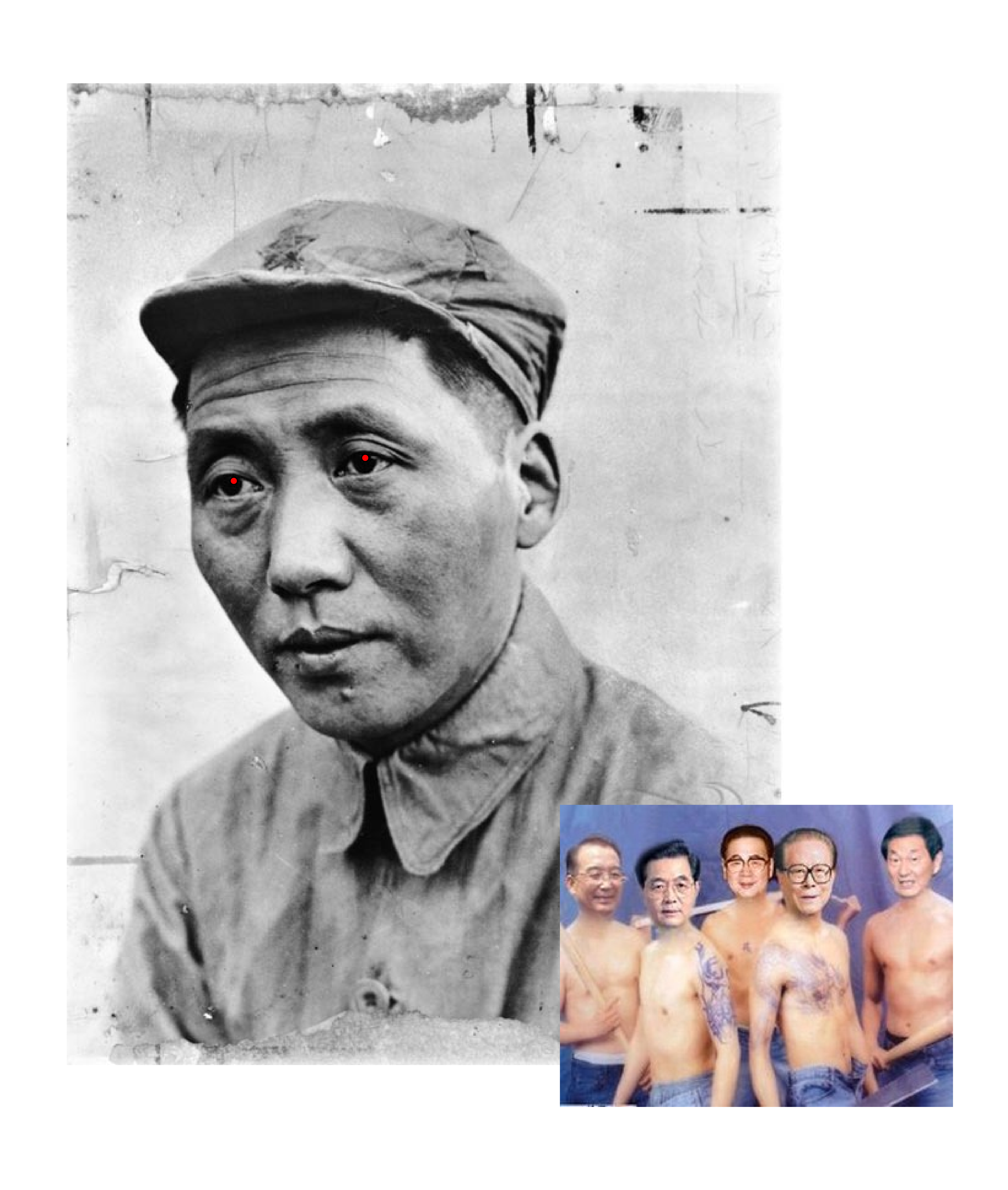
孟真先生赐鉴：

在京晋谒，辱承留餐，畅聆教益，欣幸无似。翌日即返沪，未能再谒，甚为怅怅。金祸泛滥，纸价暴涨，印工倍增，本刊经营益增艰难。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如承俯允，曷胜感祷。敝刊第 2 卷第 1 期之最后付排期为 2 月 22 日，甚望先生能于 20 日前付邮寄沪。此次在京，无意中闻一谰言，谓本刊与孔有关。今日之世，乃恒以小人之心度人，鉴于本刊过去批评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并曾抨击宋子文，遂推测或与孔有关。此事原不足辩，惟觉先生文章中，能对孔亦施以激烈之抨击，则外间谰言本刊，亦将因先生之文可以洗清矣。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1947 年 2 月 16 日
社址：上海吴淞路 444 弄 11 号

如承，先将题目示知，以便预告，尤感。

（选自《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5 年 12 月 16 日初版）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ks.googlepages.com